



S A I A S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 闻 道

2015年第3期 总第16期



- 端木美老师访谈录
- 张昕：新兴经济赶超、国家资本主义与世界秩序
- 陈曦：在总统府和难民营里的外交课堂
- Rufina Kalapova: Russian Policy over Syrian Crisis

靡不有初，寤志有终。

冯绍雷

沟通的渠道

交流的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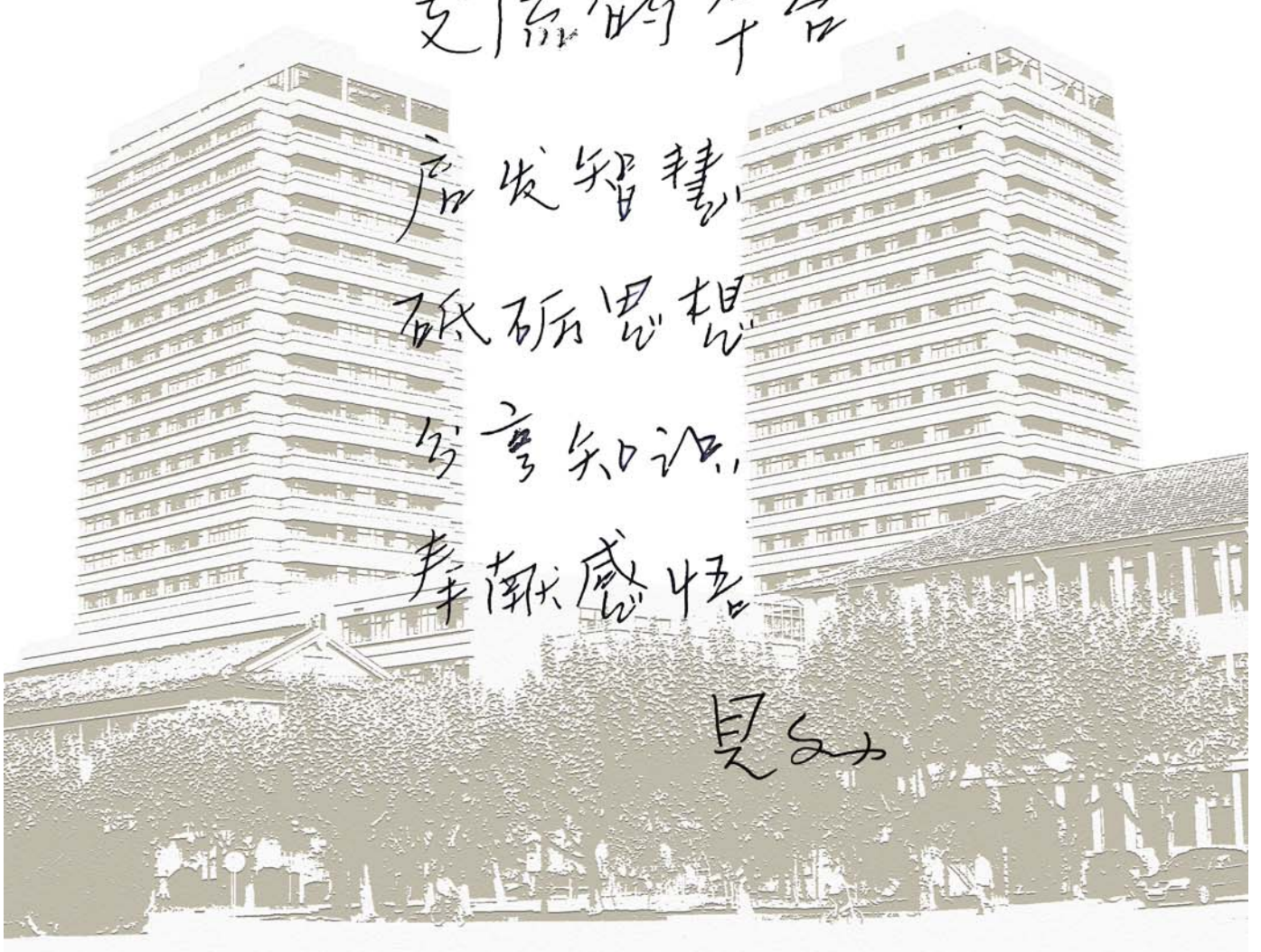
启发智慧

砥砺思想

分享知识

奉献感悟

复旦



## 写在巴黎恐袭之后

王志浩

刚进入 11 月，魔都骤降的气温令人措手不及。而在世界另一端的巴黎，11 月的夜晚却让人感到无比的痛心。2015 年 11 月 13 日晚，一系列恐怖袭击打破了欧洲浪漫之都夜晚的平静。二战结束以来，法国本土还尚未经历过如此血腥、恐怖的一夜。

伊斯兰国组织积极分子是血案的元凶。恐袭事件之后，宗教冲突、异教徒间的仇杀这类的话语反复出现在舆论声中，仿佛 1000 多年来欧洲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恩怨情仇史都要被翻出来重新校阅。

大概 10 年前，一部名为《天国王朝》的史诗电影在被搬上了银幕。这部以十字军东征为背景的影片在当时却只取得了惨淡的票房成绩。影片传递了上帝选民与穆斯林之间超越了民族、宗教的融合情感，显得与当时伊斯兰世界被妖魔化的舆论氛围格格不入。

超越了历史的情节，似乎是对现实的另一种反思。我们讨论恐袭、伊斯兰国、叙利亚乱局、穆斯林难民危机，话题严肃而略显沉重，往往落入到教派冲突、大国博弈的话语中。我们很少去想象耶路撒冷四方来朝，基督徒与穆斯林和谐共处的乌托邦式的画面。偶尔想象一下天国王朝的理想情境，好像又违背了“政治正确”。

强者当前，无畏无惧；果敢忠义，无愧上帝；耿正之言，宁死不诳；保护弱者，无怪天理。在一个稍显狂热的时代，有人可能质问，“大丈夫当造福苍生”的骑士精又能如何？我们在现实与理想、冲突与矛盾、正义与邪恶的痛苦挣扎中，难道不该坚持一丝憧憬吗？





# 闻道

2015年第3期  
总第16期

主 编：  
刘 畅

副主编：  
过梨雨 刘娅楠  
王志浩 杨 静

编 辑：  
(按拼音字母为序)  
陈子越 过梨雨 刘 畅  
刘娅楠 刘一鸣 孙 莹  
王志浩 夏真真 杨 静  
张 莹

封面题字：  
冯绍雷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  
研究院

《闻道》编辑部  
主办

## 目 录

### 卷首语

写在巴黎恐袭之后 ..... 王志浩

### 学人讲坛

端木美老师访谈录  
..... (01)

### 青年论坛巡礼

新兴经济赶超、国家资本主义与世界秩序  
..... 张 昕 (09)

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下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内涵、认知与挑战  
..... 万青松 (24)

欧盟邻国政策的现实性与复杂性：  
以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为例  
..... 皋 媛 (37)

综合文化范式下的俄罗斯地缘政治身份认同路径探  
析  
..... 刘 畅 (48)

### 海外游学观察

在总统府和难民营里的外交课堂：  
匈牙利国家行政大学ADB项目交流总结  
..... 陈 曦 (58)

Close Observation of Belgian Demonstration  
..... 史书怡 (67)

## 百花齐放

- 时评  
Russian Policy over Syrian Crisis  
..... Rufina Kalapova (70)
- 书评  
君特·格拉斯《我的世纪》之《1933年任命的消息》文本解读  
.....刘跃越 (75)
- 随笔  
他两个都在忏悔.....郭良正 (83)  
莫斯科中大学生俄文名.....郭良正 (85)

## 国关要闻

..... (87)

## 《闻道》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闻道》(季刊)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刊,由华东师大国关院主管,是学生自主管理、自主发行的一份学术思想人文刊物。《闻道》编辑部成立于2010年12月,2011年3月发行第1期。

本刊坚持“以学术为主,不惟学术,百花齐放”的办刊理念,力图为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面的研究生提供一个学术习练的舞台。

###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座414室

邮编:200062

邮箱:wendao\_ecnu@sina.com

网站:<http://www.saias.ecnu.edu.cn/il265.htm>

注:未获本刊事先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载本刊内容

## 学人访谈

## 端木美老师访谈录

## 学人小传

端木美，安徽安庆人，中山大学法国语言文学专业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妇女委员会主任、瑞士分会会长。20世纪80年代赴瑞士联邦弗里堡大学留学，专攻瑞士史、欧洲近现代史。2011年荣获法兰西国家功绩军官勋章。同年当选为国际史学会国际关系史专业委员会委员。



《闻道》：端木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闻道》杂志的访谈。我们都知道，今年是第十二次举办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而在中国的文化中，十二是一个轮回，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创办中法文化班的初衷是什么？在中法班的发展过程中，您作为创建者和组织者又有怎样的心路历程？

端木美：首先，我很高兴能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接受这次采访。景物依旧，人事全非。十二年前的你们还是小孩子，十二年后的现在，我们第一批的学生有的已经成为副教授、教授，而且他们还让自己的学生来参加中法研讨班。这使得我们在看到时光飞逝的同时，看到一批又一批的学子的成长。

关于当初为什么创办中法研讨班。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于1979年成立，当时是由老一代的历史学家们把这个研究会组织起来的，他们的成就可以说是巨大的。他们虽然经历了一些政治运动，但是他们毕竟是接受过中国

传统教育和西方教育的著名学者，所以，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在成立之初就是很出色的。法国史研究会从成立至今已经改选过3位会长，当我就任会长后更是越发觉得身上肩负的责任重大。记得当时有这样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老一代的学者正在老去，而我们自身的能力又有所欠缺的情况下，我们对于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使这个研究会能更长久地维持下去陷入了深思。张芝莲先生说过：“我们要加强国际合作，加快对新一代的培养。”根据这个理念，我们认为，通过开展一些国际合作项目来加快研究会的成长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始了组织创办中法研讨班的工作。

实际上，在创办研讨班初期我一直有个心结，1995年我出席了在蒙特利尔召开的国际史学大会。那时候的我们试图申办这个国际史学大会，但是没有成功。失败的原因一部分来自主观上，另一部分则是学术方面。虽然刘大明、季羨林等一批中国老一辈学者得到了部分法国老学者以及国外同行的高度尊重，但是当时我们尚未能达到这些优秀的老一辈学者的成就，未来的成就也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加上国外学者对我们当时从事的这方面的研究知之甚少。这一点，我在今年在济南召开的世界史学大会上也谈到了，我也感受到法国学者提出的这件事情的真诚与严肃。而我也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所以在我出任会长后，我更加注重加强国际合作，通过这个过程来培养年轻一代。

**《闻道》：刚才听了您的回忆，那么今年世界史学大会结束后，您的心结解开了吗？**

**端木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今年大会结束之后，我得到的答案还是比较满意的。由于这次大会在中国举行，规模巨大。我们作为东道主，相比起先前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包括这次的大会的主持人是王健老先生，以及其他的学者在不同的分会场、圆桌会议上的积极参与。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思考。虽然我们的梦想在济南得到了实现，但是这个梦想是一个实践过程，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许多新的经验。我们还是要一些提高，虽然我们在组织工作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在学术方面有待提高，首先要做的便是继续加强与国际的联系，打开视野，不仅要有中国视角，更要有世界视角，中国人在研究中国问题上趋于保守是普遍存在的通病，因此，我们要更好的与外国学者进行沟通和交流，这样我们

才会有新感受、新眼光，得出新结论。

另一个是从语言角度。语言对中国来讲是一个不得不跨越的大障碍，因为我们迫切需要走上世界舞台，所以对自身的要求就应该高一些，语言学习的加强也就变得十分重要。语言学的好坏与否不仅是指能看懂一些书，更是指能进行正常的专业交流。有人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的声音为什么不大，听不到中国人的声音？”这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语言问题，语言上存在的障碍让中国学者的参与程度受到较大程度的减小。不过，你们这一代比起我们，已经好很多了。（笑）

**《问道》：**端木老师，我们都知道您曾留学瑞士，对瑞士的文化也有深刻的了解和探讨，今年又恰逢中瑞建交 65 周年，您能谈一下您对瑞士这个国家的文化符号的理解吗？

**端木美：**今年是中瑞建交 65 周年，瑞士也是最早承认中国的西方国家，但是由于它是个小国，所以当时我们决定去瑞士留学的时候，甚至都找不到一本瑞士书，而我们对瑞士的认识也仅仅局限于瑞士的手表，甚至不知道它的首都。但是我认为瑞士是值得研究的。古时候的瑞士，自然环境很恶劣，气候变化很大，自然灾害也频繁，但是它在不断改造和演变的过程中展现出了现在的魅力。瑞士的文化是多元的，但是多元文化中又蕴含了一种独特性，这与其早期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正是这样一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培养了瑞士人独特的民族精神。第一是坚韧不拔，第二是相互帮助，第三是平等。我写过的关于瑞士文化的书中，对瑞士文化有较深刻的理解，也得到了使馆方面的肯定。

瑞士人给我的印象很好，虽然他们有时候看起来很冷漠，但是听到你的要求和困难后会很快的理解，或适时给予援手。

我在瑞士的经历是丰富的，也是深刻的。我不仅要学习他们研究和认识中国的方式，更要帮助他们更好的更深刻的了解中国。这些经历对我的此后的学习和工作有很大帮助，而对认识一个世界、认识一个中立国也成为我成长过程中的另一种重要的营养。

**《问道》：**您谈到，瑞士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塑造了瑞士平等、自由、包容的国民性。中国作为一个以平原山地为主国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也孕育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结合瑞士和中国而言，您觉得地理环境对于国际关系的塑造所产生的是怎样一种



影响？

端木美：就地理环境而言，中国的确也存在很多的特殊性，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环境恶劣、贫穷，有人提议过是否像瑞士一样对这些地区进行改造。说起来我感到很惭愧，因为我没有到亲身去过这些地方。我以贵州为例，因为现在的瑞士人更多的想去帮助贵州，当然也有人开玩笑说，因为贵州山水与瑞士比较相像，这个问题上我也没有发言权，因为我没有去过贵州。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生活在大城市中，对中国的国情，尤其是中国的农村的情况的了解是有限的。据我所知道的，其实在中国很多贫困的农村，我不敢说都是山区，很多老百姓实际上是很尊敬有知识的人的。他们也改变现状的愿望很强烈。但是对于这个话题，很多人也许会担心走到禁区里面，所以想法相对保守。我觉得，在中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文明，即农耕文明，而且中国农耕文明由来已久，这是瑞士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瑞士的历史较短，其真正的联邦起源是 1291 年，那时候的中国已经处于元朝。在那之前，瑞士和我们的文明是存在一个落差的。中国的这种特殊的文明所塑造了中国特殊的国情，只是现在的中国的农村的发展较为滞后，至于滞后的原因可以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了解到。



《闻道》：您刚刚提到，中国的农耕文明虽然历史久远，影响深刻，但同时它也成为后来导致中华民族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处于弱势地位的重要原因。您看今天上午（访谈时间是 2015 年 9 月 3 日）的大

阅兵，中国所展现出来的雄厚国力，请问您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的这种强大？

端木美：今天，我们都怀着一种很兴奋很激动的心情看大阅兵，看到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国力日益增长，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而且目前已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我想这个过程中应该充满艰辛的，这几十年的努力也是很不容易的，这一点，你们这一代也许只看到了国家繁荣的一面，没有看到她所经历过的困难与险阻。

其实中国人特别不容易，因为国家大，底子薄，很多事情做起来有相当的难度，所以中国今天能有这番成就，为世人所震惊，着实付出了很大努力。至于中国在将来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相信这是你们能够看得到、去见证的事情。现在的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国际地位能够不断增强而且不断的巩固。这点很重要，因为增强是容易的，而巩固是不容易的。我相信你们会为了国家的不断繁荣富强去努力，将来有一天能够看到她强大到与其他民族真正平等对话对事的的时候。中国从 19 世纪中叶很落后的情况下，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在努力地想方设法振兴中华，增强国力，使得我们有一天能够平等的站立在世界舞台上，这也是几代中国人留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目标，我想今天得老一代也肯定是感到很欣慰的。

《问道》：我们知道，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过程要求中国深化对自身以及其他国家的了解，而实际上，除了部分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外，有相当一部分留学国外的中国学生研究的题目也是中国，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与您那个时代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端木美：80 年代末，我们对外国的了解程度确实不能与现在同日而语。当时，我们把很多研究中国的专家学者称为汉学家。我在法国学习的时候就发现居然有好多中国同学研究的竟然是中国题目，当时的我就觉得这是一件颇为滑稽的事，尤其是有的中国留学生说他学的是中国文学。我也问过他们这样一个问题：“你学中国文学怎么不回去学？你在这里能学到些什么？”在我当时看来，在欧洲，学习和研究欧洲的历史、欧洲的问题才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当时的理解的确存在相当程度的片面性，是一个理解上的错误。与在中国研究中国相比，他们在外国学习中国的内容，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中国，这是和我们在国内学习完全不一样的思

维。我后来觉得自己产生出的当时的想法才是最滑稽的。现在，依然有很多中国学生在海外学习国际政治和中国问题，只是学习历史学、哲学的人越来越少了。

关于学习的方向，以前，我们是基本上按照自己的专业来划分，而现在的很多人基本上是可以选择自己学习的专业。比如说，他觉得经济学比较吃香，他就可能去学经济。有的人觉得法律很好，那他就学习法律。而历史学这种就有点像冷板凳了。国际关系在我看来，它还是一个热点。比如说很多人研究法国，这些人有的人懂法语，有的对当前的国际形势甚至这几十年的国际关系、中法关系都非常了解，所以有时候我很怕在北京讲中法关系，因为北京这样的“专家”太多，有很多都比我讲的好。（笑）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学每个学科，都是既要把在国内学到的东西巩固好，同时又要加强在海外的学习。我相信，虽然有一部分中国学生在海外学习的是中国内容，比方说他的论文可能是与中国有关的题目，但是他肯定会有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视角去解读中国。所以对于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研究中国这一点，自从我转变自己的最初的看法后，也不再提出异议或批评了，因为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闻道》：端木老师，去年中法班的主题是记忆，今年的是和平，每年主题的确定，您是如何进行考量和设计的，能跟我们说说吗？**

**端木美：**（笑）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我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因为我们中国法国史研究对学术工作有比较集中的指导，在进行中法研讨班的学术讨论的安排上，我们会结合实际情况，包括许多老师，像李老师、沈老师等，他们各自在研究过程中的需求，进行整合与安排。

研究的角度也是我们课题设计的主要考虑因素。这些课题有的是从宏观角度，有的从历史学的视角，或是其他的角度进行考量。这是大家共同讨论出来的结果。当然，对当前学生所关注或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和事件，我们也会纳入研究的范围，希望大家在研讨班不仅可以从历史上对这些问题追根溯源，同时也能从实际意义上来看待这些问题，与世界能够紧密联系在一起。根据经验，我们策划的这些课题既有现代性又有历史感。有时候大家可能会对某些主题抱有疑问或奇怪，会觉得范围很大很宽泛，也很难切入点。但是实际上，题目大才能让老师和学生们更好的自由发挥，不受到束缚，让他们能畅所欲言。

《问道》：您刚提到现在世界联系越紧密，学者包括学生在内在各个课题研究的选择也很多样化。我想大部分学生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选择困难症。不知道您是否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您的父亲，您的老师是否给了您在学术研究上的帮助？也希望您能够给我们同学一些建议。

端木美：我那个时候比你们还是简单一点，现在的你们，不论是视野还是社会都比我们开阔很多，先进很多，能接触到很多我们没有接触过的事物。比起我们那时候的狭窄，你们的确可能存在选择困难。

举个例子，我们以前研究法国史，重点基本都是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所以当时外国教授一听我们做的题目会感到很奇怪，好像除了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外，对于法国都不了解了。（笑）在中国，法国大革命是1949年以后才得到重视的，而实际上，这个课题在我国进行辛亥革命前就很受重视。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变革、一场革命，这场变革和革命要以什么为榜样或者范例？当然是法国大革命。所以法国大革命这个课题对于当时希求改变中国面貌的知识分子来说，是非常具有研究和探讨价值的。

以前的世界史不是很发达，基本都是通过一些在国外拓荒的老师在中国进行传播和推动。我父亲以前在法国读的是巴黎大学的法律博士，历史学是他修的第二学科。他回国的时候由于法律被取消了，所以他开始从事世界史的教学，差不多有二十多年。在教学过程中，我父亲对法国历史和巴黎公社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当时他还关注过国际共产主义，由于后来父亲重新组建法律系，没有多余的时间继续从事国际共产主义的研究，我就接手过来了。所以这个选择其实也是有些许无奈的。（笑）相比起你们现在，我们当时的选择实在是太有限了。

我留学的时候，因为相比起其他历史，我们更熟悉的是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时期，所以当时我选择的题目是拿破仑时期的瑞士，选这个课题还有一点，就是当时我们的老师都是法语区的，所以这个题目对于他们来说更容易接受。拿破仑时期的瑞士也是一个特别的时期，因为随着法国大革命的传播，瑞士出现了不同的派别，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课题可以选择，所以我选择的题目并不是很难，还是比较容易的。

关于选题，我的建议是你们选择的東西尽量在你们现有的知识范围内，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扩充和充实，千万不要离开自己的知识面，否则做

## 闻道

这个题目将会面临一定的难度。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学生的论文题目也会被吓了一跳，想知道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题目，不过在我看过内容后，也就明白了。总之，不管别人怎样选择，自己不要离开自己的知识面和老师所能够给你的，这样就避免在把握题目的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焦虑了，也会相对从容一些，做出更好的成果。

谈到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他经过很多的运动，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的历程完全是一个传奇，现在他也变成了一个传说。（笑）父亲他平安的到改革开放后，60岁后重建法律系，65岁被任命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70岁成为全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大家都不能想象，在24万法官中，最老的一位70岁被任命，这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我父亲一生中的经历是很坎坷的，但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始终没有放弃过学习。他的外语非常好，后来还加学了俄语，这为他提供了新的渠道去了解外部世界。我们以前不太了解他的这些事，只知道他每天晚上工作到很晚。后来才慢慢了解到，然后向他学习。在关于是否去瑞士学历史这个问题上，我父亲给了我重要的指导，对我以后的学术生涯和学习产生了深刻影响。

**《闻道》：最后想请端木老师送一句寄语给《闻道》。**

端木美：那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吧！



（采访：过梨雨、刘畅、刘娅楠、杨静  
责任编辑：过梨雨、刘一鸣、孙莹）

## 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第七 届青年论坛获奖论文巡礼

【编者按】2015年11月14日，由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2015年年会暨青年论坛“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发展”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举行。在本届青年论坛中，我院多名师生获奖。其中张昕老师的论文《新兴经济赶超、国家资本主义与世界秩序》荣获青年教师组一等奖；博士后万青松的论文《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下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内涵、认知与挑战》荣获青年教师组三等奖；博士研究生皋媛的论文《欧盟邻国政策的现实性与复杂性：以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为例》荣获研究生组二等奖；硕士研究生刘畅的论文《综合文化范式下的俄罗斯地缘政治身份认同路径探析》荣获研究生组二等奖。本期《闻道》开辟“巡礼”专题，刊登这一组获奖文章，聚焦当前理论和热点问题。

### 新兴经济赶超、国家资本主义与世界秩序\*

张昕\*\*

【摘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一组新兴经济体内部“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发生的性质变化，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对于国际治理的系统偏好。新兴经济体最重要的共性是国家在经济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但这一轮的“国家资本主义”既不是简单重复历史上已有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也不是单纯寻求融入自身成长的新自由主义大环境；冷战后的国家资本主义呈现出“融入式挑战”的两重性。新兴经济的内性质将反映在他们对世界秩序的需求上，不断推动一组与自由资本主义秩序相互独立、但不直接竞争的“平行体系”。

【关键词】新兴经济；国家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平行体系

#### 一、关于新兴经济与国际治理现有叙述的局限性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中国为代表的一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给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带来了变化的可能。<sup>①</sup>对这个趋势的认识呈现出两种极端。

\*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47卷第4期 66—74页），感谢作者授权本刊全文转载。

\*\* 张昕，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师资博士后。

“挑战论”认为新兴经济随着经济体量的上升会不满足于现有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会要求改革全球治理、以更好服务于自身的利益和需求。

“融入论”则认为新兴经济本质上是冷战后现存国际体系的产物和受益者，他们经济实力的增强恰恰意味着对现有国际体系依赖的进一步加深，会更有利于现有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维护。<sup>②</sup> 这样的讨论受制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过度集中在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所界定的国际关系三个层面中“国际系统”的结构特征，以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来预测国家对于国际体系的需求，但这个辩论的双方并不触及新兴经济个体本身在崛起中所发生的性质变化。<sup>③</sup>

我们认为，经济一体化和国民经济融入世界体系改变了各国国内“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的平衡，因此不仅塑造了国家作为国际体系中行为单位的能力和偏好，也塑造这些单位作为国家的“国家利益”、塑造了国内“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的构成力量，从而又影响了国家以什么方式进入国际体系、并最终不断重新塑造国际体系。本文建立在批判国际关系理论和“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传统基础上，将新兴经济的崛起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置于资本主义历史演进过程中，再考察这一轮新兴经济体内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最后总结这样的新特征将如何影响到新兴经济融入世界体系的方式和对重整世界秩序的偏好。

## 二、“资本主义多样性”视角下的新兴经济

“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的研究传统对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体内部“国家—社会—市场”或者“国家—资本—劳动”复合体的多样性已多有总结。<sup>④</sup> 这类研究一般以不同的国民经济作为比较研究的单位，集中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不同国民经济的体系性差别，尤其突出各个国民经济内部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多重均衡。但是，这一类研究很少延伸到如此的体系性特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甚至决定这些体系对

---

① 时殷弘：《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6期，第6页。

② 关于新兴经济的崛起是否意味着对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挑战、是否意味着地缘政治的重新回归，见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的辩论：John Ikenberry, “The Illusion of Geo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3 (2014), pp. 80-90; Walter Russell Mead,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3 (2014), pp. 69-79.

③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④ 这方面主要著作是 Peter A. Hall and David W. Soskice (eds.),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关于“国家—市场—社会”复合体的一般研究见 Neil Fligstein, *The Architecture of Markets: An Economic Sociology of 21st Century Capitalist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外伸展的政治表达和行为，或者延伸到这些经济体对于外部规则（诸如“全球治理”）的政治偏好和政治行为。此外，这类研究高度集中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缺少对于其他类型国家和国民经济体的系统研究，对核心国家之外的上述“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的多样性研究还很少，也还没有成熟的分析模型。

另一组动用了“资本主义多样性”概念的研究则已经开始注意到新兴经济的集体共性。一种流行的解释是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来概括这些新兴经济的特征，以凸显他们和现行国际体系内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因为新兴经济体中国家对于国民经济都保持重要的影响力，因此这些经济体正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在欧洲和北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之外提供赶超和实现现代化的另一种可能。西方语境中不乏如此的警告，渣打银行研究部 2007 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和资源民族主义将成为我们时代的两个主要经济议题”；<sup>①</sup> 卡内基基金会的研究认为新兴经济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开始重塑全球化进程；<sup>②</sup> 美国从事政治风险预测的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更是认为，未来全球经济的主旋律就是以中俄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和以欧美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之间的终极对决。<sup>③</sup> 这一类的分析往往从“国家—市场”的两分法出发，把近期新兴经济体中国家地位的上升视为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国家”和“市场”之间钟摆式周期性变化的一个最新阶段。这样的理解只是强调了新兴经济体和核心国家之间的系统差别，但是没有深入分析新兴经济内部国家对于国民经济的特殊作用如何最终反映在这些国家对于世界秩序的偏好上。

寻找资本主义多样性和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有益尝试还包括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的研究，他们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同类别资本主义体系共存的“去中心”的全球体系，而这些体系可以被细分为四种资本主义治理类型：自由民主主义体制、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竞争性威权主义体制和国家官僚主义体制，由此他们还预测了这些不同资本主义体系间的竞争关系。<sup>④</sup> 克里斯托弗·麦克纳利

（Christopher McNally）也初步总结了中国作为资本主义体系一个新形态的特征，并论证中国和其他类似的新兴经济不会直接全面挑战现有的资本

---

① Gerard Lyons, “State Capitalism: The Rise of Sovereign Wealth Funds”, Standard Chartered, 2007.

② Uri Dadush and William Shaw, *Juggernaut: How Emerging Markets Are Reshaping Globalization*,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1.

③ Ian Bremmer, *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 Who Wins the War between States and Corporations?* New York: Portfolio, 2010.

④ 巴里·布赞，乔治·劳森：《资本主义与新兴世界秩序》，《国际安全研究》，2014 年第 1 期。



主义世界体系，而是构成了某种“体制内”（in-system）挑战。<sup>①</sup>但他们的分析都没有深入解释新兴经济代表的某种新型资本主义是如何具体形成对世界秩序的政治偏好，以及他们在试图影响世界秩序时的行为模式。同时上述这些研究中对于“国家资本主义”本身的界定都比较简单，往往只笼统地考虑了国家介入经济程度较高这样的事实，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没有提供历史维度和微观机制。

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我们认为，首先，国际间竞争和世界秩序的性质恰恰与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组织方式密切相关，而国际关系理论中以国际体系为核心分析新兴国家崛起的主流话语和分析框架，往往忽略了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动态特征。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治理的行为，本身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特征所塑造，后者决定了国际体系中不同单位间竞争的具体形式和性质。其次，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代，新兴经济体对于全球治理的偏好与这些经济体自身的社会属性（“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的性质）有关，新兴经济对于世界体系、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需求和主张，很大程度是国内复合体性质的对外映射、甚至复制。第三，成长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时期的新兴经济其内部复合体具有特殊的两重性，而这种两重性决定了，未来新兴经济将努力推动一组平行于现有自由资本主义全球治理的体系。<sup>②</sup>

国际竞争和全球治理的性质由世界体系的主导生产模式所决定，而新兴经济崛起的这个阶段，恰恰是史无前例的跨国交易和要素流动最开放和自由的时期，全球化的地域覆盖范围和跨国融合的程度也都超越此前任何一个资本主义扩张时期。以中国为代表的这一组新兴经济体在冷战后的世界体系里属于“半边缘国家”的地位，通过贸易、人口流动等途径连接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其存在对于维护“中心—边缘”体系的经济和政治稳定都有重要意义，是“世界经济所必须的一个结构性要素”。

<sup>③</sup> 冷战后这些经济体的崛起就是半边缘地区对中心地区的赶超，而诸如“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这样概念的提出本身也是国际资本为寻求新

---

① Christopher McNally, “How Emerging Forms of Capitalism are Changing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Asia-Pacific Issues*, East-West Center, February, 2013.

② Matthew D. Stephen, “Rising Powers, Global Capitalism and Liberal Global Governance: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Account of the BRICs Challeng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0, no. 4 (2014), pp.912-938.

③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p. 230.

增长点而有意建构的结果。<sup>①</sup> 因此，新兴经济的这种赶超具有鲜明的两重性：一方面这些经济体都在冷战末期美国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内获得经济高速增长，是这一轮新自由主义浪潮的获益者，他们的崛起恰恰是逐渐嵌入这个国际体系的过程。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性质又有明显区别于现有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特性，尤其是国家在赶超、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对于冷战后“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新兴经济仅仅是有选择地加以制度化，并且在使用时往往赋予完全不同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在这些经济体的赶超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被得以重新发现和重构，其程度远远超过 1997 年东亚经济危机之后，华盛顿共识内部曾经出现过的相对有限的国家地位上升。<sup>②</sup>

因此，我们的分析如果仅仅停留在国家总体经济规模变化，就不足以准确把握新兴经济、半边缘地区崛起对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影响。研究者需要在历史上传统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争论和实践基础上，审视这一轮国家资本主义的集体特征以及不同国民经济体内部“国家—社会—市场”的不同组合，以便理解这一轮新兴经济赶超对于整个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可能的影响。我们集中关注的恰恰是新兴经济的内部“国家—市场—社会”复合体的性质（即肯尼思·沃尔兹界定的三个层次中的第二层“国家”层面）如何在世界秩序层面得以“外部化”了。<sup>③</sup>

### 三、新兴经济作为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

对于新兴经济或者崛起中的半边缘国家，我们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来把握这组国家的相对共性，这样的共性既是对世界体系外部变化的反应，也是自身对外部世界体系的外向复制和映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虽然在许多不同场合、语境中被动用，其具体界定也多有不同，但概念

① “金砖四国”这一概念最初在 2001 年由美国高盛公司的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Jim O’Neil）提出。关于“金砖国家”概念作为资本主义体系扩张需要而建构产生的结果，参见 Marion Fourcade, “The Material and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the BRICs: Reflections Inspired by the RIPE Special Issu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0, no. 2, pp. 256-267.

② 冷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对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体内部其他类别、尤其是以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协调型资本主义”同样有重大影响。比如在公司治理领域，德国和日本的公司治理体系长期以来与盎格鲁·萨克森公司治理体系有鲜明差别，但是在冷战后都面临向后者靠拢的巨大压力。Alexander Borsch, *Global Pressure, National System: How German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Changing*,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③ 国际关系理论中对于国内政治和国内结构如何“外部化”（externalization）的问题提出，可参考 Peter J. Katzen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0, no. 1 (1976), pp.1-45.

提出对应的根本问题是清楚的。国家资本主义一般被用来指称介于经典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经济政治体制，国家在其中对于控制、管制、引导国民经济起到重要作用。国家在这种体系内一般控制经济体中的绝大部分资本存量，并且利用一系列资本主义的手段和标尺来约束生产和资本，以达到单纯资本主义体系不能达到的一系列目标：比如更快的资本积累、更公平的剩余分配等。这个体系的终极目标一直是利用资本主义体系的优势，同时避免、或者至少控制全面资本主义体系的恶劣后果。

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国家资本主义命题最初也源自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后发展难题。后发展国家在本国寻求独立自主发展时面临两个基本挑战：来自发达国家或者核心国家的资本约束；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脆弱、政治上的不可靠。<sup>①</sup>在这样的双重约束下，如何实现有效的工业化和不受制于先发展国家和国际资本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正是最初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希望回答的终极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中，后发展经济体中的国家成为唯一有能力和政治觉悟来组织领导国内工业化，以及实现最终独立发展道路的政治力量。国内的主导阶级——通常是国家和国内若干社会阶级的联盟——由此达成独立发展的共识，表达了参与独立资本积累的能力和 challenge 国际资本压迫的能力，从而带领国家走上替代性的国家发展道路。<sup>②</sup>

在 20 世纪的世界历史中大致存在三轮国家资本主义的高峰期。第一轮大致开始于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早期苏俄关于工业化的辩论为代表，一直延续到二战以前。二战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轮的发展逻辑，全面的战争经济和以法西斯主义为代表的特殊战时经济形态出现。第二轮国家资本主义的辩论和实践则开始于二战后，尤其是 50 年代中期一直到 70 年代中期。这一轮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讨论和实践与战后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反殖民反霸权运动高度重合，是后者在经济领域的一个反映。此后 70 年代末肇始于英美的新自由主义逐渐占据了全球意识形态和经济竞争的上峰，终结了这一轮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

前两轮国家资本主义实践催生了如下基本共识。<sup>③</sup>国家资本主义最容易出现在国际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又拥有赶超和快速工业化目标的国家，这种体制旨在解决后发展国家受外部资本和殖民势力压迫、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羸弱、大众阶层缺乏组织的问题，以实现独立自主的发展。国家

---

① Vivek Chibber, “Reviving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he Myth of the ‘National Bourgeoisie’”, *The Socialist Register 2005: The Empire Reloaded*, 2005, pp. 226-246.

② James Petras, “State Capitalism and the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8, no. 1 (1977), pp. 1-17.

③ Alex Dupuy and Barry Truchil,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State Capitalism”, *Theory and Society*, vol. 8, no. 1 (1979), pp. 1-38; Raymond D. Duvall and John R. Freeman, “The State and Dependent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 no. 1 (1981), pp. 99-118.

资本主义在利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完成资本积累和扩张的同时，又试图避免资本无度扩张的恶果。其具体政策选择体现在经济领域内的民族主义导向，包括土地改革、资源产业的国有化、财政的中央极权和社会福利领域的扩张、国家直接拥有经济资产、经济计划、一定程度的对外经济保护或者封闭、不同程度的资本社会化等。国家资本主义政权的阶级性质通常表现为国家和国内某些社会阶层（或者阶级）的政治联盟，这些政体内部不同的阶级构成和国家属性使得不同国家资本主义政体呈现不同的政策结果。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一般是国家有效地和主导阶级形成联盟，在引导国家独立发展的根本目标上达成共识，并且有效合作推进资本积累，摆脱对于外部资本主义体系的依赖。<sup>①</sup>但是现实中这样的政策选择并不总能实现成功的工业化或者独立的国家发展，不同的阶级联盟（包括国内和国际的）有可能导致后发展国家之间非常不同的政策结果。<sup>②</sup>

第三轮的国家资本主义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前两轮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际体系的性质来看，第一轮兴起是核心国家忙于一战，无暇顾及边缘地区的结果；第二轮则是美国霸权的逐步削弱和冷战两极竞争为非核心国家提供了对抗“依附”地位的可能。最新这一轮则成长于冷战后新自由主义时期，<sup>③</sup>而这一轮新兴经济实践的国家资本主义呈现出一系列“两重性”特征。

尽管这一轮国家资本主义中的新兴经济体仍然在积极争取外资，但是和第二轮中典型的“依附发展”相比，这些新兴经济对于核心国家的资本依赖程度大大降低。新兴经济或者是在这一轮新自由主义扩张周期之初已经还清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借款（俄罗斯）、或者已经完全独立于国际机构金融支持（中国）。新兴经济体都积累了大量的国际储备，部分国家甚至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sup>④</sup>这些新兴经济因此有能力忽视来自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指令（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条件性”要求 Conditionality），或者至少有能力和国际组织进行谈判、稀释这样的条件

---

① 这一点可以视为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般规律，参见理查德·拉克曼，《国家与权力》，郇菁、张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四章“国家与资本主义发展”。

② 维维克·奇伯（Vivek Chibber）对韩国和印度二战后工业化进程的比较研究就提供了一个阶级联盟的解释：韩国和印度经历了类似的自主工业化政治热潮和政策选择，但是印度大资本家和国家在出口导向政策上的利益分歧导致印度的工业化努力最终失败。Vivek Chibber, *Locked in Place: State-building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Ind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③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④ 张梦洁，“2014年对外投资首破千亿美元；商务部：中国实际已成资本净输出国”，[http://epaper.21cbh.com/html/2015-01/21/content\\_121233.htm?div=-1](http://epaper.21cbh.com/html/2015-01/21/content_121233.htm?div=-1)，登录时间：2015年1月21日。

性要求。因此，和第二轮中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相比，现在新兴经济的国内社会结构比依附情境中要有力得多：他们既不是第一轮国家资本主义时期被核心资本主义国家所忽视的对象，也不是第二轮国家资本主义时期中那些试图自建体系、与核心国家相互竞争的社会主义国家。

冷战后新兴经济在这一轮国家资本主义实践中选择的主体叙述是去意识形态、去政治的，高度一致地借助“现代化”、“发展”、“治理”等形式上政治中立的语汇和政策目标，以求更好更快地融入资本主义体系、实现更迅速的资本积累和扩张。这些国家既没有诉诸前两轮国家资本主义实践中那样高度政治化的政治纲领，没有动用或者公开支持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类对立或者竞争的意识形态话语，也没有采用曾经流行过的全面贸易壁垒、进口替代的政策，以封闭本国市场来谋求独立发展。这样的话语和政策选择都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性的“去政治化”浪潮的一部分。<sup>①</sup>尤其是和冷战时期相比，新兴国家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试图建立一个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相对封闭、自我循环的竞争性体系，即没有重复当年经互会与欧共体、华约与北约之间的体系间竞争。相反，新兴经济不仅努力进入由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而且本身和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相互又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新兴国家作为世界体系中的非核心国家第一次在全球资本市场上扮演活跃角色，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和援助也呈显著上升趋势。<sup>②</sup>大量来自新兴经济的重要国家企业或者主权投资者积极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并且在自身更快资本积累的基础上，逐渐尝试本国资本的海外扩张。

和前两轮国家资本主义相比，现在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国家拥有更多、更复杂的工具来调整自己和国内、国际资本的关系，也更擅长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看似矛盾的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私有化和自由化浪潮反而帮助催生了此后新兴经济中的混合资本主义模式。新兴经济体政府大量采用持有少数股份的方式来影响私人企业的投资决策，实现对大量企业的间接控制，同时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和国

---

①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② 比如，根据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统计，中国在2010和2011两年间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数额已经超过世界银行同期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总额，而近期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以及拟议中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都进一步强化了上述趋势。Geoff Dyer, Jamil Anderlini, and Henny Sender, “China’s Lending Hits New Heights”,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7, 2011, <http://www.ft.com/cms/s/0/488c60f4-2281-11e0-b6a2-00144feab49a.html#axzz3O0yll2XL>, 登录时间：2014年12月25日。

际竞争来约束各种国家企业（不一定是“国有企业”）的行为。<sup>①</sup> 具体到微观层面，比如在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国家对于主要企业的控制非常明显，但是既没有重复社会主义体系时期纵向的全面控制，也没有借助类似韩国或者日本的企业财阀模式。在中国、印度和巴西，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都有可能被国家视为“国家龙头企业”（national champions）：包括追求利润目标和竞争驱动的国家控制企业、上市但是国家拥有控股权的国家企业、私营或者公私混合的企业，甚至大型私营企业。<sup>②</sup> 类似的，印度公司治理结构的主导模式也不是由分散的外部股东或者有组织的国际资本市场参与者（比如投资基金）控制，而是更多地由家族集团（主要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和国家（主要在第一产业）保持实质控制。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来自新兴经济的“国有企业在国有部门总体收缩的前提下，变得更富有、更强大，而政府在私营部门增长的同时对于经济制高点的控制却在加强。”<sup>③</sup> 在这些经济体中还涌现出一批“国家龙头企业”，其主要股份往往为非国家行为人（包括国外的投资者）所控制，但是从本国政府那里获得大量支持。<sup>④</sup> 由此近期出现的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是，来自新兴经济的各类国家企业大量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在诸如美国《财富》（Fortune）杂志的年度世界 500 强企业排行榜上，来自新兴经济的大企业中带有国家企业色彩、但同时又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上市交易的占据多数。和以前常见的将国有企业交给官僚或者恩宠关系中的下属来管理不同，现在国家企业越来越多由职业经理人来管理。<sup>⑤</sup>

借助于外部市场的发展和新资本工具的发展，国家可以在对于经济直接介入下降的前提下实现更有效的控制。来自新兴经济的诸如国家发展银行和国家财富基金等主权经济主体在国内外都有越来越活跃的表现，“国家发展”或者“国民经济发展”的概念在这些经济体内部也被重新提出。

---

① Aldo Musacchio and Sérgio G. Lazzarini, *Reinventing State Capitalism: Leviathan in Business, Brazil and Beyo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② 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7, p. 361.

③ The Economist, “Special Report: State Capitalism”, *The Economist*, Jan, 21st, 2012.

④ Aldo Musacchio and Francisco Flores-Macias, “The Retur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April 4th, 2009.

⑤ The Economist, “Special Report: State Capitalism”, *The Economist*, Jan, 21st, 2012.

① 虽然金砖国家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实施的发展战略“总体上让人想起战后第三世界的经济民族主义”<sup>②</sup>，但是和曾经在后发展国家中广泛采用的进口替代模式不同，新兴经济没有诉诸于全面的产业保护和贸易壁垒，而是通过优惠贷款、外资引导等做法试图塑造和维持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性的产业。<sup>③</sup>

总体而言，目前新兴经济体的国家资本主义既不是对“华盛顿共识”政策主张的全盘接受，也不是对这一套意识形态和政策组合的革命性背离，而是对“华盛顿共识”的政策组合高度选择性的运用，部分混合了新自由主义和发展主义政策目标和工具。过去二十多年“新兴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兴起是这些经济体中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特定的变迁条件下，逐渐发展出与国内外资本新型的互动关系，而逐渐达到比现有核心发达国家更高速资本积累的结果。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变化和这些新兴经济体国内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则共同催生出了新的主权经济主体和行为模式，并且开始重塑国际层面的规则与秩序。

## 四、新兴经济体赶超对世界体系秩序的影响：平行体系的出现

① 新兴经济体内部国家控制和监管经济能力的增强是一个普遍现象，除了中国之外，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类似的趋势在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家也同样出现。比如，在中国和印度即便在自由主义改革高峰开始之后的90年代，两国都保留、重组甚至强化了各自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和“计划委员会”，而俄罗斯自2005年开始全面实行多项大规模的“国民计划”（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проекты）。中国的情况参见 Dali Yang, *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俄罗斯的情况可参见 张昕：《国家资本主义、私有化与精英斗争：近期俄罗斯“国家—资本”关系的两重逻辑》，《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6期。巴西的情况可参见 Cornel Ban, “Brazil’s Liberal Neo-developmentalism: New Paradigm or Edited Orthodox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0, no. 2, 2013, pp. 298-331。印度的情况可参见 Atul Kohli, “Politics of Economic Growth in India, 1980-2005: part II: the 1990’s and Beyon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41, no. 14 (2006), pp.1361-1370。

② Sarah Babb,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s Transnational Policy Paradigm: Its Origins, Trajectory and Likely Successo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0, no. 2 (2013), p. 285.

③ 印度90年代自由化改革中重新调整了自己的产业政策，其中最重要的内通之一是建立了“国营部门企业”体系，该政策文件的标题本身就很能说明印度新产业政策的重点：“将部分国营部门企业转变成为全球巨人：赋予更多的自治权”。（“Turning selected public sector enterprises into global giants – grant of autonomy”，[http://dpe.nic.in/e\\_documents/archives/Guidelines/navmini/nm1](http://dpe.nic.in/e_documents/archives/Guidelines/navmini/nm1)，登录时间：2014年1月10日）。

新兴经济体崛起对世界体系的影响，仅仅是更换了一个或者一组新的核心国家、实现了新资本主义霸权对老资本主义霸权的代际更替，还是有可能开启一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时代？现有的“挑战论”没有清楚界定替代性的新体系、新规则的根本性质，而类似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于金砖国家合作提出的目标：“主持公道、弘扬正义，致力于建设公平公正的美好世界”，虽然的确描绘了美好的愿景，但实现这样宏大目标的具体制度安排则仍然不清楚。<sup>①</sup> 而如果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对于现有国际治理的改革诉求真的如二十国集团所总结的那样，是为了“这些（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自由主义）制度更好地反映世界经济内经济实力分布的变化，并增强这些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sup>②</sup>，那么挑战的结果可能仅仅是现有世界体系内部“中心”与“边缘地区”的换位而已。

新兴经济体在冷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崛起具有两重性：他们一方面依赖、嵌入现存的全球治理机制，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内部的“国家—市场—社会”复合体的性质又注定会逐渐侵蚀现有国际体系最本质的自由资本主义性质，这使得这一轮的新兴经济体不同于此前的“挑战者国家”（contender states），而呈现出“融入型的国家资本主义”（integrated state capitalism）的两重性。<sup>③</sup>

### （一）宏观层面平行体系的性质

正因为上述的两重性特征，新兴经济崛起给未来国际治理带来的将是一组以新兴经济主导的国际治理机制，这些机制平行于、但不直接挑战现有的自由资本主义治理机制。中国学者中对于这种平行机制在规范意义上的合理性已有所论证，比如“平行推进全球治理，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表述已经被提出。<sup>④</sup> 而现实中，新兴经济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融入式挑战”也确实已经体现出构建“平行体系”的努力，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中体量最大的国家在这方面又是表现最突出、最活跃的成员。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已经在一系列国际制度领域开始倡议、主导建立这样

① 习近平，“新起点、新愿景、新动力：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上的讲话”，巴西福塔莱萨2014年7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7/16/c\\_11111643475.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7/16/c_11111643475.htm)，登录时间：2014年12月10日。

② G20, “Declaration. Summit on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World-Economy”, November 15, 2008. <http://www.g20.org/images/stories/docs/eng/washington.pdf>., 登录时间: 2014年4月15日。

③ Matthew D. Stephen, “Rising Powers, Global Capitalism and Liberal Global Governance: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Account of the BRICs Challeng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0, no. 4 (2014), p. 914.

④ 张幼文，在“西方制裁俄罗斯及其对金砖合作的影响”研讨会上的发言，复旦大学金砖中心，2015年1月22日。



的平行体系，表 1 中整理了 2000 年以来这类中国主导或者倡议的具备平行特征的地区、国际或者全球的机制或者组织。<sup>①</sup>

虽然这样的平行体系还在形成中，其基本属性也还在逐渐稳定中，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上述平行体系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新兴经济将全面退出现有的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也不代表全面摧毁现有的多边和国际机制，或者追求彻底回归之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对立竞争时的态势。一个例证就是虽然新兴经济已经开始动用“新南南合作”之类的话语，但是这类话语对于现有国际秩序或者全球治理的冲击和此前第三世界政治运动（比如不结盟运动和 77 国集团、以及 70 年代对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追求）有所不同。更准确的认识是，新兴经济使用“新南南合作”的话语主要是为了在与美国主导体系谈判时获得更好的谈判地位，新兴经济使用的其他话语工具和具体政策倡议也应该这样理解。

另一个由两重性特征导致的重要结果是：和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之间“非友即敌”的选择完全不同，现在平行体系中的非核心国家并不需要在不同的平行体系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完全有可能、甚至应该同时参与两个平行体系中的制度安排。中国倡导组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就是一个例证。虽然美国一直将亚投行视为自己主导国际开发金融体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直接竞争者，努力影响自己的政治盟友和经济伙伴不要加入亚投行，这些国家也确实表现犹豫，但是在 2015 年 3 月 12 日，英国作为首个欧洲国家、西方大国率先申请成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国，此后整个形势发生迅速变化，包括法国、意大利、德国在内的欧洲经济大国纷纷跟进。截至 2015 年 4 月 15 日，共有 57 个国家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英国等美国传统盟友在亚投行中的选择恰恰体现了世界秩序中正在兴起的平行体系并不需要一边倒式的选择。

## （二）微观层面的竞争潜力

在宏观层面的“平行体系”之外，我们还应该关注新兴经济体系的内部微观层面，根据这些经济体内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来推断新兴经济和现行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通行规则有什么样的不同，因为这样的不同正隐含着未来推动国际秩序、全球治理变迁的动力。借助“资本主义多样性”的已有研究，我们初步考察了资本主义体系几个重要的微观维度。

1. 公司治理。自由资本主义体系中公司产权相对分散、强调对于小股东的外部法律保护，而新兴经济体国内企业总体上产权集中程度高，对于小股东的保护（尤其是正式法律保护）的重要性相对较低。自由资本主

---

<sup>①</sup> 其他新兴国家也有类似的尝试，比如俄罗斯主导推进的欧亚经济联盟、俄罗斯在国际支付领域加大卢布作为国际定价和支付货币的努力等。限于篇幅，表 1 仅整理了中国的相关制度安排。

义体系在冷战后一直着力推行开放的企业资本控制市场和透明的财务会计制度，尤其是由经合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推动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公司治理规范。<sup>①</sup> 但是包括新兴经济在内的其他类型的经济体与这类公司治理标准之间的矛盾正在上升，在近几年的地区贸易协定谈判中，中国和巴西都已经拒绝按照上述规则公布公司治理的信息。

2. 企业融资。新兴经济中企业融资总体上更依赖大型银行（包括各种性质的国家银行）和其他国内的融资形式，更加依赖长期资本。这些经济体对国际资本市场和证券投资依赖较少，国内的法律制度对于外国资本流动也设定了较多的限制。这些都和盎格鲁·萨克森体系内的金融市场形成鲜明差别。面对国际金融体系目前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新兴经济体大多采用了各种防御策略：诸如巴西这样在新兴经济内部相对更接近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还是逐渐走向资本管制，而俄罗斯在 2014 年底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和国际能源价格低落导致的资本外流和本币大幅下跌，也开始实行实质上的部分资本管制。<sup>②</sup> 此外，在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国家发展银行之类政策银行的贷款政策为本国企业提供优惠条件，在现有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被视为不公平竞争政策。而新兴经济又恰恰普遍使用国家政策银行制度。<sup>③</sup> 总体上，目前自由资本主义体系最核心的目标（“资本自由”和金融全球化）与新兴经济体减少金融风险、保证经济稳定的目标相抵触。因此，在向非西方国家推广作为资本项目管制、银行管制的重要国际规则巴塞尔 III 时，包括金砖国家在内发展中国家普遍行动迟缓、不愿全面接受。<sup>④</sup>

3. 劳资关系。新兴经济对外一般拒绝跨国干预本国内部的劳工事务，反对接受西方国家提出的最低劳工标准、企业社会责任等标准，这方面的矛盾在诸如中美贸易谈判等场合已经凸显。总体上，新兴经济希望保持自己在这个领域的经济主权和政策灵活性。

---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动的《关于遵循标准和编码的报告》（Reports on the Observance of Standards and Codes, ROSC）在国家层面公司治理的标准基本就是沿用经合组织制定的、最初针对七国集团的公司治理标准，后者的具体内容可参见“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http://www.oecd.org/daf/ca/oecdprinciplesofcorporategovernance.htm>，登录时间：2015 年 1 月 5 日。

② 张昕，“俄罗斯：全面危机还未开始？”，澎湃新闻，2014 年 12 月 31 日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0008](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0008)，登录时间，2015 年 1 月 3 日。

③ 近期国家开发银行制度的跨国经验总结见 R. Culpeper, “Financial Sector Polic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ake of the Global Crisis: The Rol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3, no. 3 (2012), pp. 383-403.

④ 巴曙松、张晓龙、朱元倩：《巴塞尔协议III在发展中国家的实施及其影响》，《海南金融》2012 年第 9 期。

4. 技术创新。目前新兴经济体在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赶超过程中，仍然高度依赖“逆向工程”的做法，对知识产权保护实行较为宽松的标准，因此与现行的国际知识产权体系有冲突。新兴经济也更加坚持知识产权领域的国家管辖原则，反对目前发达国家企业对于新技术的排他性使用。这方面的冲突在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谈判过程中已经体现：新兴经济对于这套规则的推行迟缓。由于谈判中赋予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过渡期已经结束，之后西方国家将加大力度促使新兴国家全面严格执行 TRIPS 责任，两种资本主义体系间的矛盾也会相应上升。

### （三）“平行体系”的长期表现

新兴国家本身有动力保持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更好利用自己成长环境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但是这些经济体的内部性质又与现有国际治理结构有冲突。目前已有的一些变化可能昭示着某种互相交叠体系共存的长周期的开始，而上述“平行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则取决于新兴经济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性质变化。

第二轮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不同的国家经历了不同的阶级联合，领导工业化和独立发展的国家或是依靠包括军队、官僚和公务员等在内的中间阶层；或者和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达成妥协，成为保守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由代表国家的官僚阶层演变成为实质上的资产阶级，与职业人士和土地所有阶层结成联盟、对抗工农。这些不同的国内政治联盟塑造了第二轮国家资本主义最终在独立发展上的不同结果。类似的，现在的新兴经济对外政治主张的结果也将高度依赖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内部性质，而现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两重性意味着其实质还不明朗。两重性在这个领域的一个具体表现是，现在的新兴经济体在不断融入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同时，伴生的是某些支持进一步融入和介入全球经济的国内政治组织的出现。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新兴经济体内部这一类资产阶级还远远没有被国际资产阶级精英网络所全面接受。<sup>①</sup>

新兴经济崛起对于世界秩序的悖论或许在于：曾经由社会主义国家试图实现的目标，现在有可能要由更深根植于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资本主义政体来完成，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beat them at their own game”）是否可能？回答这些问题仅仅关注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是不够的，必须回到新兴经济体内部的阶级构成、国家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国家的政治属性，这些将是决定新兴经济未来对于国际治理影响的决定因素，也是今后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的领域。

<sup>①</sup> Matthew D. Stephen, “Rising Powers, Global Capitalism and Liberal Global Governance: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Account of the BRICs Challeng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0, no. 4 (2014), p.913.

表 1 2000 年以来中国倡议或者主导的平行、替代体系结构

领域	中国	现行体系
金融与货币领域	中国银联	维萨 Visa、万事达 Master
	人民币国际化（具体包括 2008 年底以来三十项货币互换协议等）	美元
	金砖国家发展银行	世界银行、其他区域性开发银行
	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
	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	包括 CHIPS 在内的现有国际支付体系
	世评集团	标准普尔、穆迪、惠誉
	清迈倡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
贸易与投资领域	中欧、中美投资协定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亚太自由贸易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安全领域	上海合作组织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北约（在中亚）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东盟地区论坛
外交论坛	金砖国家峰会	七国集团（八国集团）
	中非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论坛、亚洲合作对话、中国—拉共体论坛	由美国或者欧盟倡导组织的地区论坛
	博鳌亚洲论坛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技术领域	国际电信联盟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
	本国硬件软件编码标准	美国主导的全球网络基础设施

\*表 1 中的信息根据以下报告以及作者自己搜集的信息整理而成：Sebastian Heilmann, Moritz Rudolf, Mikko Huorati and Johannes Buckow, “China’s shadow Foreign Policy: Parallel Structures Challenge the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Order”, China Monitor,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No. 18, 2014.

（责任编辑：夏真真、刘畅）

## 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下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内涵、认知与挑战

万青松\*

**【摘要】**“一带一路”作为新一届中国政府的一种创新提法，亟需我们丰富这项宏大倡议的内涵与意义。本文提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需要跳出传统区域一体化模式，遵循各国协商一致、国家主权完整、互不干涉的构建原则。全球化受阻，地区层面的聚焦也需要“丝绸之路经济带”倡导一种开放、包容、共赢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甚至成为跨区域机制构建的一次重要试验。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可遵循试错的推进逻辑，不急于推出导致相互抵冲的总体性机制建构。与此同时，欧亚地区各国迄今没有彻底完成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尚未最终确定的国际边界以及来自各方尚存的旧式意识形态残余构成了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三大障碍。如何妥善应对，这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关键词】** 丝绸之路经济带；内涵；认知；挑战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继访问周边两个大国：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以及东南亚大国——印度尼西亚，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简称“一带一路”），得到了国内各界以及世界舆论的高度关注。国内外学界的许多学者也进行了大量探讨和解读，但观点各异，持欢迎、响应、曲解、醋意态度者均有之。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一带一路”的概念界定、内涵与外延尚未达成统一见解，学者们在总体方向、具体步骤、合作形式、运作机制等原则性和关键性问题上也未形成共识。<sup>①</sup>比如，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崛起的大战略<sup>②</sup>，也有学者认为是中国经济合作战略<sup>③</sup>、经济发展设计和周边

\* 万青松，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政治学博士后。

① 杨成：《新大陆主义：跨欧亚一体化的战略图景》，《文化纵横》，2015年第3期。

② 黄仁伟：《建设新思路的战略考量》，《社会观察》，2014年第6期；姚勤华：《“一带一路”系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社会观察》，2015年第6期。

③ 黄益平：《中国经济外交战略下的一带一路》，《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

合作发展的倡议<sup>①</sup>，还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践行新国际主义外交原则的重要领域<sup>②</sup>，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此举意在重构欧亚大陆国际秩序<sup>③</sup>。到底“一带一路”是地缘政治战略、经济合作战略、外交战略还是国家发展战略，迄今没有明确的定论。还有学者将“一带一路”概念进行泛化，比如，“一带一路”覆盖的范围应该包括欧洲和非洲在内的整个世界，其内容也由原先发展与周边国家战略友好关系泛化到目前的经济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sup>④</sup>这种战略概念、性质、内容与目标的不明确最终将会对中国的对外战略倡议造成不可估计的负面影响。鉴于此，有必要将“一带一路”的内涵和意义进一步丰富、充实。由于“一带一路”是一个统一的提法，但涉及具体范围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下文我们将围绕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进行研究，期望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贡献自己的智慧。

## 一、新形势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作为新一届中国政府的一种创新提法，目前没有现成的理论框架可以借用。现有的国际区域合作理论以及转型国家自身发展经验尚不能完全支撑当前地区以及国家间关系迅速发展所呈现出的新局面。亟需我们就这一问题展开系统研究，阐释这项宏大倡议的内涵与意义，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顺利实施以及国家间关系发展提供重要理论支撑，同时也会丰富国际区域合作理论的分析视角。下文我们将就“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应该呈现出的内涵与意义展开论述。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区域一体化模式，也不会追求类似 TPP 的高标准，而是遵循协商一致、国家主权完整、互不干涉等原则。**

综观世界各个地区已有的一体化实践，我们可以大体总结出三种区域一体化发展模式，即代表发达国家的区域一体化模式、代表发展中国家的

① 唐朱昌：《“一带一路”的定位、风险与合作》，《社会观察》，2015年第6期。

② 袁胜育，汪伟民：《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的中亚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

③ 胡键：《“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欧亚大陆秩序的重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4期。

④ 阎学通：《外交概念泛化有损世界理解中国》，《国际先驱导报》，2015年7月8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bjzd/20150708126590\\_2.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bjzd/20150708126590_2.html)

区域一体化模式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混合型区域一体化模式。这三种区域一体化模式分别对应欧盟、东盟和北美自贸区三大区域。

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欧盟一体化以其一体化程度之高、经济实力之强和对世界发展影响之大被公认为当今世界最成功的区域一体化实践。参与国通过包括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统一经济空间、经济联盟在内的多种表现形式，分阶段、有步骤地构建一个集政治、经济、科技、外交、军事、文化、司法为一体的超国家调节机构。该机构拥有超国家权力，通过超国家性的宏观调控来推进本区域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换句话说，欧盟一体化的参与国不得不突破现代民族国家界限，通过转移本国部分国家主权来建立超国家调节机制，致力于构建独特的区域一体化模式。事实证明，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欧洲国家探索深化区域合作的一次大胆尝试，创造了国际区域合作的新准则和新理念。虽然欧洲一体化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甚至将来都可能会遭受不同程度的挫折，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区域一体化模式，成为欧洲以外的其他区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争相模仿的榜样。

亚太地区一体化实践相对成功的案例要属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冷战结束后，东盟逐渐把合作的侧重点由政治安全转向经济合作，最终在推进区域一体化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东盟的意义在于为地区合作贡献了至今仍然适用的“东盟模式”，其核心内容是协商一致、重视国家舒适度、不干涉内政。<sup>①</sup>这三大原则迄今为止总体上保持了东南亚地区各国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指出，“东盟模式”的消极结果表现为，由于东南亚国家重视协商一致和舒适度，最终必然导致制度建设的滞后和降低制度的有效性。<sup>②</sup>

北美地区的一体化实践主要体现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成功运行。三个成员国——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致力于打破传统理论认识，比如，西方国家以意识形态设置障碍，采取对发展中国家歧视性的政策，力图把北美自由贸易区建成典型的南北合作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从而为在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建立南北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提供成功范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给南北国家在区域范围内利用自由贸易区进行合作开创了先河，从而给世人以巨大的启示，具有一定的

---

① 黄大慧，韩爱勇：《东亚地区主义研究评析》，《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

② 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

示范效应。

通过对上述三大区域一体化模式的分析，我们自然而然地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即这三种模式是否适用于阐释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结合“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在的欧亚地区的实际情况。首先，由于欧亚大陆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远远没有达到欧盟国家那么高的工业化水平，加之大部分转型国家迄今仍没有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它们对国家主权的问题表现得十分敏感，很难复制欧盟从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统一经济空间到经济联盟，最后实现全面一体化的路径。由此不难看出，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区域一体化模式不适用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其次，虽然当前自贸区成为了世界许多国家间加深合作的重要战略选择之一，但是具体到欧亚大陆，情况则不一样，比如，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国家对于中国建立自贸区都持消极态度，迄今为止，不管是在建立双边还是多边自贸区问题上，这些国家基本上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担心与中国建自贸区会对本国工农业造成巨大冲击，最终使本国经济发展遭受巨大损失。如果“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目标，那么其结果可想而知。此外，欧亚大陆目前尚不具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自贸区的条件，因此，以北美自贸区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混合型区域一体化模式也不适合。最后，虽然代表发展中国家的东盟一体化模式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比如，这种松散的机制导致区域制度建设滞后，制度的有效性也随之降低，但值得借鉴的是东盟国家在推进区域合作进程中所遵循的协商一致，国家主权完整，不干涉等原则，对丰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和意义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既然传统的区域一体化模式大体上都不适用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那么刚刚完成谈判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否适用呢？值得关注的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突破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模式，达成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内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议。有学者指出，它的核心内容是“企业与政府争端解决机制”（ISDS），该机制为跨国企业在法律上对抗政府管理命令提供帮助，使跨国资本第一次得以明目张胆地挑战国家主权。<sup>①</sup>这意味着，TPP 将是以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为主导、以高层次市场合作为基础的新型区域组织，旨在通过跨国企业的“经贸活动”

<sup>①</sup>《郎咸平解读 TPP：跨国资本将挑战国家主权》，观察者网，2015年10月21日，[http://www.guancha.cn/video/2015\\_10\\_21\\_338352.shtml](http://www.guancha.cn/video/2015_10_21_338352.shtml)



深刻影响各国的经济、社会、政治环境，重新掌握世界秩序。显然，这样的跨区域合作组织将对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鉴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高标准市场原则，特别是其中蕴含跨国资本挑战国家主权的条款，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多数国家来说，目前既不具备达到这些高标准条件的现实基础，也没有准备好完全接受它们。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也不会追求类似 TPP 的高标准。

由此可见，已有的区域一体化模式和目前更高层次的区域合作模式大体都不适用于阐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与意义。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需要跳出传统的区域一体化模式。它的建设既不是通过建立类似于欧盟的超国家调节机构，也不是通过组建排他性区域联盟的方式，还不是以高层次市场合作为基础打造的综合性自由贸易新模式来推动，而是遵循各国协商一致，国家主权完整，互不干涉等原则基础之上，以平等、互利、共赢的方式来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二）随着全球化受阻，区域化浪潮的再次涌现，地区层面的聚焦需要“丝绸之路经济带”倡导一种开放、包容、共赢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

2008 年底的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当今世界发生复杂深刻变化，国际关系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政治经济领域的竞争加剧。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新一轮深刻调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全球层面正在出现急剧变化，全球化过程面临抵制、抗争，陷入一个复杂局面。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全球贸易体制受阻——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多边体制进展艰难。虽然这些全球性的多边贸易与金融体制曾经长期推动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新世纪以来，除了个别领域的局部进展之外，总体上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

**其二**，大众商品和资源价格波动使得全球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大众商品与资源能源价格的起落，既表明商品与资源的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越来越紧密关联，全球经济互不可分，也充分地显示出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深刻的结构性矛盾。

**其三**，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信息革命在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却在如何平衡传统管理模式和超越国界、超越法权、甚至超越个人隐私的巨大信

息流量的冲击之间，发生着尖锐的碰撞。与此同时，社会各阶层的贫富差距的扩大也越来越引起普遍的不满，从而成为一系列动荡的根源。<sup>①</sup>

**其四**，全球需求结构也出现明显变化。受欧美经济增长乏力影响，欧美国家调整过去高消费、低储蓄、多借债的消费方式，给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新兴国家的外需提出了尖锐挑战。虽然 2008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使西方国家遭受重创，新兴经济体国家展现活力，实力和地位相对上升，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关系调整中，新兴国家并非全无“短板”，当前几乎所有新兴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都面临一定程度的问题，开始加大对所在地区的经营力度。

与全球化进程呈现停滞不前现象截然相反的是，地区层面的竞争与合作态势正在重新成为国际博弈一个聚焦点，以地区为单位的世界政治经济呈现出区域整合与区域国家集团之间合作与竞争的发展态势。

具体而言，当前地区层面的政治、安全关系呈现矛盾多发，不稳定因素增多等特点。围绕“单极”、“两极”与“多极”、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斗争表现得越来越尖锐和激烈。美国为维护其超级大国地位，与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之间矛盾突出。在亚太地区，采取“再平衡”战略，强化美日、美韩、美澳军事同盟，积极拉拢印度，利用南海问题极力挑唆东盟国家和中国的矛盾，鼓动一些与中国有岛礁或领海争议的国家向中国发起挑衅和激化矛盾。在欧亚地区，乌克兰危机引发美俄新一轮博弈，美俄关系的持续对抗对欧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在中东地区，虽然奥巴马一度调整战略，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撤军，但这些举措并未使这一多年持续动荡地区转危为安。2015 年 10 月初，俄罗斯出兵叙利亚开展军事行动，这是俄自苏联解体以来首次在海外派军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深度介入中东地区事务，地区形势持续动荡。欧亚大陆周边地区的矛盾再次错综交叉，彰显短期内难以缓解的态势。

与此同时，地区经济关系也经历着新的变化。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并没有完全走出困境，复苏进程充满了曲折和艰难，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也有所抬头。美国试图改写多边投资贸易规则，大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进程，制定新一轮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企图排挤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新兴国家。

---

<sup>①</sup> 经冯绍雷教授同意，此处引自冯教授 2015 年 10 月尚未刊发的文稿《中国对外战略演进的背景和前景》。

此举不仅会进一步加剧地区形势的动荡与不安，而且将会极大地激起发展中国家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诉求。更令人担忧的消息是，2015年10月5日，美国、日本和其他10个泛太平洋国家就TPP达成一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最终取得实质性突破。这意味着即将来临的一个突出变化是以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为主导、以“高层次市场合作”为基础、并带有明显地域分割性的区域合作组织的构建正在加快步伐。毫无疑问，TPP的出现既会对现有的各个地区多边和双边经济合作框架起到引领作用，但同时也会对区域合作的开展形成一定程度的挑战。显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以地区为基点，围绕区域间、区域内不同的合作模式将会展开激烈的竞争。

上述地区层面的发展态势显然会对中国正在推进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造成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选择不应该是加入这场没有赢者的激烈区域竞争中，而是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倡导一种更具开放、包容、共赢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将区域间、区域内不同合作模式的竞争转化为它们之间的合作、共处。这样的区域模式旨在促进本地区内、地区之间不同政治制度、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资源禀赋的国家之间开展更加开放、包容、共赢的平等合作，这也是推进区域合作的必经之路。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受阻，区域化浪潮再次涌现的背景之下，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一种全新的合作理念与模式，致力于保持区域内各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定位为一种区域间合作的新模式，甚至成为跨区域合作机制构建的一次重要试验。**

如果区域内存在各种制度安排，它们的存在既不能解决地区面临的各种问题，也没有推动国家间的有效合作，而是成为区域内各国，抑或域外国家之间权力竞争的手段和工具，那么可能的结果就是，这些制度安排最终不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运行效率低下，甚至相互牵制各自的发展。长期以来，就会出现大国动力不足，中小国家观望和推诿的问题。在全球化进程受阻，地区层面正成为国际地缘政治经济竞争与合作焦点的背景之下，当下尤为需要关注的是，如何避免使针对同一地区，但来自不同方向的区域合作机制之间出现对冲，最终导致危机。这方面的案例正在我们的眼前上演。

在欧亚大陆的西端，欧盟在2009年5月7日，与乌克兰、白俄罗斯、

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六国正式启动了“东方伙伴关系”计划。该计划旨在促进经济一体化和流动性，使欧盟在维护地区安全与解决冲突时拥有更多渠道。欧盟还将与这些国家逐一建立自由贸易区、为其公民进入欧盟提供签证便利、加强能源安全、提高财政援助，密切安全与防御问题的磋商。但是，欧盟这种鼓励邻国之间强化区域合作的计划却与俄罗斯领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迎头相撞，最终成为乌克兰危机的导火索。究其根源，有学者指出，除了与欧盟和俄罗斯之间怀有观念性对立的区域扩张过程密切相关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欧盟的“东方伙伴关系”计划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是两个在原苏联地区相向而行、具有高度竞争关系的地区一体化计划，这两个区域方案之间的零和式博弈最终导致双方间的尖锐矛盾。换句话说，虽然欧盟与俄罗斯的一体化方案都有着一整套自我论证的逻辑依据，但是在欧亚地区文明结合部的复杂条件之下，要以零和式博弈的一方通吃，解决像乌克兰这样居于文明结合部的国家取向问题，不光难以奏效，而且势必导致各方的连锁反应。总体而言，“东方伙伴关系”计划推进在先，而作为地缘政治反应的“欧亚经济联盟”形成在后，作为成熟的民主与市场体制和区域合作先行者的欧盟，自然会具有较多的国际吸引力，但是，欧盟据此不顾曾被视为“伙伴”的俄罗斯利益，对于失却近邻依傍之后俄方的实际感受视而不见，并且缺乏明确战略目标。<sup>①</sup>在此情况下，不难预测，地区危机迟早会爆发。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围绕区域合作机制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中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重要启示。

在欧亚大陆的东端，事实上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也面临着类似区域合作机制重叠、竞争的问题。<sup>②</sup>如果处理不好，不排除中国会重蹈欧盟与俄罗斯之间覆辙的可能性。鉴于此，“丝绸之路经济带”显然不能重复这样的路径，更为合理的选择是定位成一种区域间合作的新模式，甚至成为跨区域合作机制构建的一次重要试验。这样的合作新模式旨在为跨地区或地区之间提供合作平台，再通过这一平台建立及时有效地对话与沟通机制，使在推进相向而行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不仅要适应欧亚大

① 冯绍雷：《欧盟与俄罗斯：缘何从合作走向对立？——论围绕乌克兰“东—西”取向的三边博弈》，《欧洲研究》，2015年第4期，第57-58页。

② 王树春，万青松：《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关系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3期；王树春，朱震：《上海合作组织与集安组织为何合作大于竞争》，《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期。

陆社会经济发展多样性特征，而且还应该超越区域范围，更具开放性。

##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一种具体描述

对中国这样一个区域合作的后来者而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可以作为中国对外战略的一个长期的重点努力方向。它的内涵恐怕一时间还很难做出非常系统、完整的理论性阐释。就当前而言，“丝绸之路经济带”若仅被称为“构想”，可能不足以反映中国正在切实推进的一系列实际步骤；若称为完整的“战略”，在实现具体的目标方面又具有需要经过充分合作与互动，才能够最终获取重大成果的特点。

鉴于此，近期而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更为现实的选择是遵循试错式的推进逻辑，即通过项目合作的方式，了解和研究合作对象，取得合作的共同收益，拓展发展空间，实现互联互通、优势互补。也就是以渐进的方式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而不急于推出导致相互抵冲的总体性机制建构。这对当下中国来说，或许是一种更为合理的选择。犹如中国古代圣贤所说：“上善若水”，意即：Perfect mastery works like water。换句话说，“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推广和赋予实施，就像水之流动，无所不在，无处不去，不与任何地区的已有体制和机制冲撞，更不搞“赢者通吃”，相反，通过一项一项具体项目合作的谈判，以及一款一款双边或多边合作协定的签订，来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sup>①</sup>

从长期来看，考虑到当今世界区域化进程中经常可见的，针对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合作组织和战略之间的对冲，造成了严重的地区危机。由于这样的前车之鉴，“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国有力的经济实力支撑下，注重在各不相同的区域体制之间起到相互连接的作用，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直以来，地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西欧与东亚，相对取得了比较好的发展条件和机遇。但是，欧亚大陆的中部则面临着更多的来自自然环境和发展机遇方面的困难和挑战。因此，通过跨区域的互利合作，实现西欧、东亚与欧亚的共同发展，乃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在更长时期内更值得关注的一个基本理念。欧亚地区如果不能获得更多发展的机遇与条件，从长时段看，无论对谁都不是一件好事。这也是中国人在那么多年努力工作，也是从国际合作中获得实惠之后，需要对国际社会——先从邻近

---

<sup>①</sup> 经冯绍雷教授同意，此处引自冯教授2015年10月尚未刊发的文稿《中国对外战略演进的背景和前景》。

地区开始做起的一个回报。此外，我们应该估计到，新的跨区域合作机制的建构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较长时间。

###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面临的挑战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地估计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欧亚地区各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尚未完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展开。

虽然目前西方的民族国家理念已普遍为世界所接受，且这一理念在推进国际合作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欧盟内部的区域合作就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但是，往往被忽视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欧洲式的民族国家理念并不能够简单地用作理解当今国际进程的普适性基础。需要注意的是，不管就经济水平，还是制度水平而言，欧亚内陆地区仍然处于相对不发达的状态，区域内的国家迄今为止没有彻底完成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这里的情况与美国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以及欧洲的“后现代”国家发展阶段相距甚远。基于这一前提下的各方认知差异，以及内部政治对于外部政治的影响始终会对跨国合作的开展构成难以估计的挑战。

对于欧亚各国来说，如何完善民主制度来推进国家政治体制的建设，如何继续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如何平衡国内民众的政治诉求等，都是摆在它们面前的重大课题，而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也会加剧这些国家转型的困难与挑战。因此，受制于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各国对跨国、跨区域的合作态度摇摆不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推进的广度和深度。

#### （二）欧亚地区的国际边界尚未最终确定，同样影响着跨国合作的开展。

边界是一种划分不同政治实体及其管辖地域的政治地理界线。<sup>①</sup>就国家层面而言，作为一条独特的地理界线，国际边界具有明显的政治、军事属性，能够明显地反映国家间关系的亲疏远近。根据这些特性，可以把跨

<sup>①</sup> 汤建中：《边界效应与跨国界经济合作的地域模式——以东亚地区为例》，《人文地理》，2002年第1期，第9页。

国边界分为封闭型、半封闭型和开放型三种类型。<sup>①</sup>封闭型边界具有明显的屏障效应，它中断了两侧的空间联系和经贸往来；开放型边界和半封闭型边界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现出边界的中介效应，即具有彼此接触和交流的空间中介。此外，随着边界地区形势变化，还会出现由封闭型边界向半封闭型与开放型边界的转化。

具体到欧亚地区而言，由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没有对自己即将获得的独立地位做好充分准备，一旦苏联原有经济链条和计划分工体制被打破，各独立国家将会因自身存在的政治经济软肋而虚弱不堪，处于混乱状态。部分国家在涉及到国家边界争端上更是纷争不断，甚至不惜诉诸战争的方式去解决。由于领土问题的复杂性，一些国家之间的边界迄今仍然没有确定下来。比如，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领土纠纷远未得到解决，哈乌边界 1150 公里，已明确 1096 公里，仍有 4% 的领土，39 处存在争议，吉乌边界 1400 公里，只有 209 公里得到确认，尤其对巴拉克和索赫两块飞地（加瓦和加瓦萨伊景区），双方立场相差甚远。<sup>②</sup>此外，因 2013 年底乌克兰危机，俄罗斯与乌克兰围绕克里米亚的边界问题被激化，最终导致克里米亚全民公投，加入俄罗斯联邦；位于高加索的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领土归属也是纷争不断，甚至爆发多次武装冲突，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力损失。两国最近的一次冲突就发生在 2014 年 8 月 4 日，双方共有 18 名士兵在此次升级的冲突中丧生。

由此可见，欧亚地区的国际边界远远没有完成固定进程，这些尚未确定的边界构成了欧亚地区周边若干个“冲突点”，它们不仅进一步激化了这一地区各国之间的社会矛盾，而且对地区政治安全形势构成了直接冲击。毫无疑问，这些国际边界问题会制约地区、跨地区的国际合作。就如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理查德·萨科瓦（Richard Sakwa）教授所认为的那样，欧亚大陆并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一种叙事。它的边界并不固定，管辖范围也互相重叠。<sup>③</sup>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欧亚内

---

① 薛风璇：《港粤跨境发展的理论与政策》，载叶舜赞等著：《一国两制模式的区域一体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版，第 19-31 页，转引自汤建中：《边界效应与跨国界经济合作的地域模式——以东亚地区为例》。

② 何希泉等：《欧亚地区安全合作与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02 年第 7 期，第 54 页。

③ [英]理查德·萨科瓦：《欧亚一体化的挑战》，《俄罗斯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15 页。

陆地区的大部分区域仍旧是封闭型、半封闭型的国际边界，它们既不利于边界效应的发挥，同时也将影响区域合作的推进。

### （三）来自各方尚存的旧式意识形态残余，始终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

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二十余年，世界各国的战略重点也都发生了巨大转移，但在现实世界中被视为冷战遗产的“冷战思维”依然存在，谁也不能无视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虽然中国领导人也多次在不同国际场合呼吁，有些国家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不能身体已进入 21 世纪，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sup>①</sup>但放眼世界，我们仍然可以在现实国际关系中找到许多尚存的旧式意识形态残余。这在美国和俄罗斯（苏联）的外交政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具有强烈使命感的世界超级大国美国，早已把维护和推广本国的意识形态作为其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早在冷战时期，杜鲁门就这样说：“全世界自由的人民指望着我们支持他们、维护他们的自由。如果我们领导不力，就可能危及世界和平——而且肯定会危及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sup>②</sup>这种反对共产主义的政策事实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被看成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冷战之后，美国在非西方世界大肆推广民主和人权，始终将其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目标之一。为达目标，先后发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将这些国家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欧亚地区，美国借助 NGO 策划“颜色革命”，甚至不惜支持部分国家反对派以武力发动政变。可见，这种旧式的意识形态残余仍旧留在在美国对外政策中。

除美国之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国家就是处于欧亚地区核心地带的俄罗斯。在晚近的三百多年中，俄罗斯一直是欧亚地区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二十世纪末的苏联解体，使得欧亚地缘政治态势又一次呈现巨变。虽然俄罗斯丧失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地位，但在欧亚地区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传统影响力。俄罗斯依然把独联体地区视为“传统势力范围”<sup>③</sup>，或

① 习近平：《不能身体已进入 21 世纪，脑袋还停留旧时代》，2014 年 5 月 21 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21/c\\_126528334.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21/c_126528334.htm)

②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版，第 60-61 页。

③ Д. Медведев,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о встрече с участникам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12 сентября 2008 года, Москва, Выставочный зал ГУМа, <http://archive.kremlin.ru/text/appears/2008/09/206408.shtml>.



称之为“特殊利益地带”，<sup>①</sup>在其对外政策中居于优先地位，不容外部势力侵犯。独联体地区对俄来说尤为重要，它既是俄罗斯民族赖以生存的重要空间，也是俄罗斯重振世界强国地位的重要战略依托。因此，俄罗斯对于外部势力的渗透比较敏感，不愿意看见各种势力纷纷加强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削弱其在欧亚大陆的传统霸主地位。我们可以在俄格战争、乌克兰危机、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等重大地缘政治事件中观察到俄罗斯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它的生存空间。换句话说，“空间依然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然而，空间并不是中立的，经常在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存有争议。”<sup>②</sup>由此可见，在欧亚地区尚存的意识形态残余也会成为区域国际合作的巨大障碍。作为已被强化为强国外交基础的意识形态，看来还会继续成为国际合作交往中一道难以跨越的门坎。

##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也许“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更为合理的定位是以项目推进为主的一种跨地区或区域间合作的新模式，并将其作为跨区域合作机制构建的一次重要试验。在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这样的试验能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如何在未来实践过程中处理好当前面临的上述三大挑战问题，同时尽可能考虑各方的现实需要与可接受程度。这或许是 21 世纪中国对外战略中需要通过不断实践和创新来取得重要进展的一项艰巨任务。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向历史学习，以史为鉴，而且还要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提出可行之道。



(责任编辑：夏真真、刘畅)

<sup>①</sup> Тренин Д. Россия в СНГ: поле интересов, а не сфера влияния // Pro et Contra. 2009. Сентябрь-декабрь. С. 82-97.

<sup>②</sup> [英]理查德·萨科瓦：《欧亚一体化的挑战》，《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2期，第15页。

# 欧盟邻国政策的现实性与复杂性

## ——以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为例

皋媛\*

**【摘要】**2004年欧盟出台的欧盟邻国政策（European Neighborhood Policy, 简称 ENP），是欧盟寻求加强与欧洲东部和地中海南部紧密关系的一种外交手段，其目的是让欧洲东部和南地中海邻国成为政治经济稳定、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国家。东部伙伴关系计划（Eastern Partnership, 简称 EaP），则是在 ENP 基础上由欧盟主导的针对苏联解体后的六个独联体国家进一步推进政治联合与经济一体化的具体政策，旨在提供一个讨论贸易、经济战略、旅游协议，以及其他欧盟和东部邻国之间问题的平台。但 2013 年底因邻国政策框架内的联系国协定（Association Agreement, 简称 AA）问题而引发的乌克兰危机，以及最近严重困扰欧盟的难民潮问题，都深层次地揭示了欧盟邻国政策的现实性与复杂性，同时也暴露出欧盟原本看好的邻国政策遭遇了推进中的挫折。

**【关键词】**欧盟邻国政策；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现实复杂性

乌克兰危机爆发近两年以来，整个欧洲大陆局势因此变得动荡不安，令人揪心的同时又引发了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的思考。这是一个偶然爆发的危机？还是随着趋势发展必然会出现的局面？回看导致这场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索——乌克兰亚努科维奇政府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Association Agreement, 简称 AA），以及该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乌克兰国内民众在“向东走”还是“向西走”问题上的深度对立，不难发现，乌克兰作为欧盟邻国政策中的重要一环，它特殊的历史和地理位置，特殊的身份认同和民族关系都决定了，欧盟之于它的“笼络”政策必将遭遇不可预知其程度的分歧和冲突，由此也折射出以联系国协定（AA）为推进重点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Eastern Partnership, 简称 EaP）和以发展欧盟周边邻国关系为重点的欧盟邻国政策（European Neighborhood Policy, 简称 ENP）必然面临着没想象中那么美好的现实性与复杂性。

本文将以东欧伙伴关系计划（以下简称 EaP）为例，探讨欧盟邻国政策（以下简称 ENP）在其实施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欧洲内部的复杂关系以及邻国政策背后的意义。

### 一、ENP 概念的提出与设想

\* 皋媛，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4 级博士研究生。

ENP 是欧盟寻求维护与相毗邻的欧洲国家之间关系的一项政策手段，这些政策实施国主要为发展中国家，他们希望在未来某一天能够作为成员国加入欧盟，亦或者能够同欧盟加深合作，形成更加紧密的关系。对于欧盟推行的 ENP 来说，主要是指与欧盟领土相近的国家以及主要的欧洲大陆国家，并不适用于那些所谓的欧洲邻国但又与欧洲相隔甚远的国家或地区。<sup>①</sup>

2003 年 3 月，欧盟委员会首次设计出了 ENP 概念。2004 年，在欧盟有史以来最大一次东扩之后，新进的 10 个欧盟成员国提出旨在维护欧盟与新出现的邻国关系的倡议，同样也是为了防止欧盟与邻国之间产生新的裂痕，ENP 正式出台。2006 年，在 ENP 实施 2 年后，德国在其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提出了 ENP 的加强版(ENP Plus)，它是后来欧盟同邻国关系细分的前奏。2007 年 7 月，在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地中海联盟”建立，2009 年 5 月，由波兰和瑞典共同倡议的“东部伙伴关系”正式现身。<sup>②</sup>此后，ENP 的主要内容实际上被划分为南面和东面，涵盖的国家最终包括：阿尔及利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埃及、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巴勒斯坦、叙利亚、突尼斯。

通过 ENP，欧盟的目标是希望在支持东部和南部邻国国内改革的前提下，促进邻国在民主、法治以及市场经济等方面的改善。

冷战结束之后，欧洲成功地运用欧洲贸易联盟（EFTA）通过合同协议、政治对话、金融和技术援助项目等，广泛地深化了同其周边国家的关系，包括中东欧、前苏联国家、南地中海邻国以及西巴尔干国家。同时也加强了不同程度的双边合作，包括参与欧盟政策和欧盟项目。2000 年 2 月，欧盟委员会将欧盟与邻国关系确定为战略目标，并在 2003 年 12 月欧盟委员会通过的欧洲安全战略（ESS）中将其放在了突出的位子。“构建周边安全”成为了欧盟安全政策的三大战略目标之一。<sup>③</sup>

欧盟邻国政策的问题在 2002 年 2 月至 2003 年 7 月的欧洲未来公约中也得到了相应的讨论。欧洲两大政党——右翼欧洲人民党（以下简称 EPP）和左翼欧洲社会党（以下简称 PES），都呼吁将发展这种特殊的邻国政策纳入宪法条约。PES 认为，这种政策（指 ENP）可以为那些不追求成为欧盟成员国的欧盟邻国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地位，它能够强化欧盟同邻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EPP 则认为，欧盟应该为目前还无法成为其成员国的国家提供一个制度化的合作关系。右翼欧洲人民党提议对东欧和南地

① Consultation: “Towards a new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http://ec.europa.eu/enlargement/neighbourhood/consultation/index\\_en.htm](http://ec.europa.eu/enlargement/neighbourhood/consultation/index_en.htm).

② 朱晓中，从欧盟邻国政策到东方伙伴关系——欧盟东方政策的新视线，《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9 年第 5 期。

③ European Council (2003), pp7.

中海国家建立欧洲伙伴关系，类似于欧洲经济区，但是也可以包含一些政治因素，这样可以确保欧洲加强它同邻国的制度化关系，从而促进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和平与稳定。

①

对于欧盟来说，ENP 至少符合其四个利益基本点：

第一是外交与安全政策。ENP 符合欧洲安全战略（ESS）的意义，它追求在欧盟东部和南部邻国边界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的区域。通过合作来解决国际冲突、国际犯罪、恐怖主义等威胁，以及大量移民所导致的犯罪率上升等问题。

第二是促进转型。欧盟作为外部力量，可以促进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民主政治运动以及经济和社会的改革。良好的治理，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意识的增强，促进法治以及尊重人权是欧盟促使邻国转型的目标。

第三是扩大政策。自 2004 年欧盟对中东欧国家有史以来最大一次规模的扩大完成之后，欧盟对于扩大政策的实施出现了一定的疲惫，不能放弃邻国，但需要用一种制度化形式予以稳定。

第四是贸易和经济政策。欧盟希望通过创建一个自由贸易区（FTA），不断扩大和加强同邻国的经济与贸易，通过进一步整合达到双边和多边贸易的互动发展。

引用前欧盟委员会主席罗马诺·普罗迪的话说，“ENP 的目标是创建一个欧盟的朋友圈，新的政策可以扩大超出欧盟边界地区的繁荣、稳定和安全。”

普罗迪所提出的目标——欧盟朋友圈（ring of friends），需要通过创建一个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的特殊关系来实现。这种广泛的欧洲交流包括国家的法治、对人权的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等等，由此促进良好的邻国关系。为了实现这些目标，ENP 需要提高其政治吸引力，通过合作与发展方面的一套清晰的政治优先事项来提供更多的激励机制。通过联系国协定（简称 AA），ENP 对象国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可以免关税进入欧盟国家，同时能够得到欧盟给予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作为交换，这些邻国需要进行相应的政治经济改革，以及围绕改革进行社会转型。

## 二、ENP 的现实复杂性

ENP 的实施范围包括在中东、北非、东欧的十六个国家，他们几乎都与欧盟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作为欧盟替代传统地缘政治的构想，通过长期深入的实施和接触，包括财政支持，贸易协定以及轻松的旅行安排，ENP 意在促进欧盟伙伴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帮助他们成为民主法治、经

① European People's Party (2002); 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 (2002).

济繁荣，且能够分享欧盟内部市场利益的国家。政策推出十年期间，不乏有被称为“加强版 ENP”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EaP）的进一步具体化政策，然而很明显，邻国政策不但成效甚微，还诱发了东部国家乌克兰危机，导致大国博弈加剧，局势一度紧张到剑拔弩张。

如今，欧盟邻国的很多国家相较以前对欧盟的态度已经更加疏远，邻近周边地区越来越不稳定，经济转型也慢了下来。在东部，欧盟已不自觉地滑向与俄罗斯的竞争博弈，而在南方，政治上巨大的动态变化以及新的角色的出现使得本就不连贯的邻国政策更加受限。再加上因叙利亚战争引发的难民危机，不仅邻国对欧盟失去了信心，甚至欧盟内部关于如何处理潮水般涌入的难民问题也出现颇为严重的意见分歧，更不用提合力解决危机，稳定周边环境了。

对于前文提到的 16 个邻国，欧盟也并没有以同样的节奏建立相互关系。相对于东欧国家，地中海南部国家与欧盟的关系历史显得更悠久，事实上欧盟对于地中海南部国家几乎已经完成了联系国协定。但欧洲东部邻国合作关系政策，在法律、制度以及进程安排上就略显稚嫩。表 1 显示的是截至 2007 年，也就是 ENP 提出 3 年后，欧盟与 ENP 国家之间的关系情况。

表 1：欧盟与 ENP 国家的关系（2007 年 4 月止）<sup>①</sup>

ENP 伙伴国	与欧盟合作生效的合同关系	ENP 国家报告	ENP 行动计划	被欧盟采用的时间	被邻国采用的时间
阿尔及利亚	AA*- 9 月	--	--	--	--
亚美尼亚	PCA**- 1999 年	2005 年 3 月	2006 年秋达成	2006 年 11 月 13 日	2006 年 11 月 14 日
阿塞拜疆	PCA - 1999 年	2005 年 3 月	2006 年秋达成	2006 年 11 月 13 日	2006 年 11 月 14 日
白俄罗斯	--	--	--	--	--
埃及	AA - 2004 年 6 月	2005 年 3 月	2006 年秋基本达成	2007 年 5 月 6 日	2007 年 3 月 6 日
格鲁吉亚	PCA - 1999 年	2005 年 3 月	2006 年秋达成	2006 年 11 月 13 日	2006 年 11 月 14 日
以色列	AA - 2000 年 6 月	2004 年 5 月	2004 年底达成	2005 年 11 月 21 日	2005 年 11 月 11 日
约旦	AA - 2002 年 5 月	2004 年 5 月	2004 年底达成	2005 年 2 月 21 日	2005 年 1 月 11 日
黎巴嫩	AA - 2006 年 4 月	2005 年 3 月	2006 年秋达成	2006 年 10 月 17 日	2007 年 1 月 19 日
利比亚	--	--	--	--	--

<sup>①</sup>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06-1676\\_en.htm](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06-1676_en.htm)

摩尔多瓦	PCA – 1998 年 7 月	2004 年 5 月	2004 年底达成	2005 年 2 月 21 日	2005 年 2 月 22 日
摩洛哥	AA – 2000 年 3 月	2004 年 5 月	2004 年底达成	2005 年 2 月 21 日	2005 年 7 月 27 日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AA 过渡期 – 1997 年 7 月	2004 年 5 月	2004 年底达成	2005 年 2 月 21 日	2005 年 5 月 4 日
叙利亚	--	--	--	--	--
突尼斯	AA – 1998 年 3 月	2004 年 5 月	2004 年底达成	2005 年 2 月 21 日	2005 年 7 月 4 日
乌克兰	PCA – 1998 年 3 月自 2007 年 2 月协议谈判升级中	2004 年 5 月	2005 年 2 月达成十点计划	2005 年 2 月 21 日	2005 年 2 月 21 日

\*AA: Association Agreement

\*\*PCA: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上述推行 ENP 的过程中不难看出，对于 ENP 的深入发展，欧盟内部本身就存在摩擦点和重大利益分歧。表面上追寻的理想目标和实际上法德争夺战略侧重点的各怀心思，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ENP 没那么简单美好。

ENP 对象国的内部差异也让这项邻国政策变得更加扑朔迷离。ENP 所覆盖的邻国是一个异质化的群体，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不一，对于和欧盟发展未来关系的期望也各不相同。同时以促进国内政治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为交换条件取得欧盟的各种援助和支持，来实现最大化融入欧盟的这一目标，只能由各邻国自己的实现速度和实现意愿的强烈与否来决定，欧盟只把它当作一项承诺来履行。事实上，ENP 主要是针对欧洲东部和地中海南部邻国，它独立于欧盟成员国的问题，或者说不应该预先判断今后是否能成为欧盟成员国。ENP 的目的是为邻国关系提供一个框架，它并不包含在中期目标内预期成为欧盟成员国。对于 ENP 与欧盟成员国的关系，前欧盟对外关系委员贝尼塔·费雷罗·瓦尔德纳在 2005 年 1 月回应乌克兰对于加入欧盟的期望时说：这扇门既没关上也没打开。<sup>①</sup>

另外，如何找到欧盟与邻国在价值观与利益上的平衡点，以及如何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都是 ENP 面临的现实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东部伙伴关系计划（EaP）或许更加能体现它的复杂性。

### 三、EaP 概念的提出、设想

<sup>①</sup> Prodi (2003), pp 4.

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简称 EaP），是欧盟主导的针对苏联解体后的独联体国家——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六国，旨在提供一个讨论贸易、经济战略、旅游协议，以及其他欧盟和东部邻国之间问题的平台。该计划最初由波兰和瑞典提出，并在 2008 欧盟首脑会议上获得通过。2009 年 5 月 7 日，欧盟 27 国与上述 6 个国家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正式启动了东部伙伴关系计划。2009 年 12 月 8 日，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框架下的第一次外长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

①

EaP 倡议大致描述了四个专题平台：良好的治理与民主，经济融合与欧盟立法，能源安全、民间交流。它的提出基于两个维度，即加强欧盟同东部伙伴国之间的交流，在框架内加强伙伴国内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而这其中的双边维度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新的合约关系，即联系国协定。通过政治对话加强政治上的联合，深化在正义与安全问题上的合作，深化全面自由贸易区（DCFTA）；2、融入欧盟经济。提升货物与服务的进口，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保证稳定的法律环境；3、进入欧盟便捷化。简化签证的申请流程，加大欧盟签证自由度，降低申请签证的成本；4、能源运输合作。提升基础设施互连程度，整合能源市场和运输服务，提高成员国之间运输的合作；5、经济和社会发展。降低地区差异，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建设基于欧盟统一的资金模式；6、金融支持。2011-2013 年，欧盟基金总的来说目前共有 25 亿欧元用于东部邻国，其中乌克兰 3.89 亿、摩尔多瓦 3.08 亿、格鲁吉亚 2.08 亿、亚美尼亚 1.82 亿，阿塞拜疆 7550 万，白俄罗斯 4150 万。

为了解决与东部伙伴关系新的合作的需要，从 2010-2013 年，欧盟先后投入约 3.5 亿欧元旨在支持三个特殊的倡议计划，即综合机构建设计划（CIB）、区域发展试点项目（PRDPs）、五个旗舰计划。在欧盟与东部伙伴关系的合作框架中，综合机构建设计划（以下简称 CIB）和区域发展试点项目（以下简称 PRDPs）构成了其双边轨道，而五个旗舰计划则形成了多边发展的轨道。如表 2。<sup>②</sup>

三项倡议计划	金额（€）	实施目的
<b>CIB</b>	1.73 亿	强化联系国协定，建立全面深化的自由贸易区，包括制度改革和技术援助。
<b>PRDPs</b>	0.75 亿	帮助伙伴国解决包括地区人口、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在内的经济社会差异等结构性问题。

① [http://en.wikipedia.org/wiki/Eastern\\_Partnership](http://en.wikipedia.org/wiki/Eastern_Partnership)

② Update on Eastern Partnership implementation, EaP Summit – 29-30 September 2011, Warsaw. [http://eeas.europa.eu/eastern/docs/2011\\_eap\\_implementation\\_en.pdf](http://eeas.europa.eu/eastern/docs/2011_eap_implementation_en.pdf)

五个旗舰计划*	1. IBM	0.44 亿	支持伙伴国边境管理行动，文档的完整性和安全性，毒品和走私的检查，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等。
	2. SMEs	0.07 亿	提供技术援助和商业支持，希望从六个伙伴国家中发展潜在的吸引欧盟投资的双方合作项目。
	3. REC	0.32 亿	地区能源合作通过 INOGATE 项目 <sup>①</sup> ，支持地区能源市场发展，能源规范，标准和法律的协调，以及新能源和能源高效利用等。
	4.PPRD-East	0.06 亿	评估已有的灾难防御、准备和应对机制，建设专家研究访问，技术交流和援助等机制。
	5. EG	0.22 亿	关注减少环境风险和污染，加强促进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能力建设，确保获得环境信息，利益相关方参与环境管理、报告，以及进行战略环境评估。

\*五个旗舰计划

1. IBM: Integrated Border Management
2. SMEs: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3. REC: Reg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4. PPRD-East: Prevention,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to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5. EG: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由此可见，EaP 宣示了欧盟与其伙伴关系国之间的一个实质性步骤，即为推进政治联合与经济一体化创造了必要条件。这个政策的附加值明确地表现在，与邻国在共同利益、共同权利与责任的基础上实现“更加雄心勃勃的伙伴关系”。而波兰、瑞士联合提出该建议与法国提出建立地中海联盟倡议几乎是同时。对此，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解释说，参加地中海联盟的许多国家仅是“欧盟的邻国”，而“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要支持的国家却是“属于欧洲的东部邻国”。<sup>②</sup>

那么 EaP 推出并实施之后，它是否对东部邻国产生了相应的作用？它呈现的是一幅怎样的图景？

## 四、EaP 的挫折成长

如上文所述，EaP 确实提供了一系列的项目、工具和资源。推出的双轨路径，既深化了欧盟与东部伙伴的双边关系，又通过多边的维度，同那些迄今为止缺乏结构化关系的国家发展新的关系，如白俄罗斯。原则上，双轨的方法旨在对像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这样的国家追求更大的差异化政策，

① INOGATE 项目（INterstate Oil and GAs Transportation to Europe），是欧盟与黑海、里海沿岸国家及其邻国之间的能源合作项目，该项目于 1996 年起开始运行。

② 欧盟拉近东部六国，俄罗斯心存疑虑——聚焦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人民日报，2009 年 5 月 6 日，第 003 版，国际要闻。



同时也为缺乏经验的合作伙伴提供更多的机会，以共同创建一个邻国经济共同体。

有学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显著发展是，在欧盟日益增长的内部复杂性和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依存性的迫使下，范式从“固定边界”向“政治包容”转变。相对于“政治排斥”，认为“政治包容”能够更好地应对激烈变化的新欧洲秩序。欧盟新政治核心的假设直接挑战了传统国家看待边界的概念。政治和安全空间的概念也将远远超越欧洲边界。“包容政治”要求多样性的方法和发展路径：它优先内化外部干扰，并试图获得而不是仅仅控制其外部。欧盟中心为其外部环境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建设秩序。前提是有延展性的政治边界，这个边界是穿越而不是防卫的。在设计邻国政策时，欧盟根据这种“政治包容”的观点，模糊内部与外部的边界。为了防止在一个更加繁荣的欧洲和其不稳定的后院之间出现一条新的分界线，欧盟试图为后者提供一项包容性的政策。这种伙伴关系则突破了欧盟边界的限制，在政治上互联，在经济上一体化。EaP的概念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共同利益”和“共同所有权”，即欧盟将不寻求强迫伙伴国接受条件，这就能使得欧盟与邻国的关系更进一步。<sup>①</sup>

然而在现实中这种方法被证明是难以维持的。伙伴关系的概念缺乏从成员国角度理解的伙伴关系概念会导致一系列紧张局势。这其中有一些问题是难以调和的：1、霸权与伙伴关系。被植入的欧盟强权政治从一开始就与邻国关系是不对称的；2、条件与所有权。质疑那些强制与命令式的赞成和平等的逻辑性是否兼容；3、双边与多边主义。争取从欧盟那里转换焦点，更多关注国家间的地区合作；4、分化与同质性。暗示会将有限的资源和不多的奖励给予那些忠实的伙伴；5、功能与地缘战略愿景。认为欧盟与外部邻国关系的合作最终是发生冲突。<sup>②</sup>

## （一）邻国个体差异

前文提到，对于ENP的一个最主要的批评就是其“单一的政策框架”，但经验表明并不是所有的伙伴国都积极应对欧盟的想法，有一些甚至完全拒绝“外来的价值观”。按照欧盟委员会所设计的EaP，旨在更多聚焦地区，去了解并对伙伴国加以区分，以了解相应的每个个体。从概念上讲，更主动更多的与邻国接触，基于共同所有权和共同承诺，是为了考虑合作伙伴的利益和需要。然而研究表明，在现实中，欧盟一直优先考虑自己的议程，并将此视为是为了更好的适应外界的需要，显然无法超越其以欧洲为中心的愿景的伙伴关系。

<sup>①</sup> Michael A. Smith, 'The European Union and a Changing Europe: Establishing the Boundaries of Order',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35, No.1 (1996), pp5.

<sup>②</sup> Bechev and Nicolaidis, "From Policy to Polity", pp.479.

所以，区分邻国伙伴个体的差异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作为每一个个体来看似乎是不同的，不仅在于他们的认知和态度，还包括他们的抱负以及与欧盟合作的准备程度。

例如白俄罗斯，准备在平等问题上与欧盟作对，不接受外来强加的价值观。它显然把自己看作是欧洲平等的伙伴，但需要承认的是，与欧盟成为平等的伙伴关系在实际操作中很困难。这并不是因为欧盟在世界体系中的体量地位，而本质上是因为欧盟有倾向的在选择它喜欢的伙伴。白俄罗斯对于 EaP 的预期是务实且现实的。用欧盟官员的话说，白俄罗斯一直为会议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它非常了解自己内部的局限，最重要的就是“意识形态”。然而白俄罗斯始终坚定地认为，与欧盟的合作是基于共同的利益而不是政治价值观：共同的利益和长期的合作可以产生共同的价值观、标准以及相互理解。而不是相反的。

相比之下，乌克兰针对 EaP 的倡议声称“没有政策思路”。“EaP 给了我们需要的关注，但是却没有一个正确的路径”。根据许多政府官员的说法，EaP 没有提供一个协调机制，没有足够的资源，更重要的是“没有方向感”。<sup>①</sup>然而面对欧盟要求的“去或留”的选择，他们觉得不得不说“欧盟并不希望乌克兰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国，我们看不到信任和具体的目标。如果我们能够预见到一个成员国的前景目标，那么我们会接受欧盟的指令”。<sup>②</sup>所有的乌克兰官员，从总统到政府和议会，都对欧盟与乌克兰的关系表示不满，“这里没有伙伴关系，共同所有权的想法不奏效……我们有很多的想法，但是欧盟都会有自己的优先事项，我们在定义上是不平等的，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深信不疑”。<sup>③</sup>

摩尔多瓦的立场则是完全不同的。起初，摩尔多瓦官方对 EaP 也是非常不满，但还是准备参与。“EaP 是一个奇怪的试图证明官僚主义的事情，是没有任何特定的目的”。<sup>④</sup>在摩尔多瓦，伙伴关系问题可以被视为是无关紧要的，很明显，这里既然是欧盟主导，原则上在欧盟与摩尔多瓦之间就不可能有平等的伙伴关系。在许多摩尔多瓦人的眼里，这个国家确实需要改革，更需要欧盟给予指导，“我们应该帮助欧盟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同时也需要正确履行法律的指导意见……”。

针对上述这几个国家与欧盟伙伴关系的大致比较，显示了地区的多样性需要欧盟根据单个独立个体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进行伙伴关系计划。

① Interview with a deputy chairman, FAC, Rada [Parliament], Kyiv, Ukraine, 29 Sept. 2009.

② 同上

③ Interviews with various members from the department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MFA, and Rada, Kyiv, 29 Sept. 2009.

④ Interview with deputy minister, department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MFA, Chisinau, Moldova, 1 Oct. 2009.

但事实上，不但欧盟不知道改革的方向，就连伙伴国自己也对此没有特定的要求。

## （二）地缘政治问题

在这样一种复杂关系背景下，伙伴国还不得不需要做出一个选择：到底是与欧盟更接近还是更加靠向俄罗斯？

所有的东部邻国认为他们被夹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必须从中优先考虑一个或另外一个的关系。但如上所述，这不是无条件为准备做选择。事实上，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这三个国家打算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走一条追求更加平衡的道路。尤其在白俄罗斯，许多官员认为他们应该走一条更加独立的道路，而不是依附于某一方，或成为连接欧盟与俄罗斯的桥梁与窗口。另一些人则认为，白俄罗斯应该与俄罗斯一起走向欧洲。无论是哪一种，都表现出了在这一地区的敏感性，尤其是在关于天然气供应以及价格关税同盟的争端问题上，东部邻国无法从容简单的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做出一个所谓的选择。在乌克兰，俄罗斯被认为是欧盟加速同乌克兰关系之间的潜在障碍，乌克兰敏锐地感觉到这两个邻居在这里的竞争加剧，使其压力倍增，以至于乌克兰领导人认为“俄罗斯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需要平衡乌克兰的安全利益，更多的与俄罗斯合作”。<sup>①</sup>相比之下，在摩尔多瓦官员并不一定认为俄罗斯是一个障碍：主要问题是其国家内部的情况。他们明确坚称，“我们也需要将俄罗斯带入方程等式”，因为他们认为俄罗斯是解决德涅斯特河沿岸冲突的一个关键角色。

## （三）社会文化区别

在欧洲东部国家，社会文化差异仍然很明显，尤其是在心理和宗教的关系问题上。欧洲人的法律和政治文化与东欧的权威政治生活形成对比。而东欧国家本身也存在国与国的差别。在摩尔多瓦，其政府官员承认尽管价值观是不同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同欧盟的合作，两者是不矛盾的。乌克兰人坚持他们的欧洲身份，但承认他们缺乏欧洲的政治文化，显然是背负着被苏联同化过的遗产。白俄罗斯则坚持地认为自己是不同的。在这一点上，其官方曾公开承认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遗产。民众的舆论也认为白俄罗斯与欧盟的价值观是截然相反的。

总之，欧盟“包容政治”仍然是零散而不一致的，这使得欧洲推行的改革进程很难在东部邻国得以真正施行。而欧盟也引发来欧洲公众舆论对于其是否拥有外部关系领导力的质疑。因此，避免欧洲出现新的分界线以及实现欧盟内外部稳定繁荣的目标遭遇了很难协调的现实，在雄心勃勃的东部伙伴关系概念下，很多抱负没有答案，挫折成长。

---

<sup>①</sup> Interview with a deputy chairman, FAC, Rada, Ukraine, 29 Sept. 2009.

## 五、结论

冷战结束以来，由于单纯的扩大政策所导致出现的“疲劳困境”，欧盟对于邻国治理所采取的 ENP 以及 EaP 等政策都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地反映出了对于实现一个“共同欧洲”概念的强烈愿望。无论是对于地中海南部国家的“南下战略”，还是对于东部邻国的“东进政策”，取得了些许成就的同时，面临更多的是现实性与复杂性的挑战。例如，欧洲东部邻国大都希望欧盟能尽量多的单纯的给予他们利益上的支持，比如经贸和安全，而不是在基于输出价值观的基础上。因此，想象规划中的美好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现实推进中的危机，这在具有复杂地缘政治关系和差异化国家个体的欧洲尤其不能不被重视。事实上，无论是欧盟内部利益群体对于邻国政策战略选择上的矛盾，还是欧洲邻国个体对于政策接受程度的差异，对于欧盟的邻国政策来说，许多问题无法避免地需要面对。对于俄罗斯来说，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几乎等于在挖其后院的墙脚，俄的反应相当激烈，指责欧盟把矛头指向俄，制造“新的裂痕”。俄总统普京等俄罗斯政要也曾多次表示，如果乌克兰与欧盟签订联系国协定，继续深化 EaP 合作，那么俄乌签署的自贸区优惠协议就将不再适用，而俄罗斯是乌克兰最大的出口市场。

相对于邻国个体差异、地缘政治问题以及社会文化的区别而导致邻国政策遭遇挫折来说，欧盟自身的走向尤其是政治内聚力的统合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了欧盟外部治理的能力与效应，还决定了欧盟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形象。对此，美国学者戴维·卡莱欧 (David Calleo) 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今天的欧洲联盟而言，规模大小与共同一致性这两者之间的对立突然变得至关重要起来。”<sup>①</sup>

很显然，在应对如此复杂多变的环境局势中欧盟缺乏快速反应的能力，设计和发展一套更好地适用于整体政策框架的工具是欧盟的当务之急，也是欧盟保留其影响力夺回在该地区的主动权的保证。在今天，欧盟在全球事务中的许多问题上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不能否认的是，它的大部分利益攸关都在其邻国地区，也正是在这些地区，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影响力正在逐步递减。因此，制定正确的邻国政策是欧盟确保其利益并且提升其价值观的基础，这对欧盟未来扮演一个全球性角色来说非常重要。

(责任编辑：夏真真、刘畅)

<sup>①</sup> [美] 戴维·卡莱欧，《欧洲的未来》，冯绍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87 页。

## 综合文化范式下的俄罗斯地缘政治身份认同路径探析

刘畅\*

**【摘要】**关于俄罗斯地缘政治身份认同的讨论一直以来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学界常用的方法是以“东西方”为依据,将当代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派别划分为“大西洋主义”、“新欧亚主义”、“民粹主义”。但笔者认为这种划分依据过于泾渭分明,而缺失了很多内涵。因此笔者主张将俄罗斯地缘政治身份认同置于一个较为完整的地缘文化空间下,采用“综合文化范式”,概括出“长时段视角下的‘我—他’身份建构分析路径”、“过程建构主义分析路径”和“宏观与微观统一视角的分析路径”,主张从不同的路径出发去理解俄罗斯地缘政治身份认同的建构,以认识到在“欧亚”这一地缘文化空间下,俄罗斯地缘政治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最后笔者以“克里米亚事件”为案例,立足于“复杂性”的特点,综合运用以上研究路径,分析国际事务中俄罗斯独特的世界观。

**【关键词】**综合文化范式;俄罗斯;地缘政治;身份认同

长久以来,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比如在1999年,格拉曼·史密斯(Graham Smith)就曾说过俄罗斯面临着身份认同危机:必须定义好一个非帝国的俄罗斯,俄罗斯的边界如何划定以及在后冷战的国际秩序中俄罗斯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sup>①</sup>就如何来建构当代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学,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划分,如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Э.Г.索洛维约夫将俄罗斯地缘政治派别划分为“新欧亚主义”、“民粹主义地缘政治学”和“左翼地缘政治学”;<sup>②</sup>而我国学者冯玉军则将其划分为“大西洋主义”、“民族主义”和“新欧亚主义”。<sup>③</sup>这些划分结果不一而足,但划分标准基本都是依据“东西方”,即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亚洲国家抑或欧亚国家的基本身份定位。笔者发现,仅仅

\* 刘畅,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

① Andrew Foxall, *Constructing, Practicing, and Narrating Russian (Geo)Political Identity*, *Geopolitics*, 17:1, p.235.

② [俄]A.П.齐甘科夫、П.А.齐甘科夫主编:《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冯玉军、徐向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2-197页。

③ 冯玉军:“俄罗斯地缘政治战略取向”,《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10期,第25-28页。

从这个标准去定位俄罗斯的国家身份，太过于标签化，而缺失了更加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因此笔者倾向于将俄罗斯置于一个更加完整的地缘文化空间内，综合运用多种分析路径去建构其地缘政治身份认同。

## 一、完整地缘空间下的综合文化范式

在具体探讨分析路径之前，有必要对本文的研究范式进行一个说明。首先笔者认为任何一种路径的分析都必须归置在一定的研究范式内，所谓范式，来源于英文的 paradigm，原意为“典范、例证”。库恩是第一个用它来描述科学发展规律的科学哲学家。他认为，科学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总会收到一个支配性理论的指导，这个支配性的理论就是范式。当科学革命发生时，往往是从一种范式转换到另一种范式。<sup>①</sup>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在冷战结束之际，存在着四种世界政治的分析范式：一个世界：欢欣而和谐；两个世界：我们和他们；民族国家范式和完全的混乱。<sup>②</sup>然而这四种范式都不足以说明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发展规律，因此其主张从“文明的角度看世界”，同时也开启了国际政治的文明研究范式。学者李格琴认为“文明范式”是文化范式的组成部分之一，文化范式的另一类型是以亚历山大·温特

（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主张以无形的共有观念来塑造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主义范式，即人类社会的关系结构主要是由共同观念而非物质决定的；国际关系的文化形态（原则、观念、规范、意识形态等）由共同知识建构；国际社会的共有知识和文化建构国家利益；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文化建构，可分为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sup>③</sup>无论是有形的文明范式，还是无形的共有观念范式，其共享文化范式的基本要素：第一，其理论假设前提以非物质性的文化因素为基础，即本体论的非物质性；第二，对文化因素在构成国际体系结构以及国际行为主体中的作用高度重视，超过对其他因素的重视；第三，对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权力、利益等概念进行文化意义的诠释；第四，超越文化功能主义分析模式，即把文化仅仅作为一项辅助功能来

① 李格琴：“国际政治文化研究范式及其评介”，《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10页。

②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9-14页。

③ 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5-202页。

解释国际政治现象。单纯的文化功能主义分析模式不能称为文化范式研究。<sup>①</sup>满足了这些基本要素，就称之为文化范式。本文即在这种文化范式下，从不同的研究路径出发，来建构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身份认同。此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身份认同”作为研究对象，必然带有其特性色彩，因此，笔者将研究对象置于一个完整的地缘文化空间内，所谓完整的地缘文化空间，即以文化因素为基础的，有着完整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空间，其完整性表现出了地缘政治分析中的动态因素，包括跨界性、轮廓可变性、主要区域性大国的更替以及文化、种族、人口的变化，个别情况下还包括实际上的消失等。<sup>②</sup>就俄罗斯而言，这个完整的地缘文化空间指孕育着共同斯拉夫文化，并与其他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广阔的欧亚区域，联系这一区域的基本纽带是历史积淀和文化因素，而如政治、经济等要素也或多或少起着一些作用，所以笔者将对应这一区域研究的范式称为“综合文化范式”。

## 二、内核：长时段视角下的“我一他”地缘政治身份认同分析路径

笔者在第一部分提到，将在“综合文化范式”的框架下探讨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身份认同的路径，而这一范式的内核路径则是有着千年历史积淀，建立在弥赛亚意识基础上的“我一他”地缘政治身份认同。

所谓的弥赛亚意识是指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自基辅罗斯以来的俄罗斯政治和思想之中的一种文化形态。“弥赛亚”一词来源于古犹太语，是从《旧约》的“膏油”、“涂油”、“涂膏者”等词汇演变而来，大意指某个人被涂了膏，该人就是被上帝选中执行特殊使命的人，这种特殊使命体现在宗教、精神及政治三个层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且往往与拯救世界连在一起。而如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与这种弥赛亚意识有浓的化不开的历史渊源的话，这个国家非俄罗斯莫属。别尔嘉耶夫就说过，在即将来临的世界

---

① 李格琴：“国际政治文化研究范式及其评介”，《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11页。

② [俄]A.П. 齐甘科夫、П.А. 齐甘科夫主编：《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冯玉军、徐向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8页。

性时代，俄罗斯担负着向世界道出自己新言说的使命。<sup>①</sup>一般认为，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在历史进程中，有四种不同的表述，即神圣罗斯；“莫斯科—第三罗马”说；东正教、君主专制和人民性以及全世界共产主义。<sup>②</sup>其在时间维度上体现为末世论和千禧年理念，而在空间维度上则体现在“我一他”的身份认同上，而这一点恰恰是基于地缘政治考量的。俄罗斯作为一种边际文明，北边是斯堪的纳维亚文化，西边是基督教世界，西南边是拜占庭文化，东边是伊斯兰文化，因此处于东西南北的文明交汇地带。独特的地缘条件，应运而产生“我一他”的身份认同问题。有学者认为，这种“我一他”的身份建构始终保持着双重他性。神圣罗斯如此，神选罗斯如此，帝国时期亦是如此。这种双重他性体现在现实的自卑与幻想的自信，即现实中的“我”文化势能低于“他者”，但幻想中的“我”文化势能却高于“他者”。另一方面，俄罗斯认同的建构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借用他者文化改造自我的痕迹，把“他者”文化内化为“我”的文化。因此，在俄罗斯认同问题上，出现了两个他者，一个是外在的、旁观的、地域上的他者，一个是内在的、自身的、文化上的他者。<sup>③</sup>而这种“我一他”认同的形成有几个特点：第一，其是与其他民族进行对比甚至对立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二，俄罗斯是独一无二的国家，与“他们”不一样；第三，由于俄罗斯具有全人性，具备完成人类“大一统”任务的各种因素。<sup>④</sup>因此这种“我一他”身份认同一方面是基于弥赛亚意识的“爱”与“普世同情心”，另一方面又是基于其自信和自卑的复杂心态。

在一千多年的弥赛亚意识的文化积淀中，这种“我一他”的地缘政治身份认同路径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独特的聚像，来透视这一完整地缘文化空间里的俄罗斯身份，这对于俄罗斯的自我身份认同和他者对其的身份知觉与错误知觉提供了最为深层次的文化理解，因此是理解俄罗斯地缘政治身份认同的综合文化范式下的一条内核路径。

### 三、方法：过程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俄罗斯地缘

① 郭小丽：《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页。

② 同上书，序第2页。

③ 郭小丽：“俄罗斯认同中的‘我一他’身份构建的历史流变”，《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3期，第125页。

④ 同上，第137-139页。



## 政治身份认同分析路径

在弥赛亚意识独特的地缘文化空间里，如何去建构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身份认同，笔者认为从基辅罗斯至今，一千多年的长时段文化过程举足轻重，而这一过程正为下文笔者从“过程建构主义”出发，建构俄罗斯地缘政治身份认同提供了宝贵经验。

中国学者秦亚青教授从结构和过程两个维度，将现有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划分为结构理性主义（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过程理性主义（基欧汉新自由制度主义）、结构建构主义（温特结构建构主义），并提出过程建构主义。<sup>①</sup>按照亚历山大·温特“共有观念建构角色身份，角色身份建构行为体行为”的逻辑，秦亚青更关注这两次建构的过程对结果的影响，同时他根据中国文化的特征，提出在这个过程中以“关系性”为本位。笔者在这里只是部分借鉴“过程建构主义”的研究路径，更加注重“过程”部分，至于“关系本位”，这并非俄罗斯文化的内涵所在，其内涵已如笔者在第二部分介绍，为弥赛亚意识，所以不在此路径之内。这里的“过程”是指产生社会意义的持续的实践互动关系，其与行为体是相互建构的，这一过程建构具有主体间性。<sup>②</sup>有学者认为，就俄罗斯千年的文明建构过程而言，出现了两次建构和两次解构的过程，且在第二次建构时，“建构和解构的双向运动”特征尤为明显。<sup>③</sup>具体来说，第一阶段的建构是从988年罗斯受洗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这个阶段，俄罗斯尚处于东正教文明圈的边缘地带，而在拜占庭衰落的过程中，东正教文明的中心渐渐移向莫斯科，同时，宗教领域出现了“莫斯科——第三罗马”的学说，俄罗斯的大国意识开始酝酿。第二阶段的建构始于16世纪，直至1917年的十月革命为止，伴随着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开疆扩土的对外征战，历经北方大战、1812年战争等多次地缘政治雄心的施展，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版图也在逐渐形成，随着远东、西伯利亚、高加索等地区的“俄罗斯化”，俄罗斯的大国意识和其独特的宇宙观显露无疑。但这个过程同时伴随着“解构”，也就是说，从1600年以来的西方现代化对俄罗斯的走向提供了另一种路径选择，特别是彼得大帝改革以来，“欧洲国家”的身份定位正在逐

①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4页。

② 同上书，第48-50页。

③ 祖春明：“欧亚主义——当代俄罗斯文明圈重构的一个可能方案”，《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2期，第85页。

渐形成，自此，西方——斯拉夫主义的两重性就成为“俄罗斯民族特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sup>①</sup>尽管这之后，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长达三百年，但弥赛亚意识，“我——他的身份认同”之于俄罗斯的民族性格的根本性影响却超越了双方的分歧，对于俄罗斯身份认同的建构至关重要。距离现在较近的一个解构发生在1917年苏联革命对于俄罗斯传统文化与民族性格的破坏，但有学者认为，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发展中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路径依赖”，也即这种自“莫斯科——第三罗马”以来的俄罗斯基本民族性格的定位可以一定程度上摆脱苏维埃俄国的“解构”，而保留最真实的俄罗斯。<sup>②</sup>由此可见，从神圣罗斯到神选罗斯，到帝国时期到苏联再到后苏联的今天，这一长时段过程的演变在地缘政治上就与俄罗斯的“我—他”身份建构相互依存，而这一过程对于促成这一身份认同的形成至关重要，在弥赛亚的文化土壤中，具有双重他性的“我—他”身份建构起俄罗斯在地缘政治空间中的角色定位——或东西方文明结合部<sup>③</sup>、或欧洲国家或欧亚国家。而无论是哪种角色恰恰建构起俄罗斯的外交政策选择——亲西方外交或多方位外交或全球外交。在第一次的建构过程中，思想挣扎的过程恰恰是“自信与自卑”二元统一的体现，而在第二次的建构过程中，俄罗斯对西方走过了一个“亲西方—被抛弃—自强—亲西方”的一个恶性循环过程，而这一过程对其外交政策的整体取向也是有意义的。

因此笔者认为，从“过程建构主义”路径出发，能够更好的洞悉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身份认同，并且建构出其外交政策取向，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法。

#### 四、手段：宏、微观统一视角下的俄罗斯地缘政治身份认同分析路径

这一部分笔者从操作层面切入，探讨在“过程建构主义”的方法下，该如何具体建构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身份认同。根据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层次分析法，笔者认为可以从体

① 祖春明：“欧亚主义——当代俄罗斯文明圈重构的一个可能方案”，《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2期，第85页。。

② 参见杨成：“‘权力——财产权’体系的路径依赖与‘长普京时代’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前景”，《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第61-65页。

③ 参见冯绍雷：《俄罗斯——东西方文明结合部》，资中筠主编：《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232页。

系、国家等宏观层次和团体、个人等微观层次去综合建构。在体系和国家层次上，俄罗斯著名学者沙克列依娜认为，俄罗斯的国家身份认同主要集中在三个点上：当代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还是一个欧亚国家；是一个全球大国还是一个地区大国；当代国际环境下的俄罗斯国家利益以及由此决定的外交战略是什么。<sup>①</sup>如前文所述，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大西洋主义”、“新欧亚主义”、左翼抑或右翼都作出了基于自身立场的回答，总体来说，有两个特点：第一，更倾向于从外部认知的角度去定义自身的身份，如与俄罗斯有相同大国意识的美国是如何看待俄罗斯的身份定位的，而这一视角恰恰带来的是龃龉和不信任；第二，俄罗斯自身身份定位具有矛盾性，一直充斥着“欧洲的意识和非欧洲的无意识”，在以西方为定位和不时的东方神往之间被“撕裂”。<sup>②</sup>受华尔兹的体系风潮影响，自其以降的学者大都从体系层面对国际事务予以关注，身份认同问题也不例外，然而，笔者更倾向于从微观角度对这个问题加以分析。从个人的认知层次去切入探寻俄罗斯的身份认同问题，学者们已经做了很多尝试。<sup>③</sup>他们虽然分属不同学科，但做法大致相似，都是去采访政治人物或者专家学者，从他们自身角度出发，去看待俄罗斯的身份认同以及与外部的关系，从而提炼出其对俄罗斯地缘政治身份认同的看法。英国学者安德鲁·福克斯奥（Andrew Foxall）认为，他们的做法无论是在经验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都丰富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理念，而现在俄罗斯的精英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去更好的理解这些理念并将之付诸行动。<sup>④</sup>

因此，宏观地把握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动态，并从微观的角度更好的去理解，这是笔者认为的基于“过程建构主义”的比较

---

① Tatiana A. Shakleina, “Russia between ‘West’ and ‘Eas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San Diego, California, USA, Mar 22, 2006, p.1. 转引自张学航：“俄罗斯国家身份定位与认知视角下的俄美关系困境”，《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5期，第46页。

② 张学航：“俄罗斯国家身份定位与认知视角下的俄美关系困境”，《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5期，第47页。

③ 对这个领域作出贡献的作品有：Michael Urban: *Cultures of Power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An Analysis of Elite Political Discours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Vincent Poulio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Practice: The Politics of NATO-Russia Diplom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Martin Muller: *Making Great Power Identities in Russia: An Ethnographic Discourse Analysis of Education at a Russian Elite University*, Zurich: LIT, 2009.

④ Andrew Foxall, *Constructing, Practicing, and Narrating Russian (Geo)Political Identity*, *Geopolitics*, 17:1, p.240.

好的研究手段。

## 五、案例：克里米亚事件背后的俄罗斯地缘政治身份认同建构

从上文的叙述中，笔者建立起一套“综合文化范式”下的，以长时段视角下的“我一他”地缘政治身份认同路径为内核的、以过程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俄罗斯地缘政治身份认同路径为方法的、以宏观、微观统一视角下的俄罗斯地缘政治身份认同路径为手段的身份认同建构。这部分笔者将以乌克兰危机中“克里米亚事件”为案例，从以上路径入手，分析其背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身份认同逻辑。

2013年11月28日，乌克兰政府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这一决定成为导火索，引爆乌克兰危机，2014年3月16日，克里米亚地区举行全民公投，3月17日，克里米亚议会通过决议，宣布这一地区独立，3月18日加入俄罗斯联邦，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克里米亚事件立刻将乌克兰危机推向高潮。<sup>①</sup>身份认同的困境成为克里米亚事件的助推器。这里的身份认同困境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克里米亚地区本身的认同困境，有学者认为，后苏联时代的克里米亚有三条可能的身份建构路径：建立乌克兰身份，推动国家认同的深入；建立克里米亚的独立地区身份，推动地区认同的深入；回归俄罗斯身份，推动民族认同的深入。<sup>②</sup>面对三条路径何去何从，成为克里米亚的身份认同困境。第二，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身份认同困境，虽然克里米亚历史上曾被希腊人、哥特人、匈奴人、可萨人、拜占庭帝国及金帐汗国占领和征服过，又因为赫鲁晓夫的“馈赠”，使之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但是在身份认同建构的实践中，由于克里米亚半岛以俄语为共同语言，在俄语的历史叙事中，乌克兰的缺位和鞑靼人的反面角色使其难以通过历史叙事的重构形成新的国家认同和统一的地区认同。同时，由于长达百年的俄罗斯化过程，整个半岛的符号体系完全俄罗斯化，无论是地理名称、城市雕塑、政治符号抑或是文化标签，都被打上了鲜明的俄罗斯印记。<sup>③</sup>这一切不仅使克里米亚人，也使

① 《乌克兰变局真相》编写组编：《乌克兰变局真相》，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7-16页。

② 封帅：“悲剧的诞生：身份认同困境与克里米亚的命运”，《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3期，第3页。

③ 同上。

俄罗斯人对克里米亚身份有着共同的归属感。但是困难在于，俄罗斯同时对西方有着强烈的归属感，从现实政治角度，收归克里米亚，势必使得俄西方关系越走越远。但尽管如此，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是执意将克里米亚收回，笔者认为，可以从本文路径来分析其背后逻辑。

在综合文化范式下，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的共同文化渊源毋庸置疑，作为内核的弥赛亚意识无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俄罗斯是以“我一他”身份来区别自身与克里米亚的，但是这种双重他性的“我一他”建构是建立在一个伟大的、高高在上的俄罗斯和一个承蒙俄罗斯的普世光环照耀下的、被俄罗斯的大爱浸润的克里米亚的基础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样一个楚楚动人的“他者”，俄罗斯是有足够理由将其纳入怀中的。从方法来看，从克里米亚的历史演进和其与俄罗斯的关系的过程来看，通过其共享的语言、共同的记忆、共有的观念，足以建构出二者之间共存的身份认同。而从个体层次的国际关系研究路径来看，回归俄罗斯，早已成为克里米亚人心目中共同的声音，在克里米亚公投进行时，共和国议会广场上的人群高喊“荣耀属于俄罗斯”、“辛菲罗波尔、克里米亚、俄罗斯”，<sup>①</sup>最终有 96、6% 的民众赞成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这样的逻辑建构，尽管不能使俄罗斯避免其地缘政治身份认同困境，但至少可以为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提供足够的理论依据。

## 六、结论

本文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身份置于一个完整的地缘文化空间内，从综合文化范式出发，以长时段视角下的“我一他”地缘政治身份认同路径为内核、以过程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俄罗斯地缘政治身份认同路径为方法、以宏观、微观统一视角下的俄罗斯地缘政治身份认同路径为手段、并且以乌克兰危机中克里米亚事件背后的俄罗斯地缘政治身份认同为案例，立足“复杂性”这一研究的基本论调，试图建立起研究俄罗斯地缘政治身份认同的基本路径和背后的逻辑。笔者认为，俄罗斯地缘政治身份认同的基本逻辑也正塑造着俄罗斯的世界观：既“坚持自身文明的主体性”，又

---

<sup>①</sup>《乌克兰变局真相》编写组编：《乌克兰变局真相》，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曾期望“回归西方文明大家庭”，<sup>①</sup>在经历多次“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的坎坷以后，亦生构建“俄罗斯世界”的期望<sup>②</sup>，而正是建立在弥赛亚意识基础上，利用对“他者”认知来强化“自我”身份建构的内涵所在。



（责任编辑：夏真真、刘畅）

① 杨成：新冷战幽灵与俄罗斯的身份认同困境，《文化纵横》2014年第6期，第61页。

② Foreign Minister Sergey Lavrov's article, Russian World: Steering Towards Consolidation, published in the November 2, 2015 issue of Rossiyskaya Gazeta:

[http://en.mid.ru/en/web/guest/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1913344?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http://en.mid.ru/en/web/guest/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1913344?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 在总统府与难民营里的外交课堂

### ——匈牙利国家行政大学 ADB 项目交流总结

陈曦\*

2015 年的除夕夜，在举家欢聚的时刻，我孤身一人飞往万里之外的匈牙利布达佩斯，作为中国唯一的入选学生和匈方全额奖学金获得者，在匈牙利国家行政大学的“布达佩斯外交研修项目”中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国际交流学习。大学所在地卢多维卡校园前身是始建于 19 世纪的皇家军事学院，自成立以来为匈牙利培养了军事将领人才无数，至今主楼大厅上还铭刻着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国捐躯的校友名字。在布达佩斯这一见证了无数历史悲喜的城市里，在这样一所充满历史感的校园里，我开始了一段探索与反思之旅：我不仅从学识渊博且经验丰富的教授们那里学习国际关系与外交知识；也从来自 14 个不同国家的 15 名同学那里了解到看待国际事务的不同视角，倾听曾被忽视的不同声音；更在国际化的背景下意识到“他者”眼中的中国，不断反思与摸索如何最好地讲述“中国故事”。



---

\* 陈曦，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 一、交流项目与本人学习情况简介

匈牙利国家行政大学（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Public Service, 简称 NUPS）直属匈牙利总理办公室，是一所由司法部、国防部和内政部直接管辖的研究型大学，于 2012 年 1 月 1 日由 Zrínyi Miklós 国防大学、国家警官学院以及考文纽斯大学公共行政学院组成，是匈牙利国内重要的政府智库和公职人员教育机构。校长 András Patyi 教授自 2012 年担任校长至今，还兼任匈牙利国家改革委员会主席、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席等政府要职<sup>①</sup>。目前国家行政大学由军事科学与军官培训学院、公共行政学院、法政学院、国际与欧洲研究学院四部分组成，此外还有中国研究中心、政府治理改革研究中心、应急管理研究所、国家安全研究所等等研究机构。

布达佩斯外交研修项目（The Academy of Diplomacy Budapest, 简称 ADB）是国家行政大学国际与欧洲研究学院负责的一学期国际交流项目。每年都面向全球招收致力于公共服务的优秀学生在全英文、多文化的环境下学习政府治理和国际关系相关知识。

如下表所示，布达佩斯外交研修项目课程设计可分为必修课、专业方向、技能培训和机构考察四大模块：



<sup>①</sup> [http://en.uni-nke.hu/uploads/media\\_items/cv-prof-dr-andras-paty-2.original.pdf](http://en.uni-nke.hu/uploads/media_items/cv-prof-dr-andras-paty-2.original.pdf)



布达佩斯外交培训项目的课程体系			
必修课程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国际视角下的善治与公共行政 (Good governa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international dimensions);</li> <li>2. 国际组织中的法律与决策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Law and Policy-making);</li> <li>3. 政府创新、ICT、E 政府及信息安全 (Innovation, ICT, E-public service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li> <li>4. 区域安全挑战(Reg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li> <li>5. 人权的国际保护(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li> </ol>		
专业方向	<table border="0" style="width: 100%;"> <tr> <td style="width: 50%; vertical-align: top;">                     安全与防务政策方向：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国际安全组织中的法律与决策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rganizations-Law and Policy-making);</li> <li>2. 安全挑战案例研究 (Security Challenges-case study)</li> <li>3. 移民研究(Migration as a Security Challenge)</li> </ol> </td> <td style="width: 50%; vertical-align: top;">                     欧洲研究方向：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欧盟的法律与决策制度 (European Institutions - Law and Policy-making)</li> <li>2. 欧盟的经济与货币一体化 (Economic and Monetary Integration)</li> <li>3. 欧盟在国际危机中的全球角色(The EU as a global player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situations)</li> </ol> </td> </tr> </table>	安全与防务政策方向：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国际安全组织中的法律与决策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rganizations-Law and Policy-making);</li> <li>2. 安全挑战案例研究 (Security Challenges-case study)</li> <li>3. 移民研究(Migration as a Security Challenge)</li> </ol>	欧洲研究方向：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欧盟的法律与决策制度 (European Institutions - Law and Policy-making)</li> <li>2. 欧盟的经济与货币一体化 (Economic and Monetary Integration)</li> <li>3. 欧盟在国际危机中的全球角色(The EU as a global player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situations)</li> </ol>
安全与防务政策方向：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国际安全组织中的法律与决策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rganizations-Law and Policy-making);</li> <li>2. 安全挑战案例研究 (Security Challenges-case study)</li> <li>3. 移民研究(Migration as a Security Challenge)</li> </ol>	欧洲研究方向：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欧盟的法律与决策制度 (European Institutions - Law and Policy-making)</li> <li>2. 欧盟的经济与货币一体化 (Economic and Monetary Integration)</li> <li>3. 欧盟在国际危机中的全球角色(The EU as a global player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situations)</li> </ol>		
技能培训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政府廉政建设(Integrity Management Excellent);</li> <li>2. 跨文化交流(Intercultural Awareness Training);</li> <li>3. 外交礼仪(Diplomacy Protocol Training);</li> <li>4. 匈牙利语(Hungarian as Foreign Language)</li> </ol>		
游学参访	Bicske 难民营、匈牙利国防军卢多维卡部队、匈牙利总统办公室 Sándor 宫、佩奇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位于 Mohács 的欧盟申根水路边境巡逻站、匈牙利国防部维和训练中心、匈牙利外交部、匈牙利司法部欧洲法局、位于国会大楼的国会图书馆和欧盟档案中心、联合国难民署布达佩斯办事处、欧盟理事会驻匈代表处等等		

按照 ADB 项目规定，每位学生都必须修满 50ECT 的课程（一种欧盟学分体系），亦即要上五门必修课，在两个专业方向中选择一个并按规定修完相关的三门专业课，在四门技能培训课程中至少选择两门，最后要参加

为期两周的游学参访活动。本人在 ADB 项目中共修完了 55ECT 的课程，除了五门必修课外，选择了欧洲研究方向的三门课程，以及所有四门技能培训课程。除了一门课程之外的所有课程均拿到了 Excellent 的成绩，并最终得到了国际外交专家资格证书（International Public Service Diplomacy Expert）。此外，我还利用课余时间完成了由欧盟融合基金资助的为期三个月的匈牙利语初级班学习。在学习期间，本人与匈牙利国家行政大学教授、国际政治经济系负责人、前欧盟理事会高级官员 Attila Marjan 教授合写了论文“EU's regional policy and how it could benefit China's practice”，并将于今年 10 月份发表在国家行政大学主办的匈牙利社科核心期刊 Por Publico Bono（英文版）。此外，我还作为“非伊拉斯谟项目”的两名学生代表之一，通过中英双语参与匈方国家行政大学宣传片的录制，并在毕业典礼上作为学生代表接受了匈牙利媒体的采访。

## 二、在总统府与难民营里的外交课堂

布达佩斯外交研修项目最大的特点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这主要体现在任课教师和游学参访环节两个方面。

首先，国家行政大学是一所与匈牙利政府关系十分紧密的学校，学校与政府间的“旋转门”效应尤为突出。该项目的任课教师都是相关领域知名的学术专家和业界精英，大多数都有多年的政府一线工作经历。他们在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带来了一线工作的个人体验和大量的一手信息资源，让学生们得以更近距离、更细致地了解外交与国际关系的现实运作。

比如学校副校长、课程国际视角下的善治与公共行政的主讲教师 Norbert Kis 教授<sup>①</sup>，同时兼任匈牙利公务员上诉委员会主席，曾任匈牙利经济部的首席顾问、公共行政和司法部的项目负责人、人力资源部下属高等教育和科技部门的副秘书长等公职，在政府治理领域有着大量的实践经验。

比如国际组织中的法律与决策、人权的国际保护，以及欧盟的法律与决策制度的任课教师之一的 Tamás Lattmann 教授本人就是匈牙利著名的律师和国际法专家，课堂上所举的大部分案例都是他亲自受理的案件。此外，他也活跃于匈牙利政坛，组建了自己的党派准备参加匈牙利 2016 年的大选。

<sup>①</sup> [http://en.uni-nke.hu/uploads/media\\_items/cv-dr-norbert-kis-1.original.pdf](http://en.uni-nke.hu/uploads/media_items/cv-dr-norbert-kis-1.original.pdf)

比如欧盟的经济与货币一体化课程的任课教师 Attila Marján 教授，曾是匈牙利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亲自参与了匈牙利加入欧盟的入盟谈判，并长期作为匈牙利驻欧盟使团的高级官员，在欧盟理事会工作长达 14 年。同时他也是一位有国际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活跃在欧美学术界，出版了许多有国际影响力的著作。在课上讨论诸如欧盟经济危机等话题时，他总能透过多年的工作经验一针见血地直指问题本质。

再比如外交礼仪课程的任课教师 Orsolya Zöld 小姐本人就是匈牙利外交部礼宾司的高级官员、匈总统的外交顾问。而我们原本的教务秘书 Panyik Judit 小姐在项目进行到一多半的时候被调往匈牙利总统办公室工作。

其次，为期两周的专业参访活动，使我们得以零距离地了解业界动态，掌握一手资料。参访机构都是全球治理、国际关系和外交息息相关的政府部门和有关机构，这从另一方面体现出国家行政大学与匈牙利政府的紧密关系。

比如我们在课堂上讨论了难民问题，老师给出了有关难民问题的诸多理论和数据，也讨论了在该问题上的匈牙利立场。而游学参访行程的第一站就是匈牙利最大的难民营之一——Bicske 难民营。负责人向我们介绍了难民营的运行情况、营内难民的规模及其享受的福利待遇、政府的投资和社会资源、以及社工人数等等情况。四月中旬我们去难民营的时候，有关非法移民的讨论已在匈国内如火如荼，政府高调反对欧盟的难民配额制度，并连同其他 V4 国家在该问题上使得欧盟让步，甚至开始在南部匈塞边境修建防护栏以守卫申根边境，而当时的非法移民也主要是来自科索沃、阿富汗等地而并非是叙利亚难民。在难民营的参观访问，以及难民营负责人的介绍，都让我在那时就预见到更大规模难民危机在匈牙利的爆发，了解到在难民问题上新老欧洲之间的矛盾与张力。

比如，外交礼仪课程的任课教师 Orsolya Zöld 小姐，在匈牙利总统出访亚洲期间，安排我们在匈牙利总统办公室 Sándor 宫参观访问，实地体验匈牙利总统接待外国政要时的一系列流程和外交礼仪，也了解了总统在匈牙利政治体系内的角色安排。

此外，在匈牙利国防军卢多维卡部队、匈牙利总统办公室、佩奇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位于 Mohács 的欧盟申根水路边境巡逻站、匈牙利国防部维和训练中心、匈牙利外交部、匈牙利司法部欧洲法局、位于国会大楼的国会图书馆和欧盟档案中心、联合国难民署布达佩斯办事处、欧盟理事会

驻匈代表处等等机构的参访活动，以及相关负责人的讲座与介绍，都让我们了解了课堂里、书本或媒体上难以观察到的情况。

### 三、“联合国”班级里的和而不同

优秀的师资和课程体系设计让我都从各位教授的讲座中受益匪浅，然而更大的收获与冲击是来源于来自世界各地、背景经历迥异的同学们。在我参加的 2015 年 ADB 春季项目中，共有来自匈牙利、波兰、格鲁吉亚、斯洛文尼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马其顿、坦桑尼亚、尼日利亚、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韩国、柬埔寨、越南和中国等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 名同学。每当有重大活动，各国国旗一齐亮相，真宛若联合国大会时的盛况。



然而国籍仅是我们这个集体多样性的一个纬度。每个个体的年龄、种族、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等等也都有着巨大差异。比如，来自尼日利亚的克里斯蒂娜是班里的大姐，大众传播专业出身的她曾是尼日利亚国家歌剧院的导演，如今和先生以及两个女儿移民匈牙利，都是国家行政大学的在读博士，每当谈及非洲问题，都能提供许多其他人闻所未闻的情况，也在众多有关国际事务的讨论中提供了非常独特的“非洲立场”。来自坦桑尼亚的迪斯马斯目前是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已经在欧洲拿到两

个硕士学位的他仍然孜孜不倦地继续求学，特别乐于助人，对中国也十分友好，常常在课堂讨论中提出中国对非洲援助、改善当地经济和生活水平的事例。再比如我的室友艾琳娜是一名生活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长期工作在科索沃的媒体和 NGO 中，也是坚定的人权斗士。此外，还有在英国和西班牙读书的波兰姑娘欧而佳，在波兰读书的格鲁吉亚姑娘倪诺，在罗马尼亚读书的越南姑娘，曾在韩国外交部和联合国北京办公室工作过的韩国姑娘，“库尔德”地区的大学老师等等。此外，课堂里还有不少同修英文课程的来自俄罗斯、巴勒斯坦、伊朗等国家的同学。可以想见这样的课堂里，讨论起问题来是多么的有意思。大家有的时候能够达成一致，有的时候又争得面红耳赤，很多时候老师往往“主动”退为配角和聆听者。这样的讨论非常有价值，常常让我欣喜万分。主要的收获有以下两点：

首先，我不仅获得了大量前所未闻的新鲜信息，更慢慢跳出了惯有的“大国思维”，学着从第三方尤其是中小国家的视角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中国的媒体与学界在国际问题上都主要关注欧美俄等发达大国的声音，对于很多中小国家和地区的国别区域研究都很不够，往往忽视了大量的多样化的思考，听不见许多有价值的不同声音。目前，中国正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了解这些“非主流”的思考和声音就显得更加重要。比如伊朗和巴勒斯坦同学对于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的赞许态度，巴尔干地区和部分东欧同学对于土耳其的依赖与警惕并存的心态，比如库尔德同学和科索沃同学对于美国态度的强烈反差，中东欧国家对于俄罗斯的拒斥程度等等，都让我大开眼界。观点分歧并未影响大家私下的感情，虽然来自俄罗斯的里那特在课堂上遭到了众多中东欧同学的“围攻”，课下却被大家称为“最可爱的俄罗斯人”，甚至还俘获了波兰姑娘的芳心。有人说，国际关系与人际关系相通，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

其次，我切身感受到中国学生在国际化程度和语言能力方面与其他国家同龄人的差距。在前面同学的背景简介中可以发现，几乎所有人都有国际学习与交流的经历。其中，我最直接感受到的就是语言能力的差距，主要体现在英语表达能力以及通晓语言数量这两方面（外语专业的中国同学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我的室友艾琳娜曾开玩笑说：“我们生活在科索沃的人不得不多学几门语言，因为不知道明天又会是哪个国家来统治这里”。虽然是句实在的玩笑，但我认为除了语言环境等客观因素之外，通晓语言数量的多少其实反应了语言学习能力与学习效率的差距。

此次 ADB 项目的同学中，通晓四五种语言的同学相当普遍，并且可以明显感觉到大多数同学的英语能力很强，主要体现在表达流畅、用词准确且词汇量很大。仍记得去年在阿拉木图参加主题为“中亚的现代化与冲突”暑期班时，第一天自我介绍的环节除了基本信息以外，老师还请大家介绍各自掌握的语言。来自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学生除本国语言和英语之外，至少熟练掌握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之中的一种；来自中亚国家的同学更是人均至少通晓五种语言，他们除了本国语言以及英语和俄语这两门基本通用语外，对于中亚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语言也能熟练掌握并运用于学术研究；相比之下，我只能很没底气地坦白：“I speak only Chinese and English”。在这一方面，我深切地感觉到中国学生的语言能力尚未实现与国际接轨。

国际化程度和语言能力仅是我作为观察者的众多切入点之一，我也明白项目中的同学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不一定能代表普遍情况。但这种国际化和语言能力的差异始终贯穿在六个月的欧洲之行中，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是：全球化的时代，全世界的精英都是我们中国青年强有力的竞争者，当有一天不得不站在一起同场竞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他们的对手？

#### 四、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在这样的集体中，我同时扮演着观察者和参与者的角色。一方面，倾听了解各方立场与观点，尤其是观察“他者”眼中的中国，及其与“我们”自我认知之间的差距；而另一方面，也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解释中国立场，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本科四年在人大新闻学院的专业学习，让我意识到主动进行议程设置和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性；而研究生阶段在华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对于国际关系知识的系统学习，既提升了我的相关知识储备，也不断锻炼着我与国际朋友们相处的能力。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希望为祖国尽绵薄之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中国”。

在匈牙利为期半年的“布达佩斯外交研修项目”中，我的同学们 14 个不同国家。在日常交流交往中，我发现除了亚洲同学以外，大家对于中

国的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所知甚少。同学们对于中国的了解仍然停留在古老中国的模糊印象中。因此，作为唯一一名中国学生，我一直在同学中进行一些有关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知识普及工作。一方面，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牺牲与贡献，应当被世界各国的人们所了解和铭记，这段历史也是最容易与他们产生情感共鸣的地方；另一方面，了解中国的过去也更有利于他们理解中国的今天和未来。让我欣喜的是，同学们对于中国这一段历史也充满了好奇，他们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解中国的苦难与辉煌。这更加坚定了我通过历史与文化的手段，做好“向世界说明中国”工作的决心。我利用课堂演讲，向同学们介绍春节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习俗，解释中国的内政与外交，尤其积极地介绍一路一带战略及其与沿线国家的关系；也尝试在课后组织同学们通过包饺子等活动品尝中国美食、了解中国文化。作为 ADB 项目的学生代表在帮助学校录制的宣传片中，我除了使用英文演讲之外，还专门用中文进行录制。

综上所述，我在匈牙利国家行政大学 ADB 项目中度过的六个月是十分充实且有益的，是我个人学习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在这里，我极大地开拓了视野，也进一步自我提升。在体验过中国和美国大学的教育方式后，我借此感受到“欧洲教育模式”的不同；在熟悉了中国和美国的“国际视野”后，又感悟到“欧洲视角”的独特。在此期间，我对于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的学术研究热忱也与日俱增，尤其对于“新欧洲”在 2004 年加入欧盟之后的艰难磨合与身份转换颇感兴趣。研究了解中东欧国家的现实问题和需求，对于中国推进一路一带战略，对于在不同层面（成员国、理事会等）聪明地与欧盟打交道十分重要。而坚持匈牙利语的学习、在匈牙利的学习生活经历以及与匈牙利政界及学界的联系，这些条件都有利于我对于匈牙利的政党与选举体制、移民问题、中东欧对于历史上的前苏联和现实中的俄罗斯的反叛与认同、新老欧洲的分裂等课题进一步地深入学习与自主研究。我由衷地感谢华师大的国际交流平台，为学生们创造机会，鼓励我们不断走出去探索世界，也在其中不断发现自己的潜能。

（责任编辑：陈子越）

# Close Observation of Belgian Demonstration\*

史书怡\*\*

## How was the demonstration organized?

The demonstration was organized by Belgium's three main trade unions in Common Front: the ACV-CSC (Christian) with 1,700,000 affiliates, the ABVV-FGTB (Socialist) with approximately 1,200,000 members and the ACLVB-CGSLB (Liberal) with 240,000 members.

As the demonstration was organized to protest against the economic strategy of the Belgium government lead by Prime Minister Charles Michel, the day 7th October was selected because it marked 1 year for the government in office. The city center of Brussels was targeted as Brussels is the capital of Belgium, which promised more attention from both the public and the government. The route chosen for this event was to rally the North station to the South station in Brussels, which is the usual track taken by the demonstrator in such case, but for this time, the course had to be changed a little bit due to the renovation work of the new pedestrian area in the city center.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police was massively present at each street corner to maximize security. People from nationwide gathered on the street to protest. There were more than 80,000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police, (the trade unions said 100,000) mobiliz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monstration.

The demonstration began around 11.00 a.m., a little bit earlier than what was planned. That caused confusion to demonstrator- the supposed leader of the demonstration could happen to find itself lost in the crowd halfway. People dressed in clothes specially prepared for the demonstration with certain colors including red, green and blue, which represent the three trade unions. It was easy to notice that red and green represented the two of the largest group, the socialists and the Christian respectively, while blue stand for a rather marginal group, the liberals. Furthermore, one could easily notice the different regional sections of the trade unions. In Belgium, trade unions are divided among different sectors of profession and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country. It is hard to assess precisely which groups were the most present, but it seems that there was a linguistic, regional and professional balance within the protester, with a stronger presence of workers. For example, we have seen HORVAL (the hotel

---

\* 本文系作者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ULB) 游学期间, 现场观察布鲁塞尔大游行后所作, 感谢作者授权本刊独家发表。

\*\* 史书怡,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and catering industry section of the FGBT), SETCA, CGSP, ACV-CSC-Metea, the regional section of Namur of the FGTB and so on.

But as the demonstration went on, the different trade unions gradually got mixed in the cortege, and in the end, the original three main blocs of certain colors turned into some smaller groups of certain trade union members, as most demonstrators tend to walk next to their colleagues of the same company belonging to the other trade unions. Moreover, not only trade unions were present during the demonstration. Some NGOs such as OXFAM, opposition political parties like Groen (Dutch-speaking green party) and the Socialist party, student unions such as the FEF, and other community like Vie Feminine had also taken part in it.



### **How do these groups convey their claims?**

They used a lot of tools to make noise: drums, sound equipment, whistles, trumpets and firecrackers. They were also shouting slogans from time to time. While balloons, flags, banners, placards, cars decorated with posters were used to express what they were marching for. Demonstrators marched orderly and rather peacefully. However some groups of anarchists, and dockers from Antwerp caused some trouble. The police had to intervene with tear gas and pumper truck to break up the crowds of protesters. Even though, these represented only a small minority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 Belgian and international press paid extra attention to these events, as the images were strong and shocking. However, the media also took the time to explain again the reasons behind these demonstrations and to relay the speeches of the trade unions' presidents for example.

### **Comparison of demonstrations in Belgium and mainland China**

Demonstrations are much more frequent to be seen in Belgium than mainland China. In Belgium, demonstrations of various kinds of sizes, are organized weekly. While in mainland China, the last serious demonstrations happened during 2012 at which time Chinese people were angry about Japan's actions because of the issue of Diaoyu Island. It is notable that these demonstrations were against the other country. They were really not as organized as demonstrations in Belgium, but before the demonstrations, there were people calling for demonstrations on a specific date on the websites. So there were demonstrators participating spontaneously during the period of demonstrations, also there were demonstrators participating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nd tried hard to attract more people to join in, mostly relying on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Demonstrations are more strictly controlled in China than Belgium. As the experience gained from practices are very little for Chinese people, the actions in demonstrations were more disorganized in China in some aspects. For example, in demonstrations asking for boycott of Japanese products, demonstrators were out of control, escalating to arson of Japanese vehicles owned by Chinese citizens.



(责任编辑：刘娅楠、刘畅)



## Russian Policy over Syrian Crisis

Rufina Kalapova \*

Today's society has encountered a major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as soon as possible, terrorism.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s, the center are escalating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fighting have influenced other countries negatively.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have been demonstrated by the increase in civilian recruitment by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and the flooding of immigrants into Europe. This has created an insecure, unpeaceful and unstable situation worldwide. The most well-known and belligerent terroristic organization bringing chaos to this planet is the Islamic State (IS). The media is flooded with this hot-discussed topic describing the actions of the terrorists and the steps made by nations to prevent the rise of evil. This article will be mostly devoted to obstacles, contribution and consequences on the way of Russia's struggling with terrorism.

First, let us look through the history of the IS. On the basis of secular texts preaching a primary purpose of a bloody war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Muslim empire, the IS separated from Al-Qaeda in 2013 because of its imperialistic ambitions. According to the Russian News Agency, TASS, the IS announced "Islamic caliphate" on the grounds of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of Iraq and Syria on June 29, 2014 and appointed Abu Bakr al Baghdadi as their leader or the Caliph. The ideology of caliphate known from the Middle Ages implies the renaissance of the Muslim empire flourishing, blooming, and power. The activity of the IS can be explained through the unwillingness of some groups to be part of globalization, the integration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religious spheres. From the beginning of its foundation the IS worked on uniting different terroristic organizations and creating new provinces of the Caliphate all over the world, which has become the main direct military threat for all countries. Presently, the loyalty to the new caliphate is shown by about 60 jihadist organizations from 30 countries of the world. Based on CIA data, we know that the number of members in the IS is about 30000 men; while the Iraqi authorities claimed that it is 200000. The militants consist of citizens from 80 countries, including France, the UK, Germany, Morocco, Saudi Arabia,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Russia and the Central Asia countries. After capturing portions of Iraqi and Syrian, the IS has at its disposal all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for further military campaigns - oil,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

\* Rufina Kalapova (俄罗斯),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5 级“当代中国研究项目”硕士研究生。

income, military machines and equipment.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and eager activity of this radical organization is explained by profits from oil, drug and slave trading on black market, plundering, racketing; recruiting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cluding children and women. Moreover, many ex-militarists that were trained to fight against terrorists are persuaded to convert to the IS. So, we see that the IS possesses many signs of a real state, such as, territory, population, a governing regime, governor, a system of ruling, its own resources, religion, language, ideology and even state attributes: such as a flag and seal. On September, 3<sup>rd</sup> the IS made a statement about creating its own currency – the golden dinar. Fortunately, o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the IS is not recognized as a real state.

However, the IS picked up speed very fast. According to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if the IS controls much of the Syrian territory it would pose a direct threat to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uch statement is not unfounded. At the beginning of September 2014, this jihadist faction threatened the Russian subject, the republic of Chechnya, with its ‘liberation,’ meaning full independence from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dditionally, in June 2015 a special video was released online stating that the Caucasus Emirate, an Islamic terrorist organization operating in the Northern Caucasus, joined the IS. Further proving it as a real menace, the IS is engaged in a fierce conflict for power with the Taliban on the border between Afghanistan and Tajikistan, next to a Russian strategic military base. Moreover, we cannot underestimate the essential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like Facebook and Twitter, Islamic thrillers use to influence people’s minds anonymously with impunity for recruitment. According to Syrian mass media, the IS has recruited about 70000 foreigners. The most well-known example of a recruited rebel from Russia is Karaulova Varvara, a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student. She was deported to Moscow after her arrest at the Turkish-Syrian border. Christina Presnyakova, a 25 years bride, ran away to her Syrian husband to combat on the terrorists’ side in Raqqa. Vadim Dorofeev, a famous Russian actor, died on January, 26<sup>th</sup> 2015 fighting for the IS. He converted to the Islam, and then left his family explaining it just by telling “if Allah wills”. (<http://tass.ru/info/1264570>) The number of recruited people is rising every day. After being brainwashed by terrorists and given a special task from Allah to get rid of all nonbelievers in Islam, these rebel fighters could be a potential danger for society; causing a new wave of terror acts when they come back to their motherlands.

Such a quickly spreading threat cannot be handled by one country that is why in the 70<sup>th</sup> Regular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held in late September in New York, the members of meeting touched upon the problem of terrorism and tried to find the solutions. As stated by Russian journalists, UN Secretary General Ban Ki-moon expressed a big hope in the meeting with Vladimir Putin, that Russia and the USA could finally reach an agreement on

the world's urgent challenge – the Syrian crisis. During sessions the Russian leader underlined that supplying the Syrian Army with weapons and other military equipment is not effective enough because they can fall into the hands of terrorists. According to CNN, Putin told that there would not be any Russian ground troops in Syria, otherwise a war with the IS could begin. Thus, the only option is distant interference. Also Mr. Putin announced that the Russian airstrikes aim to secure the stability of Syria by supporting Bashar al-Assad who is the only one who really fights against the terrorists. Here the main disagreement appear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SA with its allies, who refuse to cooperate with Assad. The US and its allies are convinced that the IS cannot be destroyed unless Assad leaves the country. He is still recognized as a “tyrant, who drops barrel bombs to massacre innocent children,” said the USA president, Barak Obama. Obama adds that after four years of the civil war in Syria “Assad cannot stay in office anymore.” France President Francois Hollande says that Assad is a dictator and “refugees are fleeing from his regime.” Deutsche Welle, a German radio station, announced: “no lasting peace with Assad.” Samantha Power, U.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 told Le Figaro that the Syrian crisis could have the end only if Assad left his post because radical military groups came to Syria to fight against his regime.

Why would Russia be so interested in supporting Bashar al-Assad when all other great politicians are against him? First, Assad is a legitimate state leader, elected by people according to all democratic procedures. Russian Foreign Ministry’s spokesperson Maria Zakharova declared in TASS that the demands for the resignation of current Syrian president are “the direct implementation of terrorists' logic.” Second, Assad allows Russia to hold its only naval base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at the port city of Tartous. Third, Assad belongs to Alawite sect, a branch of Shia Islam, which is practiced in Iran, the main ally of Syria. Russia also has clos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ies with Iran. Thus, the Kremlin suggests a pragmatic approach: tackle the IS and defeat it, then deal with political reform through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Russia is actually not alone in this regard. Recently,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also declared that Germany is ready “to negotiate with many actors, this includes Assad” to solve the problem with immigrant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Now let us reconstruct the course of Russian attacks in Syria. At the request of Syria’s President, Russia began carrying out the airstrikes on September 30<sup>th</sup>. Based on the numbers released by Russian Defense Minister Sergey Shoygu, Russia has sent dozens of fight missions and launched more than 100 airstrikes since it started the military campaign against the IS. Shoygu said that the primary targets were IS command points, ammunition and explosives depots, communication hubs, workshops to produce weapons and militant training camps. Russian officials stressed that all relevant countries

were informed of the airstrikes in advance, and that the U.S. confirmed with Russian side that there were only terrorists in the airstrike regions. However, in Qatar, Turkey and on some western websites Russia was accused of attacking moderate opposition and killing civilians even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irstrikes. Such information wars are usual for news websites maligning non-guilty sides just in order to raise their ratings. Then, Syrian ambassador to Russia Riad Haddad officially refuted those statements. BBC's website published a joint statement by France, Germany, Qatar, Saudi Arabia, Turkey,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aying that military action by Russia would serve only to "fuel more extremism and radicalization." Foreign Minister Sergey Lavrov responde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all this is being done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 On October 7<sup>th</sup>, the Kremlin's website published that Russia launched missiles from warships in the Caspian Sea, destined for at least 26 targets in Syria. Russian government got approval from Iran and Iraq to use the corridors on their territories for missiles. "Over the past 72 hours, we have managed to undermine the material and technical base of terrorists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ir combat potential," Interfax news agency quoted A.Kartaplov, the deputy 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 of Russian Armed Forces. On October, 21<sup>st</sup> the Syrian leader, Bashar al-Assad thanked Russian authorities for timely steps taken to preserve the unity and independence of Syria. Therefore, by observing the situation Putin has acted according to a well-organized plan, focused on ending the chaos created by the terrorists.

Unfortunately, everything is well only if it ends well. On November 1<sup>st</sup> a great catastrophe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and Soviet aviation happened, passenger jet A321 from Egypt fell apart in the air. The crash case is still being investigated and Russian authorities have not given any exact assessments. But soon in mass media two provocative caricatures appeared, made by French newspaper Charlie Hebdo, well-known for its satire. The first picture was of flying parts of the plane and bodies of passengers pouring on the heads of the terrorists, with the inscription "Russian aviation strengthens its bombs attacks." The second depicts a skull in sunglasses that lies among the plane's wreckage and bodies. Under lies the cation, "I should fly by air cocaine." Actually, these pictures raised Russian deputies' indignation and were recognized as sacrilege. French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Roman Nadal has announced that despite freedom of speech, the opinions of journalists don't impose duties on French government. On November 3<sup>rd</sup> the IS released a boastful video where IS claims to have brought down the Russian plane. Then sweets were handed out to small children, celebrating the Russian air crash tragedy. Hopefully, justice will prevail and those who are guilty in the deaths of innocent people will get their penalty.

The West wonders what Mr. Putin wants to get after using hard power in Syria and guesses that he is trying to distract the world's attention from the Ukraine crisis. Furthermore, the west wonders whether he is willing to strengthen the role of Russia in the world arena or is he just helping and saving Bashar al-Assad as a tactical response. However none of these are the case, Russian experts in politics explain that Russian authorities are trying to widen its participat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world's greatest evil, terrorism, which directly threatens Russian interests and critically destabilizes the situation in Europe. In the past, Russia's strategic location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saved Europe from Mongol and Tartar raids and now Russia also tries to help. Moreover, Russian government supports a legitimate Syrian president without intervention in the country's traditional regime and not attempting to impose democratic values. We should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not smoke without fire and people would not be recruited by terroristic ideology if they are unemployed, impoverished, and crushed from wars. We can hope that the right intentions, rational plans and reasonable actions of all countries will lead to good results and the end will justify the means.



(责任编辑：王志浩)

# 君特·格拉斯《我的世纪》 之《1933年任命的消息》文本解读

刘跃越\*

**【摘要】** 本篇文章是主要是笔者结合作品历史背景，从文本内部阐释以及文本是社会的反映等理论出发，对君特·格拉斯《我的世纪》之《1933年任命的消息》一文进行阐释。其中包括作者简介，《我的世纪》作品简介，以及文章内容的梗概和对希特勒上台原因的分析。文章重点在于结合文本内容和当时历史背景对希特勒上台原因进行分析，并从文本出发结合历史背景对作品深层内涵进行剖析，结束语部分总结了该作品给予读者的启示。

**【关键词】** 《我的世纪》；《1933年任命的消息》；君特·格拉斯

## 引言

1927年10月16日，格拉斯出生在但泽（现今波兰的格但斯克）一个小贩之家，父亲是德意志人，母亲是属于西斯拉夫的卡舒布人。爱好戏剧和读书的母亲使格拉斯从小就受到较多的文学艺术熏陶。格拉斯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正值纳粹统治时期。他参加过希特勒少年团和青年团，未及中学毕业又被卷入战争，充当了法西斯的炮灰。1945年4月，十七岁的格拉斯在前线受伤，不久就在战地医院成了盟军的俘虏。也正是因其曾参加德国纳粹党卫军而饱受争议。本篇通过对小说进行阐释看出作者格拉斯意欲通过故事唤起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呼吁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他笔下的世纪留给读者的更多的是对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思考。

## 一、君特·格拉斯简介<sup>①</sup>

君特·格拉斯（1927.10.16—2015.04.13），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铁皮鼓》、《猫与鼠》。格拉斯为当代联邦德国重要作家，因其语言新颖，想象丰富，手法独特使他在当代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曾多次获奖，几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最终由于作品《铁皮鼓》获得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他除了在文学界享有盛名，格拉斯还活

\* 刘跃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德语系2014级硕士研究生。

① 百度百科：君特·格拉斯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8lWyt8N9MjavS61tItddtIeE0lMnSdqPigHFRQSYsyWYNL6nIxg7NhLRCzGHo8SHTDuW1CEdnys0fZxFAQmi--978deV-rLZYHJWB25uBK7lWMOCzKiH3lYDMlbClKi1ya0Lf5lYn3Ok64\\_vlLJ2upHYKa3eOGM3dR6WvmByGxYQ2seFMldYvOo1UHZPLQix3](http://baike.baidu.com/link?url=8lWyt8N9MjavS61tItddtIeE0lMnSdqPigHFRQSYsyWYNL6nIxg7NhLRCzGHo8SHTDuW1CEdnys0fZxFAQmi--978deV-rLZYHJWB25uBK7lWMOCzKiH3lYDMlbClKi1ya0Lf5lYn3Ok64_vlLJ2upHYKa3eOGM3dR6WvmByGxYQ2seFMldYvOo1UHZPLQix3)



跃在战后德国的政治舞台上。格拉斯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坚决反对北约在德国的土地上部署核武器。两德统一后，格拉斯更致力于反对逐渐滋生的仇外主义和新纳粹黑暗势力。

## 二、《我的世纪》简介及 1933 年内容梗概

君特·格拉斯《我的世纪》于 1999 年出版，此书体裁独特，内容包罗万象。作者用日历故事的形式写下了 100 个故事。从 1900 到 1999 年，作者让不同的人物从不同的视角以历史为背景按从远到近的时间排列顺序每年讲述一个故事。故事的内容不仅有 20 世纪发生在德国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有看似不重要但同样对人们产生很大影响的日常生活琐事。它们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体育等各个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故事既有独立成篇的，又有互相关联的，他们看似互不相干，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全书穿越不同的历史时空，使现实和历史互相交织，真实的表现了德国历史。

《1933 年任命的消息》讲述的是 1933 年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之时，身为犹太人的画廊老板与同事选择逃亡到荷兰，但是艺术大师马克思·利伯曼并没有选择逃亡。本文的着重笔墨描绘希特勒上台时冲锋队员及人民大众的反应，他们对希特勒的拥护，冲锋队员的激动兴奋的表现。

## 三、文学理论

德国作家 Jochen Vogt 在 *Einladung zur Literaturwissenschaft*<sup>①</sup> 这本书中指出德语中的文学不只是描写德国的文学史，而是想要让读者在阐释作品时看到其中反映出的历史。本文就是想从这一理论出发，对君特·格拉斯的《1933 年任命的消息》进行阐释，来反映当时历史，表现其对法西斯统治的厌恶与嘲讽。

Kayser 认为文学的内部阐释更注重的是语言的力量，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应该和社会生活隔离开。本文会用一定篇幅来分析作者的语言，从中发掘作者想要赋予其中的意义。而 Siegfried J.Schmidt 则认为文学指的并不是大量的文章，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人类活动之间一种特殊的交际关系。文学作品是不仅是为了传递信息，更是为了引起读者共鸣，引发读者深思。本文就是将文本与历史背景结合，来领悟文本字里行间所要表达的思想。

## 四、结合历史背景对文本内容进行阐释

---

<sup>①</sup> Jochen Vogt, *Einladung zur Literaturwissenschaft*, 3., durchges. und aktualisierte Aufl. -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2002

## （一）希特勒上台的原因

笔者将希特勒上台的原因大致总结为三点：

第一，希特勒自身内部的原因，他从小就具有强烈的民族热情与民族荣誉感。在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中，有这样一段：

“我有幸得到了一位懂得很少人懂得的……去芜存精的原则的历史教员，这对我后来的生涯也许去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林嗣中学我的教室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的身上，这个条件得到了真正理想的满足。他是个温和但是严格的长者，不仅能够以其滔滔不绝的口才吸引我们的注意，而且也能够使我们听得出神……我们坐在那里，心中常常燃烧着热情，有时甚至感动得落泪……他利用我们萌芽状态的民族热情作为教育我们的手段，常常唤醒我们的民族荣誉感。这位教员使历史成了我最喜爱的科目。”<sup>①</sup>

希特勒的父亲是海关官员<sup>②</sup>，也希望希特勒以后可以当公务员，但希特勒却相当画家，于是他故意使自己成绩不好，也看不上老师，认为他们都是扼杀孩子内心思想的刽子手。但是他却对历史课目情有独钟，从中可以看出希特勒极高的民族热情，这也为他后来的种种罪行埋下了伏笔。

第二是历史原因，一战之后政府签订《凡尔赛条约》，巨额割地赔款，引起民众不满，使民众具有复仇心理。为嘛共和国民主制度的瓦解，使得德国经济恶性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笼罩全国。据说当时通货膨胀的情况可以用一下情景来描绘：一个妇女提着一个篮子去换钱，但是走的时候她却忘记带走了，等她回去找的时候，发现篮子丢了，而钱却散落在一地。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啊，在这样的动荡的社会中，人们是多么缺乏安全感<sup>③</sup>。同时也由于德国的军国主义传统，军队在国家中占很重要的地位。一些军国主义者要求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由于长期的专制统治和专制文化的影响，在很多群众思想中，对民主自由轻视，而对专制却很渴望，盲目崇拜权威。很容易接受希特勒的反共和制的宣传。希特勒迎合德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蛊惑人心的宣传，骗取了人民的支持。这是希特勒上台的重要原因。希特勒上台在被凡尔赛体系压制许久的坚忍却从不屈服的德国人看来，就是顺应了民心。

第三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与扶植，纳粹党才能上台执政。纳粹党在争取下层群众支持的同时，十分注意同统治阶级勾结。由于纳粹党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垄断资产阶级一开始对它有所戒备。但希特勒积极努力，

<sup>①</sup> 请参见：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美国版（1943年波士顿），第20页。

<sup>②</sup> [美]威廉·夏伊勒著，董乐山等译，《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

<sup>③</sup> [美]约翰·托兰著，郭伟强译：《从乞丐到元首·希特勒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11月第4版。

多次与经济界的重要人物进行会谈，他保证决不侵犯他们的利益，而且还要为他们开辟海外市场。垄断资产阶级开始在政治和经济上对他进行大力支持，成为纳粹党的后台<sup>①</sup>。

### （二）结合历史背景对文本进行解读

文中“任命的消息（Die Nachricht von der Ernennung）”与“夺取政权（Machtergreifung）”都是特指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画廊老板对希特勒的上台既惊讶又不惊讶，惊讶是因为没想到这么快希特勒就上台，不惊讶是因为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将军因不满总统未对他赋予更大的权力而宣布辞职之后，兴登堡采取权宜之计只能将希特勒命名为总理。文中提到的“作为画家的油漆匠”指的就是希特勒，笔者认为这是作者对希特勒的讽刺这可以从《我的奋斗》中找到线索：

我不要当公务员，不，不。我父亲为了要使我热爱这个职业，对我讲了些他自己一生经历中德故事，但是这一切努力的结果适得其反。我……一想到坐到一间办公室里，被剥夺了自由，不能再自由支配我的时间，不得不把我的一生花在填写各种各样表格上面，心中就感到作呕……

有一天，我终于决定要做个画家，做个艺术家……我的父亲听了吃了一惊，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什么，画家？艺术家？不行！只要我还剩一口气，我觉得不答应！”<sup>②</sup>

希特勒从小立志做个画家，但是他曾经两次参加维也纳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但两次纷纷落榜，少年的希特勒不服气，还询问院长自己落榜的原因，院长给出的回答是他并不适合学绘画，他的才能显现在建筑方面。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的日子里，一开始的时候做小工，后来可以独立工作，做个小素描家和水彩画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并没有像他的政敌或作者所嘲笑的那样当过房屋油漆匠。至少没有材料证明他干过那个行当。他那时候干过的事是绘制一些拙劣的维也纳画片等，而且据他相认的人说他是从别人作品上临摹下来的。希特勒在1921年夏天夺取纳粹党的领导权之后，决定为纳粹党制作一面党旗。经过多方面考虑和对不少图样进行比较之后，最后想出了这样一面旗帜：红地白圆心，中间嵌着一个黑色的卐字。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解释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象征！”“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卐，德文 Hackenkreuz，译意“代钩的十字”，虽然袭用于古代，却成了纳粹党党旗的标志，不久也成了纳

<sup>①</sup> [英]玛丽·弗尔布鲁克著，卿文辉译：《德国史 1918-2008》，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

<sup>②</sup> 请参见：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美国版（1943年波士顿），第20页。

粹党锦旗、党徽、臂章的图案，成了纳粹党令世人望而生畏的法西斯标志，希特勒纳粹党上台执政后也成了纳粹德国恐怖和战争暴行的标志。这也是希特勒作为画家所创作的一部让全世界铭记的“作品”。

文中画廊老板之所以选择逃亡，之所以把一些画作转移到阿姆斯特丹，就是因为这些艺术品术语“堕落艺术品”。“堕落艺术”<sup>①</sup>（德语：Entartete Kunst，英语：Degenerate Art）又译作“颓废艺术”，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纳粹德国在官方宣传中创造的美学概念，是当时被定为具有厌世主义倾向的艺术的总称。从内容上看，堕落艺术涵盖了大部分的现代艺术，也包括了几位特定的作者。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将艺术完全政治化的规模是空前的，这也导致了对于德国之前的文化名人的彻底颠覆，这不仅仅表现在艺术上也表现在文学、音乐和电影上，当1933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执掌政权之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抨击当时的文学艺术创作者，成千上万的书籍被焚毁以证明新政府对艺术的态度和政策，堕落艺术展其实只是冰山的一角，1937年，在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指挥下，大约有16000件现代艺术作品被称为是“堕落的艺术”，很多这样的艺术品被卖给了国外的收藏家以解决困难的经济形势。文中提到的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尔希那（Ernst Ludwig Kirchner），马克斯·佩希施泰因（Max Pechsteinn），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都是德国表现主义作家，是当时“堕落艺术家”的代表，所以画廊老板将他们的画作提前转移出国。

文中提到的令画廊老板敬佩的大师马克思·利伯曼（Max Liebermann, 1847-1935年）是柏林脱离主义艺术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把法国印象主义等欧洲艺术风潮介绍到德国。他以描绘荷兰和德国日常生活的感性画作而闻名。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受到马奈的影响，加入了印象派画家行列<sup>②</sup>。1920到1932年间他担任普鲁士艺术学院的院长，直到1933年受到纳粹统治的影响而被迫辞职。

在描绘冲锋队员举着火把游行的时候，作者选取的地点有胜利大街（die Siegsallee），大星广场（Großen Stern），柏林登堡门（Das Brandenburger Tor）这些有特殊意义都代表胜利的地点。在大星广场上面立着1871年德法战争的胜利女神柱。而柏林登堡门是德国注明的民族的标志，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最初是柏林城墙的一道城门，因通往勃兰登堡而得名。现在保存的勃兰登堡门是一座古典复兴建筑，由普鲁士

① 请参见：百度百科：“堕落艺术”，[http://baike.baidu.com/link?url=-G3wxBw-Sdg4x\\_snpT2T2FHL7CQNQcMdORD6Iwm3HCwzzYmEuOBXAo0hPVqmNe2YOIfqXAKmrEN1eYAE-KNXzq](http://baike.baidu.com/link?url=-G3wxBw-Sdg4x_snpT2T2FHL7CQNQcMdORD6Iwm3HCwzzYmEuOBXAo0hPVqmNe2YOIfqXAKmrEN1eYAE-KNXzq)

② 请参见：百度百科：马克思·利伯曼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yj05dGMp87ecRgxnN251ebXVu--mtl298ZTM2KxMM5iorlcWJpN1iJQRu9UpBJDymUz1mxAL8D7FoVQpKw0dOa>,

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下令于 1788 年至 1791 年间建造，以纪念普鲁士在七年战争取得的胜利。文中也提到大师曾三次见证在柏林登堡门前发生的事件，1871 年普法战争胜利，1914 年一战开始，他看到开往前线的还戴着尖顶头盔的步兵从门前走过，1918 年基尔水兵起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德国败局已定，但德国统治集团仍想孤注一掷进行抗争，海军司令部下令基尔港的德国远洋舰队出海同英军作战，若失败就“光荣地沉没”。基尔港的 8 万名水兵拒绝起锚，并把军舰熄了火。水兵的抵制虽然迫使德国海军当局收回命令，但水兵们却遭到迫害，被逮捕了几百人。水兵走上基尔街头游行示威，抗议海军当局，要求释放被捕者。最后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工兵代表苏维埃，吹响了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号角，11 月 9 日，从前线归来的士兵挥舞着红旗进入柏林，加入革命队伍。这些地点的选取都是与历史事件相结合的，1933 年柏林登堡门再次见证了纳粹党为纪念希特勒夺取政党而举行的火炬游行，他的上台犹如火把一样照亮了一切，照亮了德国人民的未来，这些描写都具有讽刺意味。

### （三）从纯语言角度分析文本

格拉斯的作品用丰富的想象、独特的手法、新颖的语言，常把现实主义描绘和现代主义手法熔于一炉，在戏谑、诙谐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批判。他尽力展现出了一个光怪陆离、神奇虚幻的世界，揭示出了历史被遗忘的一面。下面就从作者的写作特点方面来分析文本。“多少次在画室里拜访大师！每次谈话总是充满智慧，有时也很风趣。他的那种用干巴巴的柏林方言讲的幽默。”“从这幅孕育历史的画面，就像是从一幅巨大的油彩未干的历史油画，掉转目光之后，他用柏林方言说道：“我实在吃不下这么多我想吐出来的东西。”这里运用了互文的手法，前后呼应，同时也有运用了讽刺的手法，来表明在希特勒上台之际，纳粹党人及民众的欢呼与拥护这种行为极其令人厌恶。

作者用了一定笔墨来描绘纳粹党人当时难言的喜悦之情，作者的刻画惟妙惟肖，贴近生活，让我们即使没在现场却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置身在喧嚣之中。同时也能够说明纳粹的宣传是多么具有煽动性，就连作品中的画廊老板自己也说到“多丢脸啊！只是我不愿意承认，这幅景象，不，应该说这幅逼真的绘画，虽然使我感到惊恐，但是同时也让我激动万分”，甚至如果没有马克思·利伯曼的话，他自己也差一点喊出“胜利万岁”，通过作者淋漓尽致的描写，我们切切实实可以感受到当时那种“振奋人心”的场面。“每当游行队伍被堵塞的时候，他们都在原地踏步，焦急难忍，毫无耐性，但是从来没有停下脚步”，从中可以看出纳粹冲锋队员的心理。他们为希特勒当选总理而欢呼，他们成千上万人，排成整齐的队形，他们的乐队在震天的鼓声伴奏下吹奏着军乐，他们的嘴里高唱着《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和其他一些同德国一样古老的歌曲，他们的长筒靴在马路上

咔嚓咔嚓才出了有力的节奏，即使道路拥堵，他们也不停下，而是在踏步，足以看出他们内心的兴奋之情。

作者在文中将德国民众称作“看客”（Schaulustige(r)），而不是大众（Masse）或者人民（Volk）等没有感情色彩的词语，而这个词语中通常具有贬义，是指具有看戏心理或者兴趣的人，作者这样用词，是想说明纳粹党的做法将民众深深吸引，他们已经失去了判断能力，而盲目的跟随冲锋队员表达自己庆祝的欢呼，觉得终于有人能为他们做主，走出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是可悲的，他们无形中扮演了历史推动者的角色，他们的欢呼，他们的拥护，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希特勒独裁统治的得以实现。

同样在对冲锋队员的表现进行描绘时，作者也选取了一些特定的词语，比如 ekelhaft（令人恶心的），Pöbel（这帮乌合之众），anschwellende Gebrüll（一浪高过一浪的狂喊乱叫），Qualm（烟雾），Gestank（臭气），将冲锋队热情高涨的场面用这些词语来描绘，表明叙述者对纳粹冲锋队行为的厌烦情绪。从中可以看出纳粹统治的毁灭性就如同熔岩流一样，具有一种毁灭性的力量，暗指对犹太人的迫害；即使碰到门柱暂时分开，然而又会重新聚合，这表明这股力量是无法阻挡的，命中注定的；同时也能看出他们对希特勒充满信心，认为希特勒为他们带来了希望，能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它照亮了勃兰登堡门上面女神的头盔和胜利的象征，有一种反讽意味，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灾难的姜丽，还沉浸在庆祝的气氛当中；他们的行为充满鼓动性，甚至连叙述者自己也感到激动万分，从中可以看出大众更是容易受纳粹党意识形态的毒害。

## 结束语

历史学家会说：要体现出历史发展的进程；社会学家会说：要保证采样的代表性；文学批评家会说：要保证叙事的个人性，千万别代他人立言……格拉斯是个小说家，他的职业是感性地把握历史，《我的世纪》中的“我”当然不仅仅是格拉斯本人，但也决不是一个代表了全人类或全德意志公民的“大我”，这里出现的是一百个被历史抓住的个体的“我”，其遴选原则如下：“在这里不让那些有人说是他们推动了历史的有权有势的人发言，而是让那些不可避免地历史相遇的人出来说话”，目的是表达出“这是一个把他们变成牺牲品和作案人，变成随大流的人，变成猎人和被猎对象的历史过程”<sup>①</sup>。本文从一个画廊老板的角度出发，来描绘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的事件，篇幅有限但却包含众多历史事件，读起来耐人寻味，并能够回顾德国历史。

最后，衷心希望本文能够让读者对该作品《我的世纪》及其中《1933

<sup>①</sup>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RS/8684.htm>

## 闻道

---

年任命的消息》有更加深刻及全面的认识，也希望能激起读者对阅读德国作品的兴趣。



(责任编辑：孙莹、王志浩)



Édition du groupe « Ebooks libres et gratuits »



Jean-Jacques Rousseau

**LES CONFESSIONS**

Texte du manuscrit de Genève.

(1782)

## 他两个都在忏悔

郭良正\*

说他两个都在忏悔，是因为他们各自写了一部书名为《忏悔录》的书。其中一位是古罗马时期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另一位是法国十八世纪杰出思想家让·雅克·卢梭。

卢梭距现时稍微近，学世界历史时知道这个人物，并略知他在法国历史上的作用。而提起奥古斯丁，则心里一片茫然，正是因为这，在跨入知天命年门槛时，我把两本书一同购入囊中，并孜孜以求之。

他们对谁忏悔，忏悔什么？奥的忏悔对象是心中的上帝，忏悔的是对上帝的不敬。卢的忏悔，也有宗教成分，他心中也有上帝的存在，在对上帝忏悔的同时，尤其忏悔的是对自己心灵，以及所做错事的灵魂追问和反思。

奥在弘扬基督主旨的同时，一刻也不忘记自己的卑微，以及在信仰上的弯路所形成内心对主的不敬，这是他忏悔的真正原因。卢的忏悔则不是那样刻骨铭心，他忏悔的实质是在揭露、控诉、批判和声讨，以自己的本性善良，来批驳社会恶浊对他的侵害，以自己现实遭遇来反抗“强权即真理”的不平等现象。

奥的忏悔，思辨色彩四溢，显示出作者灵辩智慧，这得益于他多年来对雄辩术的学习和教授，体现的是神性和人性的对立统一。而卢不是总在

\* 郭良正，笔名东壁逸人，河南省巩义市作协秘书长，中国化工作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学员。



念叨上帝，而是能够敞开心扉，对人“坦率道出善与恶，既没有隐瞒丑行，也没有添加什么善举”，语言充满着文学张力，这是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

作为自传体小说来讲，奥每卷都以年龄为篇章名标示，通过标示引导读者来提纲挈领体会他对主的敬或不敬。除此外，要想了解作者其它人生经历的素材倒是不太多，社会当中的人也有限，能够让人记着的就是他的两个朋友和母亲莫妮卡，贯穿全篇都是无以伦比的上帝，这与其说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倒不如说是一部传经布道的讲义。卢的开篇就是“我在从事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这大气磅礴的开场白，营造了一个气吞山河的宏大气场，把读者的思路和视线引领到他的麾下去一探究竟。通读下来，发现他已撇开了对某一神祇的束缚，平心静气的把我推到了读者面前。既然开篇有那样推心置腹的承诺，他就能够以己及人，以己及社会的去描写那个时代那个地域的社会百态。

奥虔诚坦率，闪烁着真知灼见的光彩，尤其对神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卢从生活中的人与事儿来见证上帝的存在，是把人间展示给上帝看，文笔潇洒奔放，笔力入木三分，个性思想自由，对自我剖析达到见智见仁的艺术境界。

两位前后相距一千多年的思想巨擎，以他们的雄才大略，用我手写我口的方式，记录了自己和时代的交响。评论者说，两部《忏悔录》同样经典。经典在哪里？我则看重的是二者的不可替代性，两位思想者的光芒色彩有别，他们思想的律动时刻在震撼着后来着的心扉，并为他们的思想和精神持续感动，这正是他们与世并存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责任编辑：张莹、王志浩）

## 莫斯科中大学生俄文名

郭良正\*

辛亥革命拉开了 20 世纪中国历史进步的大门，随后，国民党、共产党等进步组织相继成立，更推进了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思维。

正当革命形势突飞猛进之时，孙中山不幸病逝，革命形势暂时受挫。苏联并没因失去一位战略合作伙伴，而放弃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斯大林倡议，苏共经过充分酝酿做出决定，以孙中山名义创办一所大学，选拔中国优秀青年，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帮助中国培养“布尔什维克”干部，以此成为中苏关系发展的桥梁和纽带。

1925 年 10 月，在莫斯科市区的沃尔洪卡大街 16 号，创建了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简称中山大学，专门培养中国革命后备干部，以有生力量，来支援中国革命的发展壮大。

学生来源主要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选派的优秀青年，他们肩负重要使命，人身安全尤其重要，大学人事部出于安全考虑，为每位学生起了一个俄文姓氏或全名，于是，这批黄皮肤的青年学子，便成了“司机（斯基）”和“泼妇（波夫）”。

邓小平姓多佐罗夫，全名是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

邓小平叔父，同样也是学生的邓绍圣，俄文名是弗拉基米尔·尤利耶维奇·达尼利内姆。

中国共青团欧洲支部负责人傅钟，俄文名是阿列克谢·戈奥尔吉耶维奇·基万科夫。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欧洲支部领导人任卓宣，俄文名是拉斐尔。

秦邦宪俄文名博古诺夫，后来以此简称博古，几乎取代了原名。

真名叫陈绍禹的王明，俄文名是克劳白夫。

国民党也来了一批高层领导的子女，后来成了国民党中央力量。其中有蒋介石儿子蒋经国，俄文名是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利扎罗夫；未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部长谷正鼎俄文名是卢森堡；国民党南

---

\* 郭良正，笔名东壁逸人，河南省巩义市作协秘书长，中国化工作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学员。

## 闻道

---

京市党部主任委员肖赞育俄文名是皮萨列夫；还有冯玉祥之子冯洪国俄文名是涅日达诺夫、女儿冯弗能俄文名是索比诺娃。

以上这些是早期学员，后来随着国内形势变异，很不利于共产党，南昌起义后，革命进入低潮，为了保存领导力量，党中央先后派乌兰夫（俄名拉谢维奇）、叶剑英（俄名尤赫诺夫）等骨干力量，先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时去的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杨之华等中共名流，以及国民党方面的冯弗伐、邵志刚、叶楠、邓文仪、屈武于芝秀夫妇等，因资料有限，均未查到相对应的俄文名，但并不排除他们有俄文名。

莫斯科中山大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办，为中国革命培养了有生力量，待完成历史使命，尤其是国内形势不容再存在的情况下，于建校5年之后的1930年夏解散，那些“司机”和“泼妇”们便名归了正传。



（责任编辑：张莹、王志浩）

## 庆祝中瑞建交 65 周年：“文化外交的作用” 国际研讨会在我院举办

9月4日，庆祝中瑞建交65周年：“文化外交的作用”国际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此次研讨会是在我校“第十二届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的框架内，作为“瑞士日”主题活动进行的。瑞士驻华大使戴尚贤、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陈群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冯绍雷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端木美研究员，以及来自瑞士弗里堡大学、法国巴黎一大的多位学者莅临会场。活动由瑞士弗里堡大学克劳德·奥塞尔教授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陈群校长在致辞中向瑞士驻华大使戴尚贤阁下及夫人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祝贺活动取得圆满成功。陈群校长指出，瑞士是最早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戴尚贤大使刚刚出席了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见证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强烈愿望。中瑞两国建交65年来，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同时，华东师范大学也非常重视与瑞士的交流与合作，已经与巴塞尔大学合作建立了孔子学院，与瑞士弗里堡大学也签署了合作协议。最后，陈群校长希望华东师范大学与瑞士的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瑞士驻华大使戴尚贤作了主题为“中国与瑞士两国关系森林中的文化参天树——论1950年以来在中国举行的瑞士文化活动的语境关联”的致辞。他首先回顾了瑞士文化外交的历程，并以瑞士建国以来的历史为切入点，特别是中瑞建交后的两国关系史入手，探讨两国友好合作的历程。戴尚贤大使表示，两国对于合作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愿望，中国和瑞士的双边关系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在环境保护、科技创新、文化交流方面都应当有广泛的合作项目。这些都是两国友谊的见证，但两国的合作潜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相对于经济外交而言，文化外交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中瑞两国都应该加大文化外交力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瑞文化交流的“百果树”。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冯绍雷教授作了“谈谈中国人对瑞士的认知”的主题致辞。冯教授主要分析了瑞士的中立文化的根源。他认为，一个成熟的中立制度，是与这个民族对国际国内事务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分不开的；完备的中立制度与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也是分不开的。当下，应该用一个发展的、多元的视角来看待中立主义问题。



研讨会下半场，来自瑞士弗里堡大学的宝琳娜·米拉尼博士作了题为“外交文化在中瑞国际关系中的位置”的主题报告。马修·吉拉贝尔教授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所的端木美研究员就留学生问题分别作了题为“20 世纪下半叶瑞士与法国接待留学生的比较研究”和“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留学生与文化外交——以留学瑞士学生为例”的主题报告。



与会的嘉宾、学者和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学员们，就今天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研讨会活动受到学界、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为纪念中瑞建交 65 周年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最后，此次“瑞士日”活动以一场瑞士导演 Luc Schaedler 的纪录片《水印——来自中国的三封信》结束。

## 我院举办以探讨国际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前沿问题为主题的 2015 年校庆学术报告

在中国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以及我校六十四周年校庆之际，我院就当前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前沿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2015 年 10 月 14 日下午，我院校庆学术报告会在理科大楼 A404 室举行。报告会由我院院长刘军教授主持，我院党总支书记贝文力，冯绍雷教授等学院全体教师、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外国留学生共同参与。



刘军院长主持报告会

报告会历时三个小时，贝文力、高晓川、姜睿、潘兴明、王海燕、阎德学、臧术美、张红八位老师先后做了深刻的主题发言，冯绍雷、余南平两位教授做了精彩的点评。



### 贝文力：镜头后的风云——冷战背景下的苏联二战影片创作

贝文力老师首先发言。他在报告中指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后的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历史的目的是为了着眼于当下。苏联冷战时期涌现的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创作和影视作品承载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它们以书写真实和真相、表达精神内涵为目的，通过对战争的回顾和描写，表现不同历史观、价值观的艺术家对人性、战争与和平的思考。



### 冯绍雷：三种艺术创作追问三大文明全球治理的智慧思考

冯绍雷教授对老师们的发言逐个作了深入点评，尤其对贝文力老师的报告表达了高度赞赏，并就三种艺术创作的表达形式，以及由此表现出的三大文明全球治理的智慧进行了拓展阐释。他介绍的三种艺术创作形式，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式、莎士比亚式以及曹雪芹式。他认为，俄国人做事“求真”，这不仅仅是他们的一大特点，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俄国几百年来始终在向先进文明学习；而莎士比亚作品中所探讨的那些终极问题，鞭辟入里的分析，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同时表现的是一种文化思想和存在方式；曹雪芹在写作《红楼梦》时常常会被自己所塑造的角色所感动，而他的文本表现却是平静的，没有隐含过多自己的心理描写，善于站在第三者的角度进行冷静、客观、深刻地描写。这三种艺术创作形式，都以不同的方式追问人的精神和伦理的终极困惑。他希望大家通过关注文学来关注三足鼎立的英美文明、俄罗斯文明和中华文明。



### 高晓川：中东欧在中国对外经贸合作中的定位

高晓川老师的发言指出，自 2011 年起，中国同中东欧的合作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合作的定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中国同中东欧的合作是欧亚大陆两个转型经济体之间的合作；第二，中东欧国家是中欧合作之间的重要端口，起到桥头堡的作用；第三，中国同中东欧的经济合作有利于中欧经济的平衡发展；第四，同中东欧国家合作在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合作层次中有重要作用；第五，中国与中东欧的合作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含义，有利于加强我国同他国的战略经贸联系，并且对于改善中欧关系具有重要作用。他还强调，当前中国企业进入中东欧国家市场有一定的困难，技术层面的制约因素，欧盟区域发展政策等，都是我们应该调整 and 解决的问题。



### 姜睿：基于“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整合创新机制

姜睿老师结合她的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与在场师生共同探讨“基于‘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整合创新机



制”。报告从现状研究、理论探究、政策分析，以及对策建议四个方面，提出构建国家战略整合和发展平台是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而“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与以往的国际国内战略存在质的差别，关键在于我国的发展面临着构建全方位开放格局、东西中部角色转换等问题。



### 余南平：“一带一路”与 TPP 协议的达成

余南平教授在点评姜睿老师的发言时指出，“一带一路”建设首先要考虑经济状态，经济实力和产业链建设。搞一体化需要产业链作基础，没有产业链的嫁接，不产生经济附加值将违背经济规律。而就今年 10 月 5 日 TPP 协议达成一事，他指出一方面是由于奥巴马政府的大力推动，另一方面是全球格局发生了二次转变。他认为，奥巴马大力推动此事不仅源于它将成为奥巴马政府的一个重要政治遗产，同时对于重返亚太来说，不管是地缘政治上或是经济角度上，它都将是美国主导全球下一轮贸易和投资的一体化产物。他还预测，TPP 达成约四年后将会出现资本跨国转移，即全球价值链重构。



### 潘兴明：中国周边国家移民问题及对策

潘兴明教授的发言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最近几年我国的发展对周边国家形成的强大吸引力，外国移民问题越发突出。纵观当前欧洲的难民潮，欧盟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由于英国典范的地位，道义上不能关闭对难民的大门；另一方面，难民问题在实际应对中出现的困难，欧盟内国家间安排等均面临着一定的挑战。未来难民问题还将继续存在，随之而来的文化冲突问题也会凸显，因此移民问题不能采取临时政策，应该建立完善合理的治理机制使各方面得到协调。



### 王海燕：中俄蒙共建经济走廊的挑战与应对

今年 7 月，中俄蒙达成共建三国经济走廊的共识，毗邻的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是我国的境外核心区，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点地区。王海燕老师从中俄蒙经

济走廊建设的出发点、路径选择、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措施建议等方面，作了深入分析和阐释。



#### 阎德学：漫谈中国人的学问之道

阎德学老师指出，教育的目的是立德、立功、立言，师道是“化民成俗”。中国人强调太和思维，即道德和伦理。道，是宇宙和人生的秩序和规律，至高无上的大智慧，人生最高的精神享受；德的具体表现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他强调，作为一名合格的读书人，深知读书是一种心灵活动，需要营造一种恬适娴静的心境。读书的目的在于通过读书而开悟，开悟后明理达道，明理达道后真正会做人，并以此与在场师生共勉。



#### 臧术美：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再思考——一种中国语境的引入

臧术美老师在报告中指出，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源于对现代性的批判，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以打破僵化的体系为己任。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学者试图打破西方话语体系的霸权，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理论和话语体系，两者都有破除已有的、固化的思维方式的的目的。她强调，中国要构建自己的理论，需要“先破后立”，需要学者们秉承中国文化的精髓，脚踏实地地进行“愚公移山”似的探索。



#### 张红：演进中的韩国智库——以东亚研究所为例

张红老师的发言指出，韩国智库近年来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其中东亚研究所号称“韩国的布鲁金斯学会”是唯一进入百强的韩国民间智库，在总统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东亚研究所从2002年发展至今，机构设置完备，下设五个研究中心，包括朝鲜、中国、日本、亚洲安全、舆情分析中心。东亚研究所具有国际化的特点，研究东亚研究所对于研究韩国整体智库的研究具有

很好的典型示范作用。



在互动讨论环节，师生们畅所欲言，将报告会气氛推向了高潮。此次校庆学术报告会汇集了学院老师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前沿问题。以校庆报告会为起点，本学期学院还将陆续开展更多专题的师生学术交流活动。

（夏真真、孙莹撰稿，陈子越摄影）

## 两岸学者同忆台湾光复苦难辉煌，共谋两岸 关系发展新篇章

### ——“台湾光复70周年的历史与现实”学术 研讨会在沪隆重召开

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台湾也迎来光复70周年纪念日。10月24日，“台湾光复70周年的历史与现实”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此次研讨会由华东师范大学、民革上海市委员会、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香港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由华东师范大学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承办。此次研讨会邀请了全国台湾研究会前副会长王在希、上海市政府台办巡视员李雷鸣以及来自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张荣恭、中国文化大学中山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所长赵建民等五十余位两岸学者参加，提交论文28篇。



上午9时，“台湾光复70周年的历史与现实”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正式开幕，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代表华东师范

大学致欢迎词,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巡查员李雷鸣、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山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所长赵建民、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董波、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金仲伟出席研讨会并致辞。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郭为禄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致欢迎辞并表示:1945年10月25日,在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出现重大转折之际,台湾也重归中国版图,结束了日本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台湾光复,不仅是台湾同胞欢天喜地的时刻,更是全体中国人民结束屈辱历史、自豪荣耀的日子。没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没有台湾同胞50年的英勇斗争,就没有台湾的光复。在日本殖民统治的50年里,台湾亦是“一寸山河一寸血”,海峡对岸的仁人志士对日本殖民者的抗争一刻不曾停止,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来证明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脊梁。今天,大家通过研讨会的形势,重新审视台湾光复70年来的历史与现实,不仅要缅怀为实现台湾光复而奋斗牺牲的先烈们,更要记取历史的经验与启示,从中获得团结两岸同胞、推动和平统一的精神力量。



上海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巡视员李雷鸣在致辞时表示:1945年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结束,中国恢复对台湾主权。这是中华民族结束近代民族屈辱的重要时刻,举行这个研讨会,重温历史,具有重要意义。70年来,台湾与大陆命运相连,两岸同胞荣辱与共;7年来(指从2008年“陈江会”

至今)，在两岸双方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关系走上了和平发展的康庄大道，取得了丰硕成果。当前，两岸关系又走到了一个新的重要的十字路口，但不管台湾政局和国际形势如何变化，都不可能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和法律依据。两岸关系决不能走回头路，不能再让“台独”分裂势力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两岸合作、共谋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理应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奋斗目标。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山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所长赵建民表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两岸共同纪念台湾光复的活动，这多少说明了两岸关系取得的进展。2008年之前，两岸政府高度敌对，外国学者用‘濒临战争’来形容两岸关系，这种情况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已是‘昨日黄花’”。“两岸三地的和平来之不易。两岸关系发展背后有很多人的努力，当然也会有挫折。尽管两岸‘一笑泯恩仇’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但今天来自两岸的专家学者能够心平气和地展开讨论，回顾两岸关系的发展历程，这是很大的进步。我也经常在台湾讲，两岸分隔六十年来，和平得之不易，我的父亲和各位先辈为我们这片土地努力过，现在有更多的人继续努力，我觉得前途光明。”



民革上海市副主委董波在致辞中提到：在这个时间举办这样的研讨会，恰逢其时。七十年前，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儿女浴血奋战，重获民族尊严。日本虽然蹂躏国土，但不可能摧毁人民的意志。今天，五十余专家共聚，开展学术探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也不曾放弃过台湾。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一直是民革的目标，两岸和平大势所趋，两岸人民血浓于水，今天我们共同展望两岸的未来。



开幕式后,在华东师范大学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仇长根的主持下,浙江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前副会长王在希,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张荣恭两位特邀嘉宾做了精彩发言。



浙江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海协会两岸关系协会前副会长王在希在发言中指出:“台湾的光复是中国人民抗战的重要成果,没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就没有台湾光复、回归祖国,历史证明台湾与大陆命运相连荣辱与共。1943年

《开罗宣言》是第一次确认台湾属于中国的文件,铁证如山。《开罗宣言》虽然没有采用条约名称,但具有国际法效用。《开罗宣言》内容形式上都符合国际法规范,是台湾回归中国的重要法律文件。1945年,中国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在台北举行受降仪式,天皇公开承诺履行条约义务,这些都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坚持台湾为领土的法律依据。王在希介绍台湾光复的历程后表示,当前海峡两岸关系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重要节点上,自2008年以来开辟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正面临新的考验。王在希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因为“九二共识”回到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即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张荣恭在发言中回顾了从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以《马关条约》割让日本,到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归中国版图这段历史,并通过海峡两岸达成“九二共识”、连战访问大陆等两岸发展的“里程碑”事件,讲述了两岸关系不断友好发展的历史进程。他表示:“和平来之不易,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如





何巩固两岸关系发展，警惕可能的倒退。”

下午2时，华东师范大学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包承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严安林、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所长助理彭维学、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柯玉枝分别主持了“台湾光复70周年的历史回顾与反思”、“2016台海局势前瞻与两岸关系”、“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与周边安全问题”三个议题的小组讨论。赵建民、倪永杰、陈一新、李晓汀等来自海峡两岸的二十余位学者参与了讨论，华东师范大学两岸关系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仇长根，浙江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前副会长王在希对学者们的发言做了精彩的点评。

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章念驰在讨论中强调：“今年是促进两岸关系融洽的重要一年，许多活动特别是两岸共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光复台湾70周年，都为促进两岸关系融洽提供重要机会。两岸关系的本质，就是结束对立与分歧，走向和解与契合。近年来两岸的关系由一家人变一家亲，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湾政治研究所副所长陈星在议题讨论中表示：“民进党上台后，两岸关系可能会比现在坏，但应该坏不到哪里去，因为中美大结构没有变。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海峡两岸对抗的路子已经走不



通。两岸关系发展的关键在于两岸有没有互信，愿不愿意谈，只要两岸之间有对话，两岸关系就会进步。但需要注意的是，两岸的直接对话不一定会越搞越明白，例如网络在两岸直接沟通中发生了很大的作用，但偏于情绪化。”



全国台湾研究会研究员高琛在发言中强调：“目前两岸关系是最好的一段时间，时间可以证明一切，事实胜于雄辩。两岸关系一路走来，海峡两岸都在努力，民进党当然有很大的概率在台湾地区的

的选举中获胜，但民进党能走多远才是问题的关键。从长远来看，两岸会走向统一，未来台湾人民会有正确结论。”

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煌在书面发言中表示：1945年台湾得以结束日本殖民统治，回归祖国，得益于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希望两岸之间能够以民族利益为前导、以人民为中心，共同谱写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奋斗史。

华东师范大学两岸交流与地区发展研究所所长仇长根对本次研讨会做总结发言，他指出：“我们这次研讨会的论文集共收录了28篇论文，每一篇论文都是用心去写的，仔细看论文是对会议最好的总结。大家的发言有共识也有分歧，这种状况自两岸学术界有交流到现在一直是存在的，但与过去激动的交锋不同的是，我们现在是理性的交流。我觉得研讨会很成功，这是大家支持的结果。”



此次学术研讨会以两岸学者学术交流的方式隆重纪念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反抗，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这一共同历史事件，是对70年前台湾回归祖国这一重大历史史实的重申与肯定。本次研讨会还推进相关学术研究，并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来自海峡两岸的学者针对两岸关系前沿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并针对这些问题展开了充分、友好的讨论，提高了相互之间的信任，与会的学者均认为处理两岸关系是中国人的“家务事”，两岸关系的持续友好发展将惠及两岸同胞。



## 探讨未来世界体系中的欧亚发展，中俄青年 学术精英讲习班开幕

2015年11月11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中俄联合研究院——第二届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正式开幕。

我校副校长郭为禄代表学校致欢迎辞，俄罗斯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陶米恒先生作了题为“中俄关系最新进展”的主旨演讲。之后，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与陶米恒公参，就我校进一步推进与俄罗斯、欧亚地区的教育人文交流合作进行了会谈。



为进一步推动中俄两国在学术方面的深度交流和联系，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设立“中俄联合研究院”，并成功举办第一届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全面审视了“欧亚空间”、“欧亚主义”等概念的历史和文化含义。希望借此推动中俄两国青年在人文社科领域高层次、多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为中俄两国的青年学者搭建基础性研究平台，并促进中俄青年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术和文化影响。来自9个国家的36名研究生和青年学者参加讲习班今年举办的第二届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为期一周。来自包括中国、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波兰、韩国、美国、印度、蒙古在内的九个不同国别的36名研究生和青年学者，以“未来世界体系中的欧亚”为主题，结合当下现实，探讨近期欧亚地区一体化的现实进程和未来的可能性发展。讲习班精心设计了四个环节的教学内容：



**专题讲座：**复旦大学国务学院郑宇教授、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博尔达切夫副教授、韩国成均馆大学助理教授白宇列等学者做讲座。专题讲座由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苏黎世理工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哈萨克斯坦欧亚大学、澳门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卡内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和学术机构的专家主讲，主要包括“中国、印度与亚洲一体化”、“创建中央欧亚”、“地区主义、地区安全的政治学”、“韩国的欧亚战略与韩朝统一”、“地区文化外交——上海高校与欧亚地区”等主题。



**主题发言：**学员主题交流青年学员们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系统介绍和展示自己与讲习班主题有关的研究成果，主要内容有，“中国的战略文化”、“中亚经济一体化与新疆的对外经济关系”、“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对华政策的比较研究”、“北方航道的发展”、“划分联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的战略含义”，“托尔斯泰爱国主义论述对当下东北亚局势的含义”等。



**团队建设：**11月11日下午，来自哈萨克斯坦古米廖夫欧亚大学的希丽别科娃博士以别开生面的团队建设游戏方式带领讲习班学员进行了“青年学者学术合作与网络构建”的训练课程。团队建设活动，共开展两次，将推动探索青年学者间开展跨国联合研究的可能性。



**中外学生学术交流：**本次讲习班的一个特色内容是，讲习班学员与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优秀研究生进行学术对话。11月12日晚中外学生

就个人的学术经历、研究兴趣、论文选题方向等进行学术对话和交流，涉及的主题主要有“美国中亚外交政策：思想与目标”、“一路一带与中印关系”、“中国的区域政策：以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例”、“保守主义和俄罗斯地缘政治身份认同”、“政治转型国家如何应对具有宗教背景的政治势力——埃及与土耳其的比较”等。





## 各国学者共议海上丝绸之路与南亚合作互动 在我院顺利召开

2015年11月21日-22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黄氏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及周边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与南亚的政治经济学”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印度、新加坡及中国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研讨，就“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对于地区一体化、双边关系、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对外投资及其对东道国的政治意义进行了多角度、多学科、跨国界的深入探讨和交流。



开幕式由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郭为禄致开幕辞。他谈到，从中国腹地到欧洲自公元二世纪开始就已形成了一条商业贸易通道，这就是连接亚、非、欧三洲著名的“丝绸之路”，它是商业与文化交流之路，是文明融合互鉴之路，是历史沟通与传播的友谊之路。他指出，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也必将带动新型大国关系、和谐周边关系进入新的阶段。



郭为禄副校长致开幕辞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黄氏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白永辉等专家学者出席开幕式并发言。冯绍雷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重大转型，从国际政治经济基本原理出发来看，国际经济合作一定要以国际政治合作为基础，特别是大国间的政治合作。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应以怎样的节奏和方式推进“一带一路”的发展。迄今为止，经济合作项目仍然是“一带一路”主要的推进方式，这与现有的已高度体制化、拥有大量法律法规及以制度建设为基础的地区经济合作制度框架如何对接，还有待探讨和研究。白永辉教授则详细介绍了会议各个专题的研讨内容。



刘军教授、冯绍雷教授、白永辉教授

开幕式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杨洁勉教授作了“让‘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推动中国和南亚合作互动的‘新力量’”主旨发言。他指出，中国正处在新一轮国内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国际上看，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是挑战大于机遇。中国与南亚还要从结构重组及创新的角度来提升经济合作，努力避免信任赤字及零和博弈。“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国与南亚的经济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为双方政治与安全合作也提供了便利，中国与南亚要利用“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作为双方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他认为，中国应该更进一步推进国内的改革开放，应该把中国的发展放在更广阔的世界和平发展与共赢的大背景下来考察。

前驻孟买总领事刘友法博士在其题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中印关系”的主旨演讲中表示，“一带一路”建设应将中印两国文化再创辉煌作为利益汇合点，加快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文化合作政治共识，尽快商签两国合作研究协定，以佛教缘为纽带，考虑将涉印高铁和高速公路项目与印度重要历史文化古迹串联起来，着力推进两国文化资源对接，夯实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所需的人文和情感基础。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中所有涉印项目均应坚持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充分发挥各自产业与资源比较优势，优先推进交通基础设施、能源通道建设，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鼓励两国企业合作参与印度政府倡导的经济带和重大城市互联互通网络建设。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杨洁勉作主旨发言



前中国驻孟买总领事刘友法作主旨发言

此次研讨会分设三个专题：一、“宏观视角下的‘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一带一路”对中国、南亚以及跨国公司的影响；二、“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与主要的参与国”，讨论“一带一路”战略对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的经济影响作用以及这些国家将如何影响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三、“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主要双边关系中的政治

经济因素”，讨论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时如何处理与印度等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



第一专题：宏观视角下的“海上丝绸之路”



第二专题：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与主要的参与国



第三专题：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主要双边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因素

各专题分别涉及到“中国的崛起与欧亚大陆的交通革命”、“中印关系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与‘海上丝绸之路’”、“欧亚主义，丝绸之路与中国的经济策略”等十多个议题，来自全世界的青年学者踊跃参与并热情发言。



青年学者热情发言

本次研讨会旨在为学者们提供一个高质量的交流和互动平台，同时，也有助于将学术成果转化为有关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实践智慧。

（文稿编辑：刘畅、夏真真、孙莹、吉普昇、陈子越

摄影：陈子越、武志杰、郑家桂

责任编辑：过梨雨、刘一鸣、刘畅）



# 《闻道》征稿启事

华东师范大学《闻道》(季刊)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刊,由华东师大国关院主管,是学生自主管理、自主发行的一份学术思想人文刊物。编辑部成立于2010年12月,2011年3月发行第1期。

我们坚持“以学术为主,不惟学术,百花齐放”的办刊理念,力图为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面的研究生提供一个学术习练的舞台,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的学人与同学惠赐佳作。

本刊征稿栏目主要有国际问题研究、学术随笔(含书评)以及文艺专栏等。国际问题研究主要刊登国际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史等方面的学术论文,来稿字数在10000字左右为宜。学术思想随笔(含书评)主要刊登古今中西经典著作阅读、思想研究等方面的文章,3000-6000字为宜。文艺专栏主要刊登文化艺术类题材随笔,如文学、电影、音乐、戏曲、旅游、时尚等,2000-5000字为宜。

## 来稿时敬请作者注意:

1. 本刊来稿一律要求原创首发,文责自负,反对剽窃、抄袭等一切学术不端行为。本刊属于内部发行,不影响投稿之后作者转投其他公开性学术刊物。
2. 来稿需为word文档格式,注释采用脚注,可参见《世界经济与政治》注释体例。请作者把稿件电子版以附件形式发至本刊邮箱wendao\_ecnu@sina.com。
3. 投稿作者同时需要提供200字以内作者基本信息(姓名、性别、教育背景、单位、通信地址、电话等),以便于后期邮寄期刊和支付稿酬。
4. 本刊对学术论文、学术随笔实行专家匿名评审制度,评审意见会以电子邮件发送给作者。我们会在2个月之内给来稿作者以回复。
5. 在尊重原作的前提下,本刊对决定刊登的稿件可作必要的修改,不同意修改者,请在来稿时注明。

### 6. 编辑部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 wendao\_ecnu@sina.com

通讯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414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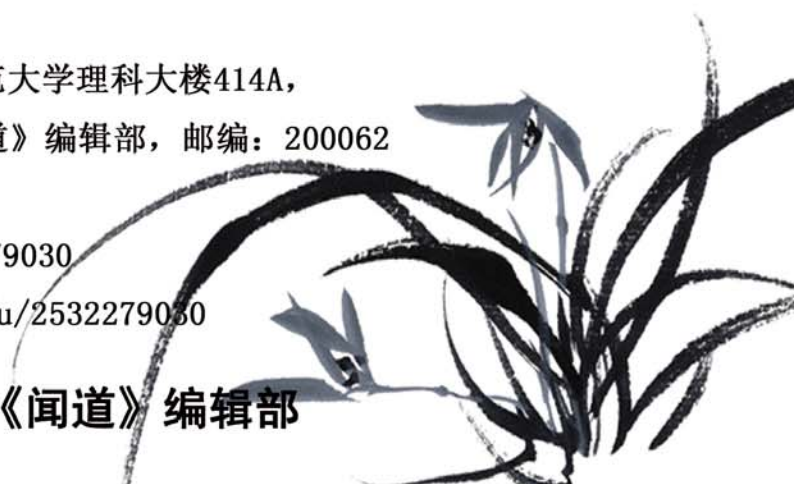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闻道》编辑部,邮编: 200062

网站: <http://www.saias.ecnu.edu.cn>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2532279030>

新浪微博: 闻道杂志社, <http://weibo.com/u/2532279030>

《闻道》编辑部





S A I A S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